

0510

巴老傳記文獻資料



第十二輯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巴老傳記

暨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

巴彦淖尔文史资料

第十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巴彦淖尔
盟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选编

封面设计 王德源

封面题字 王成荣

巴彦淖尔文史资料 第十二期 (内部发行)

编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印刷：巴彦淖尔报社印刷厂

书号：内新出准字(9) 1216号

2.00元

巴盟政协第八届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敬告读者

兹将《巴彦淖尔文史资料》自1983年出版以来，第六、七、八届巴盟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组成人员以及《巴彦淖尔文史资料》主编公布如下：

巴盟政协第六届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主任：罗鉴

副主任：董炎炳、罗永寿

委员：徐秀泉、郝威、敖特根其木格、周尚成、刘培荣、张世杰、董玉奇

文史资料处副处长：周尚成

工作人员：王宝臣（正科）

王伟强（正科）、罗俊卿、郝莲瑜

本届政协出版《巴彦淖尔文史资料》1—2辑。

主编：周尚成

巴盟政协第七届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主任：罗达

副主任：董炎炳、罗永寿、明安、周尚成

委员：徐秀泉、郝威、敖特根其木格、查格德苏荣、刘培荣、张世杰、董玉奇

文史资料办公室主任：周尚成（副处）

工作人员：郝莲瑜、邬成友、冷江泓、王枝梅、郭杰华、于德喜

本届政协出版《巴彦淖尔文史资料》3——

9辑。

主编：周尚成

巴盟政协第八届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主任：高应才

副主任：吉林太、周尚成

委员：丁明顺、曹汉杰、敖特根其木格、郝威、刘培荣、张启高、胜道

文史资料办公室主任：周尚成（副处）

副主任：郭杰华（副科）

工作人员：郝莲瑜、冷江泓、王枝梅

本届政协已出版《巴彦淖尔文史资料》10

——12辑

主编：周尚成

1991年8月30日

目 录

- 天主教在河套
.....赵忠贤、张文忠(1)
- 庚子赔款在磴口引出的风波
.....赵忠贤 张文忠(66)
- 巴盟历史上的教会教育
.....郭秩平(82)
- 乌拉特中公旗历史概况简述
.....胜道(110)
- 乌拉特西公旗的兴衰和变迁
.....恩克巴雅尔(163)
- 中公旗扎萨克诺颜林沁僧格办学的历史事绩
.....达瓦桑布·朝格图(193)
- 原乌拉特东公旗协理
——陶德吉日嘎拉
.....道尔吉斯楞(201)
- 忆乌拉特中公旗协理
——巴图毕力格
.....孟克松布尔(229)
- 忆原伊克昭盟达拉特旗杭锦办事处
.....黄继民忆述 查干莲花整理(248)
- 阿贵庙史略
.....白生华(257)

- 乌中旗蒙族生活习俗
.....陈·阿拉坦巴根(267)
- 乌拉特蒙族婚俗礼节简述
.....孟和巴托、刘斌(275)
- 乌拉特人的殡葬习俗
.....达瓦桑布(284)
- 乌拉山祭祀习俗
.....朋斯克巴扎尔、那顺瓦其尔(290)
- 记拉僧庙会的跳鬼盛况
.....苏希贤(298)

天主教在河套

赵忠贤 张文忠

一、传入之由来

(一)

天主教传入河套地区已有一百一十五年历史。它是随着教会势力的不断扩大，由沿海向内地乃至边疆地区逐步发展而来的。就内蒙地区来说，又是由内蒙东部、中部地区逐步向西部发展，直至发展到西南部的后套三道河子（三盛公）一带。1875年，当天主教教士们在河套地区的三盛公立足后，便以三盛公为中心，开始了长期的传教活动。为了完整系统地记载天主教在河套活动的历史，有必要了解一下天主教传入内蒙地区之梗概。

据王学明所写《天主教在内蒙古地区传教简史》一文中说：“河北省张家口西湾子天主教出版的《圣教源流》记载，公元1700年间，察哈尔西湾子地方，有张根宗，已领洗入教，他是那里的第一个教友。同时，当时西湾子有了第一个小教堂。又据上海土山湾出版的《拳祸记》记载，

公元1724年1月2日，清雍正皇帝出谕：‘禁止传教’。1830年，京中禁教尤严，教士无匿迹地，赴蒙古西湾子居住，教友随之者殊伙”。根据文中所述内容，可见在1700年，内蒙地区就有天主教活动。据有关主教史料记载，公元1838年8月14日，罗马教廷划满洲里、辽东、内蒙三地方为一教区，由巴黎外方传教会管理。1840年教廷派四川方主教为此地代牧。同年12月，罗马教廷将蒙古划分为一个单独教区，归法国遣使会（味增爵会）管理，委派法国遣使会孟振生为代牧主教。

1846年4月28日，罗马教廷调孟振生为北京教区主教，兼内蒙教区主教。当时，蒙古教区已有三大教堂：中为西湾子教堂，西为小东沟教堂，东为苦柳图（在原热河省）教堂。

据常非神甫所写《绥远教区简史》记载：“圣味增爵会士，奉命在内蒙传教者，人数不多，而应巡行传教之地区，则非常辽阔。当时传教之目标，多集中于内蒙之东部，而西部则自感鞭长莫及。惟此内蒙之西部并非无教友之踪影，一则以山西、陕西之教友，或经商，或移垦，渐向北而迁徙乃达侨居于是；一则以教难之频仍，而教友之畏惧，逃避于深山僻巷，辗转流徙至此者，亦俱有人在。”

“1844年，在内蒙传教之胡克与额贝二位司铎由热河出发，用蒙古教友沙当金巴做向导，经归化城（呼和浩特）、萨拉齐（土右旗）向西南行直奔拉萨。二位司铎之计划，乃在劝化其中心人物皈依圣教，以求蒙古人望风景从之奇效。其计划未能成功，而其旅行笔记，实有益于后人者不少。

“从1848年至1865年为止，前后来归化区域传教之司铎只有四位，即吴味增爵、谢司铎、樊味增爵、达味。当时司铎来是方者，采取游击形式，因无教堂之成立，故无定居之点。常以教友所在之地，为其寄宿之处，今日在此，明日在彼。所有各乡之教友，每年必轮流看望或授以当领之圣事。或教以当知之教义。当时教友，虽闻得司铎之教导甚少，而大体来说，其信仰之坚诚，实属可嘉。司铎在周行一圈后，即回西湾子总堂休息，然后再游行，亦如上述”。

据当时其他方面之记述，得知吴司铎应行照料之教友散居之处所，东至二十三号（今兴和县），西至归化城，北至后坝（今四子王旗），南至岱海滩（今凉城县），各村虽有教友亦不过三家两户。

1865年，在内蒙约共有教友五千余名，其散居之广，则东至黑水，西迄归化城，南抵长城，北

达大戈壁。而传教司铎只有白、戴、谢、达味、凤（最早的蒙族）及赵、郑二司铎共七人。尚有五品张弥厄尔，四品郝保录。1866年秋，内蒙所有之味增爵会士，皆相率东去，或居北京，或去正定，此处教务已由“圣母圣心会”接管。

圣母圣心会是比利时和荷兰天主教传教士所组织的修会。1861年比利时天主教司铎，以南怀仁为首，上书比利时国王和罗马教廷，要求批准成立一个天主教“圣母圣心会”，得到罗马教廷许诺，遂于1862年在首都布鲁塞尔的近郊史勾特村，成立了圣母圣心会，然后通过比利时政府和教会，向罗马教廷请求，将法国遣使会在中国的蒙古教区让给圣母圣心会，做为传教区。那时清朝皇帝已于1861年颁发上谕：“准予传教”。而法国天主教遣使会因忙于北京教务，无暇顾及蒙古教区，故上书罗马教廷，请将蒙古教区另交他会管理，教廷便借此批准将蒙古教区交由圣母圣心会接管。

1865年12月6日，圣母圣心会会祖南怀仁司铎，率领韩默理、司神父、郎神父及林修士共五人，同时由比利时到达北京，向法遣使会办理交接手续后，来到蒙古教区察哈尔西湾子教堂，由白振铎代权司铎正式接收了蒙古教区的传教事务。南怀仁被任命为本区副主教。当时，教区教

友二千七百多人，散居在二十六个村庄。南怀仁为同清朝地方官员搞好关系。提高自己的声誉而便于传教，他们也穿上长袍马褂，脚蹬马靴，头结假发辫子，还学习蒙古语，熟悉蒙古族风俗习惯，力求衣食住行的“蒙古化”，经过数年四处奔波，在遣使会原有教务基础上，有了很大发展，成绩显著。遂被调往热河承德，开发新的传教区。南怀仁因积劳成疾，于1868年2月23日病死在东蒙古热河老虎沟天主教。其副主教之缺，由司牧灵接任。1869年司神父被调回国，又由韩默理代理教务（韩后来调往甘肃任主教）。

1871年5月14日，罗马教廷又正式委任巴耆贤为副主教，后于1874年10月24日，教廷委巴主教为蒙古教区代牧主教。到1883年，巴耆贤主教请求罗马教廷批准，将内蒙教区划分为三个教区，即东蒙古教区，主教吕继贤，主教座堂在松树嘴子；中蒙古教区，主教巴耆贤，主教座堂在西湾子；西南蒙古教区，主教德玉明，主教座堂在磴口三盛公。三盛公教堂于1878年建成（大教堂1893年建成）并于1884年定为主教座堂。而天主教传入这一带则始于1875年。

（二）

阿拉善旗王爷，因清初随圣祖康熙西征葛尔

丹有功，被封为世袭驸马。1873年，阿拉善旗第六世王爷扎萨克贡桑珠尔默特与伊克昭盟准葛尔旗扎萨克贝勒扎纳尔格德相偕，由北京朝见清朝皇帝归来，路经西营子（在今兴和县境内）。时年西营子新堂新近落成，巍峨壮观，一时引动二王好奇心，意欲观瞻。遂投刺谒见该处外国传教士德玉明和费尔林敦，教士设宴款待。二王同教士会谈良久，心为之悦。加之阿拉善王爷因途中风寒感冒，吃了两片德玉明司铎给的阿斯匹林，顿觉清爽，于是对司铎产生好感。当面即请司铎等分身西来传教，答应必加保护与帮助。嗣后德、费二司铎计议西赴传教。乃联名上书巴主教，请准西去鄂尔多斯、阿拉善旗等处传教。时巴耆贤主教正在岱海滩巡视教务，接德、费二人之信，适中其怀，当即允准。

德、费二人请得巴主教同意后，于1874年2月，从西营子启程西行，由蒙古人沙当金巴作向导，途经归化城，托克托县，河口等处，2月27日到达准葛尔旗王爷府，受到王爷厚礼招待。3月6日又到乌审旗王爷府，亦受热烈欢迎。4月7日到城川，又转至宁条梁。宁条梁早于1868年就有教徒若干，教友们已有八年之久未见司铎，因而德、费二司铎倍受欢迎。时至7月，在城川建成锥形之教堂一座，有如设于旷野之中，然每

遇主日，瞻礼，四方来念经者顿如集市，亦奇观也。

德玉明司铎认为此次西行之顺利，及与蒙古王爷情感之融洽，大有益于传教之进行。遂留费尔林敦游行于宁条梁、城川一带，开展传教活动。德本人则东归西湾子，向巴耆贤主教面陈一切，并请增派助手，扩大传教事业。巴主教听了德玉明之汇报，对其传教之计划深表赞同，并在人力物力上给予大力支持，即命在归化城居住之杨广道、步世明二司铎，前往准葛尔旗传教；又命桂德贞及司福音二司铎随同德玉明西去阿拉善旗传教。五位司铎奉命于1874年12月13日由归化城出发，赴巴主教指定地点传教。

德玉明司铎一行三人向西直奔，由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于1875年1月10日始抵阿拉善旗王爷府定远营（今阿盟巴音浩特），投客栈歇脚。次日整备衣冠，三人同行，请见贡王，奈王爷卧病在床，未能接见。只好耐心等待，再行拜访。时光如流，一连居住数月，曾多次亲临王府，但贡王病势日趋严重，终未得见。德玉明等闷闷不乐，不知所措。后从王府管家罗特色楞口中得知，定远营居住之蒙民信佛教而不愿信天主教，而阿拉善所属三道河子一带地方，乃阿旗最佳之地带，土壤肥沃，水草丰盛，而贫苦汉人居多，实

是传教之妙地。故三人计议，决定桂德贞、司福音二人转赴鄂托克旗，帮助费司铎传教，学习蒙古语。德玉明独身返三道河子。

那时，阿拉善旗在磴口地区设有磴口、道洛素海、哈拉和尼图、沙金套海四个巴格。磴口巴格辖可卜尔滩、二子店、贝子地、磴口、傅家湾、上江等处。道洛素海巴格辖二十里柳子、金沙庙、兴盛杨、双和成、三盛公、毛脑海（今磴口县渡口乡）等地。哈拉和尼图巴格辖天兴泉、营管牛犊、锦恒西（今磴口县坝楞乡新河村）、宏盛义、哈拉兔、补隆淖、协成丰、陶来兔等地。陶来兔以西，海子沿、四坝、公地等处均属沙金套海巴格所辖。其四个巴格的总管并兼边卡带兵名阿睦尔吉尔格拉（人称安九大人）。

德玉明来到三道河子一带后，做了一番认真考察。这里果然如王爷管家所言，是一块好地方。黄河从这里经过，沿河柳子丛密茂盛，形成一道天然围墙；红柳、芨芨、白茨密如蛛网；锁阳、甘草等药材遍地皆是，蘑菇野味不时可采；狐兔出没其间，雉鸡啼鸣遍野。且地域辽阔，人烟稀少，属蒙古边陲地带，政府权力难能所及。德玉明心喜若狂，决心在此大干一场，开发传教新区。于是便在锦恒西搭起临时帐篷，作为传教点，开始布道。这便是天主教传入河套地区三盛

公一带之由来。然而，德玉明在此居住数日，当地蒙民却无一人信教。乃东返归化城，向巴主教请款，以资传教费用。

二、初期教务之开展

(一)

清朝初年，阿拉善旗地区禁止开垦土地。从鹅掌公主聘嫁阿拉善王之后，清廷允准阿旗垦地种菜的请求，从此磴口、四坝开始垦种。（公元1799年）嘉庆年间至道光三年，在磴口、道洛素海、哈拉和尼图、沙金套海以及黄河沿岸多处，已开垦成熟地一千一百九十顷（一顷合100亩）零六十七亩。同治年间，回民造反，佃户逃徙，地遂荒芜，仅剩熟地四百余顷。这些土地都是由外地人租种，以晋、陕两地人为多。当时阿拉善旗规定，每年签订一次租种合同，租种地户，春来秋归，不准常居。阿旗上至王爷下至庶民百姓，对土地只有使用权、转让权，而没有出卖权，决不准出卖土地。但这些规定，自外国传教士德玉明插足磴口后，被破坏了。

1876年（光绪二年），德玉明从归化城重返锦恒西。他无视阿拉善旗规定，未征得当地政府许可，私下向本地蒙民租了土地一片，并向春来秋

归之佃户买下房屋及木质农具等，开始了传教活动。这年阿拉善旗贡王病故，乃由其次子多罗特色楞袭位，为七代八王。因四巴格总管阿睦尔吉尔裕拉发现德玉明传教情况向王爷汇报，王爷据此向清朝理藩院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宁夏蒙汉事务衙门呈报，上面责成阿旗立即派人前往三道河子一带进行检查。检查结果是德玉明之护照系理藩院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所发，从此外国传教士德玉明便肆无忌惮地买地、买农具、买房屋，然后租给当地农民耕种、居住，以此扩大教会势力。据阿拉善左旗档案馆所存史料记载，光绪二年十一月，德玉明将家居归化城的康六儿、苏玉奎所租种阿拉善旗道洛素海、哈拉和尼图两个巴格的耕地及农具、房屋及其他财产等全部作价买下。光绪四年，购买了陕西朝邑县人王相林子之奎元号房屋十九间及其木质农具等，作价二百六十千钱。又买了山西省平遥县人梁姓之宏盛义房屋、木质农具等项。又向山西晋州人王姓买下锦恒西房屋三十二间，木质农具等项及其租种阿旗道洛素海巴格的土地，作价一百八十两银子。德玉明私下购买的还有陕西省府谷县人苏玉贵租种阿旗道洛素海巴格的耕地及志盛隆（今磴口县粮台乡圣母堂）房屋十二间及其全套农具，作价八百三十千钱。

德玉明买下这些土地、房屋、农具后，遂将跟他从山西、包头、归化等地来的汉民男女二百四十人，分别安置在锦恒西和奎元号两大院内，并在此两处建起小经堂两座。

1877年，德玉明从凉城岱海滩大抢盘、兴和县西营子等地，移来教民五百人。后又陆续从察哈尔及土默特、鄂托克、杭锦、乌审等旗移来蒙古族教民百余人。同年伊盟尔架马梁一带因荒旱，灾情严重，人民无法生存，在那里传教的外国神父杨广道，带领二十多户教友计一百零七人，逃荒到达三盛公。上述几批移民、灾民，便是天主教在河套地区磴口县的第一批基本教民。

(二)

在人口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德玉明于1879年又租种了兴盛杨、景宁泰（磴口县粮台乡下江）、三盛公三处地方的土地几十顷。教会买下了姓袁的一处旧油房，这便是三盛公教堂的雏形。在志盛隆又建起小堂一座，并将土地拨给无地的教友耕种。此时，哈拉和尼图、道洛素海两个巴格的七个地方（奎元号、锦恒西、宏盛义、兴盛杨、景宁泰、三盛公、志盛隆）计土地五十二顷三十二亩，全部由德玉明所租种，教友已发展到千余人。由贾大、李希发、徐维、胡理、郭志计、李

召贵、张二奎子、常商人、孙幸俊等人，相继担任会长或管家，这就形成了七个教友村庄。其所以传教迅速，成绩显著，原因是教会占有大量土地后，用土地作为传教的唯一手段，谁想种地谁入教，不入教者不得种地。同时教友在生活上有困难，生产上缺耕畜、缺籽种，教会便给以救济。以小恩小惠，吸引人们加入天主教。这种传教方法在当时起了很大作用，特别是吸引晋、陕等地灾民，纷纷来此种地，加入天主教，以解燃眉之急。当时人们用顺口溜形容天主教的传教情况说：“天主圣母玛利亚，热身子跪在冷地下，神父，哪里拨地呀？噢来，宏盛义去种吧！”又说：“你为什么进教？我为铜钱两吊；你为什么念经？为了黄米三升”。

1883年，巴耆贤主教来到三盛公视察教务，任命闵玉清为第一任本堂神父，并在圣母堂举行了大礼“弥撒”，给教友行了“坚振圣事”。后在平罗召集会议，宣布罗马教廷手谕，将蒙古教区划分为东蒙古教区，包括热河代牧区和大同代牧区两个省教区；中蒙古教区，包括察哈尔代牧区；西南蒙古教区，包括宁夏代牧区和绥远代牧区两个省教区。荣升德玉明为西南蒙古教区第一任主教，因当时三盛公教友较多，遂将三盛公教堂定为主教座堂。

1884年，宁夏平罗所属红崖子、五堆子、下营子一带遭灾，那里的本堂神父桑桂仁，雇了两只大船把愿意到河套的教徒四十余家搬到三盛公。后于1885年陆续又来了一些，将一部分教友迁至河套大发公、玉隆永一带居住，租地五十顷，并在两地筹备创办堂口。先是玉隆永兼管大发公，至1890年大发公教堂又从郑万年手买到土地一百二十顷，人多地增，大发公兼管玉隆永了。管理此两地的神父先是庞孝爱，后是袁神父。此时河套地区已有教友不少，仅磴口地区就有一千五百余人。

1884年，德玉明又租种天兴泉土地十九顷，教务进一步扩大。是年，德主教赴北京参加主教会议，后来又去罗马教廷述职，而后回到比利时，以开办育婴院及其他慈善事业为名，募捐了一笔资金。于1886年又来到中国，继续担任西南蒙古教区主教，住在三盛公教堂。

三、三盛公大教堂及河套地区各堂口之建立

(一)

三盛公作为主教府，原来购买袁姓旧油房的规模显然已不适应。为此，1888年德玉明开始准

备修建三盛公大教堂。抽调荷兰人兰广济神父绘图设计，专门负责此项工程。所有木石等原材料，全靠兰州林大人由甘肃、银川等地购置，从水路转运而来。这个林大人正是原初跟随南怀仁来中国的林修士，后来在岱海滩娶了一个姓高的姑娘为妻，便离开内蒙到甘肃谋生，因为在兰州盐务上弄了个官衔，所以人称林大人。天主教利用这种关系，请他代办材料，筹备运输事宜。正在筹建伊始，德玉明主教于是年五月“圣神降临节”那天，偶患急症而逝。此后，委任三盛公教



此照片系三盛公天主教堂全貌，
摄于1918年11月22日，为林克所摄。

朱永丰供稿

堂本堂神父闵玉清为代理主教。1889年2月13日，罗马教廷调任荷兰人甘肃代牧区主教韩默理为西南蒙古教区主教。八月间，韩来三盛公就任，委任罗明坚担任本堂神父，将闵玉清调往小桥畔任会长职务。

韩到任后，建堂工程仍按原计划

进行。从1891年开始破土动工，到1893年竣工。大堂宏伟壮观，在当时当地是绝无仅有的建筑。圣堂占地一亩多（675平方米），呈长方形，南北长，东西窄。根基深挖近两米，底部用经久耐用的大块炭作基础，炭上铺有钻雕规格的条石，石条上砌着精制砖。堂高三丈（10米），堂顶用铁瓦覆盖，窗上镶嵌着五色花纹玻璃。室内布置整齐美观，有各种神态严肃庄雅的画像，设有大祭台一座，小祭台四个。堂院大门口上建一钟楼，高三丈许（近10米），上悬两口铜钟，敲起晨钟，声音洪亮，远在十里之外亦能听到声响。大堂内能容善男信女三千余人颂经祈祷。在极盛时期这一教区虔诚的教徒从四面八方云集在三盛公城里，车水马龙，人流如潮。特别在逢四大瞻礼或庆祝大典时，于临晨开始顶礼膜拜，跪在堂内院内的信徒唱经声朗朗动听，乐奏声悠扬缭绕，可谓这一地区盛况空前之聚会。

大堂东侧建有男校一所，设有教员室、教室、学生宿舍。距大堂三百米处的东北角建有小修道院一处，内有小圣堂一座，正中间为院长办公室。修道生的寝室，一边有自修室，课堂两座及图书室；另一边亦建有修生的寝室。校院宽敞远离其他房舍，独占一院，以示离开俗间，超然尘世。大堂西侧建一女校，另辟一院，其间有修女

室、女生寝室、自修室、课堂及收容幼儿的育婴院。大堂北侧正中间处建有主教小堂、主教办公室和卧室、神父住房、会计室、藏书室、灶房、餐厅等。

三盛公教堂既为主教府，亦为这一地区的主堂（领堂），它的管辖范围，西有金沙庙、南粮台、兴盛杨、富太奎，西南有双合成、旧地（1886年建）、圣母堂（1887年建），东有南套子，东北有天兴泉。其中南粮台建于1886年，经堂面积200平方米，当年贝清明在此任本堂；天兴泉亦建于1886年经堂面积250平方米，胡司铎曾任此本堂。1927年之后，迭因兵荒马乱，土匪蜂起，上述一些地区改为日常送弥撒点，逢大型瞻礼、庆典，教徒都亲三盛公颂经祈祷献仪。

大教堂建成后，又于1896年建立了围堡。其目的，一为防范出没无常的匪徒之骚扰，二为管理教务之便利。所以，大肆招募劳工，兴建围堡。同时，河套地区各堂口相继建起围堡。三盛公园堡建成后周长达三华里之许，墙高两丈，宽五尺，墙顶端有六尺高的隐身墙，四角建有守卫炮台，民团武装值勤人员可以在城墙顶部巡逻放哨。留有东西两门，堡内有东西门通道为界。北部区悉为教堂所占，北墙内植有桃、李、杏、枣等果树，辟有菜园，并雇有园丁种植蔬菜，内栽培着

葡萄，可自酿葡萄酒。南部为教民居住区，居住者约百十户。

值得一提的是，教堂祭台下面所建的地窖子。该地窖子与教堂同时设计，同时建成。设计的目的，是因为三盛公教堂是主教府所在地，凡在教区当主教而亡此地者，遗体皆存放此地窖子内，作为永存之物。这一作法也是按天主教会法典所示而行。但在使用方面三盛公天主教堂已破例，他们不但存放主教尸体，也存放神父尸体。此地窖子的面积占地五十平方米左右，高七尺余，顶部有见方尺余粗，长数十尺的三十多根松木大梁，梁上平铺着寸余厚的松木板，板间无隙，非常牢固。地窖子中间有一条小走廊，一边有6个窑洞，每洞只能存放一具棺材，另一边是个大房子。地窖子的门朝西开，使用时将死者入棺放于窑洞内，棺上注明死者姓名、年龄、职务、死亡年月日及国籍详细地址。如果6个窑洞都占满，则根据死者年限长短，将年限长者取出，安放在房子内，再将新亡者放在空下的窑洞内，以此类推。存放死者的棺材，多数为松木，个别的是柏木，棺材皆为鼓肚式，形美质优。到1949年解放为止，地窖子内共存有主教、神父尸体16具，其中主教两具，神父14具。除有6名神父的姓名无从查考外，其余是：主教德玉明（比利时

国)、石扬修(荷兰国)、神父邓德超(荷兰国)、贝清明(比利时国)、吕文化(比利时国)、常建春(中国)、方希圣(荷兰国)、彭寿年(比利时国)、梅布桂(比利时国)、包海荣(比利时国)。这些尸体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大约在5月18日前后由四辆汽车全部拉走,土葬于农建一团八连(乌兰布和农场)。

三盛公大教堂自建立后,即成为西南蒙古区特别是河套地区天主教活动中心。天主教的一些大型活动都在这里举行。三盛公天主教堂的七月大瞻礼尤其值得记述。天主教有四大瞻礼,即耶稣复活瞻礼(着白祭衣),约三至四月间举行;圣神降临瞻礼(着红祭衣),约五月间举行;圣母升天瞻礼,即七月大瞻礼(着白祭衣),阳历八月十五日(阴历为七月份)举行;耶稣圣诞瞻礼(着白祭衣),阳历十二月二十五日举行。这四大节日,全世界凡属于天主教体系者,都是同日过节。这里所要记述的是三盛公的七月大瞻礼。这个瞻礼即上面所记的“圣母升天瞻礼”,因在阴历七月份,教友们都把它称谓“七月大瞻礼”。这个瞻礼的弥撒,一般的是主教为主祭,称之为“主教大瞻礼弥撒”。仪式在圣母堂即原志盛隆遗址举行。此堂距三盛公教堂不过二、三里,在一个树园子中。每到七月,那里绿树成

荫，草茂花繁、蜂飞蝶舞，景色宜人。在那里有一座人造的假山，山上有一尊石膏塑就的圣母肖像，每年过这个瞻礼时，在假山上搭一个临时祭台，举行以主教为主祭的大礼弥撒仪式。

瞻礼这天，在临近的教堂或跨旗县区域的教堂内的神父，除留在本地区作瞻礼者外，其余也来三盛公教堂聚会。教友不但有三盛公地区的，还有来自银川、中宁、平罗、宁条梁、白泥井、小桥畔、城川、包头、乌拉特前旗、五原、中后旗、临河、陕坝等地区的忠实信徒。这些外省区旗县的信徒们，他们提前就聚集在这里，有亲者投亲，无亲者住店或住天主堂内，等候节日的到来。这些教友们为什么不在本地区过瞻礼，要在这里渡过这个盛大的瞻礼节？原因有二：其一，三盛公教堂是主教府所在地，又有圣母堂，这天又由主教亲作大礼弥撒。其主教地位之高高于神父，其瞻礼之隆重，他堂莫及，教徒远涉而来将一颗虔诚的心，亲献圣母台前以表其心之诚。其二，教友们认为圣母在天主耶稣面前能说上话。所以，人们把疾病、痛苦、危难、或儿女不孝，或家庭不和睦，或财产被损，或谋事不成，或畜伤禾枯等不利之事，寄托天主，向圣母许愿，请求她转告天主，变厄为吉，为民赐福。因此外区域念经者，多数为还愿而来。

瞻礼节这天，百余亩树林子内，车水马龙，数千人聚集在一起，真可谓人山人海。此时，这里成为最繁华的自由市场，小商小贩叫卖之声不绝，瓜果桃李，各色鲜菜，鸡鹅鱼肉，饼馍糖油，应有尽有。天主堂也宰猪杀羊，蒸馍焖饭，供外来的教友用餐。人们穿着节日的盛装，红红绿绿，争奇斗艳，来这里还愿念经，作弥撒祷告，求主赐福。在未作弥撒之前，先举行主祭仪式。由三个神父八个修道士，拿着耶稣像，去三盛公大教堂请主教作弥撒。此时，主教穿好祭衣，神父修士亦穿辅祭衣服迎出。顿时大铁礼炮四响，纸炮齐鸣，主教上路徒步走向圣母堂。跟随着有三位神父八位修士辅祭，三四十名女孩装圣母、扮天神、饰圣徒、演圣人，各仿其主，各模其表，身着异服，路撒鲜花。随后就是三四十名修道院生，着蓝袍、合双手，诚守教规，轻移脚步，缓缓向前，教友跟随其后，形若长龙，边走边念经祈福。一路上鼓声喧天，铎钹齐鸣。这支由“神人”教友、乐师组成的队伍、以诚心的祈祷，热切的祈求，缓步进入圣母堂。九点钟在圣母堂的祭台上开始了以主教为主祭的大礼弥撒。数以千计的忠诚信徒们，散跪在百亩园林之中，人人面向祭台，唱经念经，许愿还愿，各表赤诚，直至弥撒完毕。下午三点钟，开始了圣体降福，仪式

举行完后，是圣体游街。主教穿着祭圣礼服，请上圣体前行，后随整齐的长长的游行队伍，在鼓乐声中穿街过巷，绕城一圈进入三盛公天主教堂，将圣体放入天主堂圣体柜内。此时瞻礼仪式就全部结束。这种瞻礼大祭，至1947年后，因主教府迁往陕坝，再未举行。三盛公教堂文化大革命期间遭破坏。1980年又重新开放。

西南蒙古教区和宁夏教区历任主教名单如下：

一、西南蒙古——绥远(呼和浩特)宁夏教区

德玉明	主教	1883—1888
韩默理	主教	1889—1890
闵玉清	主教	1901—1915
葛堂德	主教	1915—1922
穆清海	主教	1915—1930

二、宁夏教区——三盛公——陕坝

费达德	主教	1922—1930
石杨修	主教	1931—1944
鲍恩波	临时代理	1944—1946
王守礼	主教	1946—1952
傅亭维	副主教	1948—1955
孙雪帆	代理主教	1956—1958
徐声波	代理主教	1958—1962
郝威	代理主教	1962—1980

郝 威 副主教 1980—1990
郭正基 主教 1990.11月25日祝圣
历任三盛公本堂
闵玉清、方司铎、石杨修、贝清明
罗明坚、狄司铎、吕文化、文清迪
樊静安、韩斯廉（以上均为外籍神父）
谢久敬、常西满、孙雪帆、徐声波
王世彬（以上均为中国神父）

（二）

除三盛公教堂之外，天主教在河套地区建立的教堂有大大小小几十座，现分述于后。

1、东堂：为传教士先驱德玉明等1875年来后套时落脚之处，原建有经堂一处，面积250平方米，并建有男女校舍。于1934年在原断壁残垣基础上，修复小城一座，环城约三里许。这里曾住有神父修女。

2、大发公堂：1884年建立。庞孝爱、费怀永等十几位神父先后管理此堂。

大发公为商号名称，属达拉特旗所管辖。当时这一代还有玉隆永、福义喜、庆丰全、世城西等商号，除经商外，并开设油房，缸房等手工作坊。此外还有地主多家，既种地，也行商，其中以杨寡妇、齐四毛人最为著名，齐四毛人有“大

老财”之俗称，杨寡妇除经营农业外，还开设了聚和齐商号。

1884年，西南蒙古教区主教德玉明委派庞孝爱、方正义二位比籍教士到大发公传教，二人抵大发公后，向蒙古政府租回土地五十顷开渠植树，发展农业。愿信教者，尤其穷苦人民，拨给土地，让他们安家落户。如是进教者日益增多。遂在玉隆永修建颇具规模的小经堂。不料改改喇嘛造反，经堂破坏不堪，不得已乃在大发公修建了一座更加可观的圣堂。据教友们说，这座圣堂内有大红柱两排，堂顶覆盖琉璃瓦，是一座过宗教生活的固定场所。

1900年全国爆发了以反帝爱国为主要内容的义和团运动，革命烈火也波及到蒙古地区，教区蒙古总管安九大人，为安全起见，及时把15名外籍教士送往乌兰巴托，取道西伯利亚回国。

1901年义和团运动彻底失败，清政府在列强的逼迫下签定了屈辱的《辛丑条约》，原派安大人护送回国的15名外籍教士，又匆忙整装上路，返回中国西南蒙古各传教区。

庞孝爱神父返回大发公后，见到经堂被焚毁，其他建筑也被夷为平地，乃重修经堂和其他建筑物。并将所杀教友名单呈报上级，求得抚恤赔偿，大发公教会的庚子赔款地就是由此而来

的。

民国15年冯玉祥进后套，成立临河设治局和垦务局，将大发公赔款地收回，放予农民挂领。庞孝爱调走后，由比籍费怀永神父继任。又从凉城等地迁来许多教友，作基层教友，当时大发公仅有教友50余户。

由于教友日渐增多，土地不敷应用，又向郑万年买了150顷地分给新奉教者经营种植。费怀永调走后，由陶德奠、文国华先后继任。文国华重视造林，于是开辟树林地30余亩，种植各种树木，其后由贝清明继任。为防备土匪骚扰，乃修筑城堡。当时这里的骨干教友有李凤成、白桥保、武明智、宿巴兔等户。

在文化教育方面，大发公天主教会也有贡献。教堂成立伊始，首先设立经言要理学校，在玉隆永有赵过记为男生讲授，在大发公有陈国贤为男生讲授。1913年成立初等小学，所学科目有国文、算术、地理、历史、体育等，用的课本都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学生50余名。第一任教师为马三虎，三盛公毕业。以后有于治邦、宿维邦、张永庭、杜素文等。女校成立较晚，在抗日时期，石杨修主教派朱淑斌、张户文、阎加拉、武文宣等在此教学。同时他们都能治疗一般疾病。对妇产科和眼科也能给以一般治疗。

文革期间，大发公教堂被关闭。圣堂、神父住屋及学校和其他房间均被拆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拨乱反正，落实宗教政策，三盛公、陕坝、渡口堂等教堂先后开放，教友又能过宗教生活了。大发公以张永林教友为首的教友代表也向政府提出申请，要求开放大发公天主堂。经过几年东奔西跑，上下联系，终于在1988年批准开放，教友皆大欢喜，于1988年8月25日举行了开堂典礼。杭锦后旗民族宗教事务局、统战部、公安局、巴盟天主教爱国会等应邀参加。教务委员会郭正基神父亦在会，大发公及附近教友来参加庆典弥撒者有400余人。

大发公自建堂以来，外籍神父任本堂者10人，计有庞、万、陶、费、贝、于、米、文等神父，国籍神父有郝、徐、马、刘。刘仲明神父为最后一任本堂职，教友800余名。

3、玉隆永堂：1884年建立。管理此堂神父先是庞孝爱，后是袁神父。

4、渡口堂：渡口堂为磴口县境内仅次于三盛公教堂的第二大堂。1902年建立。当时的渡口堂，还是一片茫茫原野，境内遍布红柳、河柳、白茨、芨芨等灌木杂草和沙丘，交通阻塞，行动困难。建堂开始由梅禄曼神父（比利时人）主持，从三盛公教堂的信徒中发动了一批强壮劳力，自

帶口糧早出晚歸，斬棘削荆，铲高垫低，开辟了一条由渡口通向三盛公的便道。随后，从老教区岱海滩移来的教徒中动员了十八户定居在渡口堂垦植。这批人的后裔有胡三喜、段二、武四、高从礼、高从智、刘四圪旦、韩克罗、胡宽子、张宣、武元仁、张爱、胡正义、张进为、孙福寿、张三海、张义子、邢寡妇、邢虎般、潘寡妇等。其后人健在的，现在还居住在渡口。

渡口堂座落在城北端，经堂后建有神父修女住宅、分隔在两侧。厨房、饭厅、储藏室、育婴室应有尽有。一所完全小学建在堂院东南端，女校在西南侧，书房一所，附设有诊疗所一处。1929年本堂神父吕文化修起占地约一百多亩的小围堡，将天主堂、神父住宅、男女学校、两个花园、菜园及部分教民住宅包围在内。邓德超第二次任本堂后，扩建城垣，于1930年动工，1931年竣工，又修起较大的城堡；将小围堡和村内居民全部包括进去。建堡费用除按居民占地多寡摊派一部分外，不足部分由天主堂支付。城堡东西宽280步，南北长380步，城垣墙铺底8尺，高1.2丈，上有隐身墙高6尺。扩建后的大围堡周长约四华里，四角建有碉堡炮台。民团武装人员可在上面巡逻放哨

守卫。留有东、南两处城门，西、北各留有小门，城门紧闭，出入行人得经侦询。城垣北外侧辟有大树园一处，占地五十亩，植有杨、柳、榆树，其间杂草茂密，多藏雉鸡野兔，为神父们狩猎游兴之处。垣内辟有五亩大的菜园两个，种植的葡萄可酿造葡萄美酒，供祭祀和神职人员享用。另辟出较大的菜园一处种有各种蔬菜。城内有南北街一道，南门直对经堂；东西街一道。南北街两侧有小型商店数处，食品干货店两处，大烟馆两处（庞富、王全福），绒毛商有天盛义一家。还有碾磨坊数处，大榨油房三处（天义圣、武元仁、高从智），漏粉房三处（范三眼、徐存才、赵仓）、药铺一座。

为了灌溉方便，清光绪29年即公元1903年马神父主持教务之时，开挖一新干渠即渡口渠，由南向北贯穿全境。此处政治、经济、水利、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一揽于教堂之手。后来国民党政权虽在此设有乡公所一处，辖保两个，甲二十个，而乡保人员悉为忠实的教徒所担任，所行事务需与神父或会长先行协商办理，才得以顺利进行。

渡口堂历任神父先有比利时人梅禄曼，荷兰人邓德超，后有吕文化、马神父、邓德超（二次）、贝清明、郝鹏翰、文海德。还有国籍神父

常西满、石玉安。

渡口堂历任会长有魏金柱、张太、段拉万、燕二树、徐四牛、李九合父子二人、吕来柱、张永清、李枝秀、樊五、朱福贵。渡口堂文化大革命期间，房屋全部被公社占用。1986年8月重新开放。

5、准葛尔地堂：1903年建立，首任本堂李鸿猷。该堂自1912年附属于黄羊木头教堂。先后曾有五名神父任该堂本堂。

6、补隆淖堂：1904年由比利时籍神父郎国安修建。经堂面积三百五十平方米。历任本堂有外籍神父郎国安、于广义、梁明善、戴德辉、高明道、中国神父郝若旺、孙雪帆、李枝荣、武慕安、冯进礼、李文枢。

补隆淖天主堂是磴口县境内第三座大教堂。1904年由比利时神父郎国安修建。它位于磴口县北端与杭后、临河交接处之乌拉河西侧，为磴口县第五乡所在地。它的区域为西至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之沈家河右侧，南端至坝楞乡之红盛义；东部靠总干渠；北至艾家湾子两苗树，总面积5500余亩。境内居民多为信天主教者，少部分人信奉佛教。土地权分掌在天主堂和地主袁、吴两家之手。沈家河沿西部边缘而流入今协成乡境，经堂座落在绥宁公路西侧。1929年

由戴德辉神父修建起围堡一座，周长二里许，经堂、学校、男女神职人员住所及诊疗所均包括在围堡内，居民围住在围堡的南、北、西三侧，马路西侧居住着回民若干户。补隆淖教堂次于三盛公、渡口堂的规模，但它是连接临河、杭后各堂的主纽带。旧社会磴口县虽与临河、杭后跨省而治，各不相关，但宗教事务的联系与管理并没有因此而受阻。补隆淖半径之内管辖的召滩堂就座落在临河境内，这里也建立过简易经堂，迭因河槽改道，杨家河、乌拉河平口引水之变迁，教徒居民不多，而改为补隆淖教堂之送弥撒点。补隆淖教堂自建立后，就常住有神父、修女、教书的先生，就地选用了会长、管帐先生。至解放前，教徒发展到一千多人。这个堂的特点是中外神父参半，大概是因此处教堂经济来源不大，教务又不繁忙所致。历任会长、掌柜先生有：刘王正、赵二楞、何起俊。1972年该堂被拆毁。

7、乌兰淖堂：1905年建立。首任本堂李鸿猷，先后十名神甫任本堂职。

乌兰淖是蒙语，汉语的意思是“红色的湖”。原来这里是荒芜人烟的大草原，只有少数蒙古人在这里放牧。1905年，外国传教士闵玉清主教任命李鸿猷（比利时神父）既开创蛮会教堂，也开创乌兰淖天主教堂。闵玉清事先向蒙

人租好了这一带土地，委托李艮艮、靳广贤二人负责兴修水利、开挖渠道。首先开的一道主渠名为乌兰渠，以后又兴开数道支渠。天主堂奠基后，地方居民又开了一道民生渠。该渠是向天主堂借款修的。这时三盛公的教徒听到乌兰淖天主堂开了不少良田，想来种地，当然天主堂是欢迎的，遂有贾六子、苏新亮、魏家弟兄三个，段福智、宋明元等二十余户前来安家落户，这些都是老教徒，给这里开教布道打下了基础。

1907年陕坝堂建成，李鸿猷神父主管蛮会教堂，而乌兰淖、陕坝暂由神父代管。以后，林允中（比利时神父）来乌兰淖任职。林到任后，先打起一道土城墙，将教堂、男女学校包括在内。以后，当地居民又修筑一道大土堡，将全村及天主堂围包在内。

圣堂及神父住屋也在这个时候建成。有树园地32亩，菜园地8亩，并设立男女学校。靳广贤、温雪帆、单同海、刘世锦、张玉峰曾任过男校教师，学生达八、九十人。陶佩贞、朱淑斌、张莫尼加、穆亚加大等修女都在女校担任过教师。1938年贾如英校长同教员宋钦帆呈请临河教育局备案，定名为太照乡天主教普爱小学。1940年以后，徐海容、宋钦帆等曾担任该校校长，孙玉如、刘克义、张偃荣、贺久运等任教

员。张广文、樊永华、韩亚清等修女在女校教学。

1926年吕文化调任乌兰淖本堂，当时教徒已增至900余名，旧圣堂太小，已不敷运用，遂另建大圣堂，神父住房也另行扩建，其他附属建筑也随即兴工。吕文化调走后，比籍教士罗明坚继任本堂，罗走后，国籍神父李世芳继任，以后相继有国籍神父陈宽明、比籍神父嘎天明担任该堂口本堂。1947年又调段万科国籍神父为该堂最后一任本堂。

1948年天主堂开设诊所，地址在女校内。担任治疗人员为集宁教区献堂会修女张国贤，是绥远公教医院毕业生，对妇科、儿科颇有研究。同会修女郭风兰、赵国贞也帮助治疗。诊所采用法国914、六〇六、美国盘尼西林等新药，效果甚佳，故前来就医者甚众。1958年张国贤到临河县火箭公社医院参加工作，从此天主堂诊所停办。解放前夕，有东北来的钱神父任乌兰淖本堂，为时很短，不久钱神父又到临河任本堂。

8、蛮会堂：1905年建立。首任本堂李鸿猷，先后15名神甫任本堂。

1905年闵玉清升为西南蒙古教区主教，委派李鸿猷到蛮会设立教堂，李到任后，首先向

蒙人租入土地百余亩，开垦修渠，将土地拨给入教者耕种，于是有多人报领入教。其后李鸿猷即建立一所砖木结构的小教堂，又将大发公的老教徒武三、郝威请来作基层教徒。三盛公、天兴泉一带的教徒也闻讯纷纷而来，如王二小、高二喜、白富贵、白林太、高旺、李宝等约二三十家。后又有萨县等地教徒数十家听到蛮会堂新开土地肥沃，慕名而来。

1910年李鸿猷调郎国安神父任本堂。因教务兴盛，教友日渐增多，郎国安随即大兴土木，修建一座三百余平方米的砖木石结构峨特式大圣堂，建筑宏伟壮丽，取名圣母堂。这时，蛮会已有教徒千余人，每天早晨做弥撒前，悬挂在二十多米高的钟楼顶的大铜钟被敲响，钟声悠扬凝重，十里外都可听见。

1914年郎国安调离蛮会，由德明善任蛮会本堂职。德明善到任不久，筑起一道方圆五里的土城堡，堡内三分之一为天主堂及教会学校所占用，其他都由教徒居住。村内并设有民团。

1926年冯玉祥将军在同奉系军阀作战失利后，率所部国民军第一军退驻河套地区。在此期间国民军曾将天主教堂包租的土地全部收回，然后再将土地放给农民耕种，此间双方虽有争执，但蛮会教徒基本上安居乐业，教务工作也

能按部就班进行，直到解放。蛮会教会历任本堂按顺序排列为：李鸿猷、郎国安、德明善、贝清明、林允中、文国华、石杨修、米化中、德维则、康国泰等，以上皆为比籍传教士。解放后，由国籍神父李化民任本堂职，直到1958年。

该堂建立后，办过一些文化教育及慈善事业。

1913年该堂成立普爱小学，分男女校、男校校院宽敞，校舍十多间。开始，学生八九十人，后增至二百余人。所用课本为商务印书馆及上海土山湾印书馆出版。所学学科有国文、算术、史地等，此外又加设音、体、美等科目。历任校长有王喜太、刘建章、刘文英、张宝河；教员有：刘春秀、王汝贤、樊沛生、冯国璋、刘建韦、侯秉功、王耀廷、侯世海、白子明、王建勋、王建南、马振华、谢久文、李永贤、李守成等。女校设在堂院外围，校院也较宽敞，校舍七间，学校教师一般由修女担任，除文化课与男生相同外，还增设女工课。历任修女有：李三爱、王若望、朱淑斌、穆进业、张广文、魏明哲、樊永华、高志清等。

1948年该堂又成立了医疗所。此时蛮会仅有高文魁、白子明、侯世海开设中西药铺，自教会开设医疗所后，给当地群众就医提供了很大

方便。曾经在此担任过治疗工作的医生有：张保拉、李枝贤、高志清等。她们都是在呼市公教医院接受过三年专业培训后返回工作的天主教修女，一般手术都能处理，所用的也多系西欧进口的药物，疗效显著。她们救死扶伤，一视同仁，颇受群众欢迎。该医疗所于1956年合并为联合诊所。1946年比籍教士康国泰在蛮会任本堂时，也同时行医，颇有名气，就医者络绎不绝，一般不收费，颇受社会好评。

此外，教会对那些无依无靠的老弱病残及弃婴等人也多收容抚养。如蛮会的三恭子、四瞎子，就是由该堂收养了几十年，直到教堂最后关闭，才成为五保户的。此外，马大小、马二小弟兄两人从小由教会抚养，供送上学，长大成人后，帮助他们成家立业，马二小还在教育战线上工作多年，又被选为杭后旗政协委员。高遂明、高二遂弟兄两人从小父母双亡，无人照顾，也是由教会收养成人的。到文化大革命前，蛮会计有教徒2500名。

9、陕坝堂：1907年建立。首任本堂任德清。先后8名神父任本堂。

1907年，内蒙教区闵玉清主教任命比利时传教士任德清到陕坝开创新教堂。当时该处是一望无际的茫茫大草原。有个西藏喇嘛名叫陕

坝，在这里定居放牧，后人遂称此地为陕坝。

任德清上任时已知该地原天主堂在1903年以前，已向该地区王爷在此租购了大片土地。任德清到任后，立即开始购买土地，治理渠道，先后曾开挖园子渠、沙壕渠，可灌溉万亩良田。天主教堂有大片土地在手，除吸引当地群众信奉天主教外，并将三盛公的一些老教徒也迁来陕坝作基层教友，如王子红、高增寿、胡宽子等。传教士特别重视儿童教育，建堂不久即设立了经言要理学校，教育儿童认识天主之要领。由于教徒日益增多，后来又修筑了一座经堂。

任德清调离陕坝后，文国华继任本堂，文在神父住屋东开辟四亩园地，栽种榆、杨、柳及花果树木。此外，还在城南开辟了一个大树园地（今杭锦后旗党校院内）。

文国华走后，石杨修任本堂职。石认为儿童为数众多，不但学经言，也要读书识字，乃于1913年成立初等小学（在此期间，其它各堂口都相继成立了教会小学，所用课本皆为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所聘教师，大多为三盛公公学院的毕业生，如徐四、张云高、党建义等。

1915年石杨修调走，邓德超继任本堂。此时陕坝教徒愈益增多，原经堂无法容纳，乃扩濬圣堂，又新建住屋数间，会计室一间，以及伙

房、库房、马厩等。教堂院落经扩建后，占地面积足有11,000平方米。日后又请来张老五将园子渠挖深挖宽，中游有大顺城渠，韩巴图两支流，全长30公里，引黄济渠之水，这时已有包头、兰州商贾往来通商。同时，杨家河子也接近修通，当地人也修了一些支渠，如三大股渠、大南渠、小南渠、公义渠等。由于大兴水利，荒滩变良田，外地人便争先恐后来此安家落户。如东川、萨县教徒党大弟兄等二三十家，伊盟小淖赵二等几十家。是时宁夏回民也开始向此迁移，住西沙壕，并修建礼拜寺。此外神木、河曲、府谷的教友也不远千里而来。建堂之初，陕坝居民几乎全部是天主教徒。随后，教外人也蜂涌而至。不信天主教者约三千余人。从此，商业日渐繁荣，不但有众多小商小贩，而且还有象义合成那样较大的商业字号，陆续开业。

1927年，邓德超他调，鲍恩波由三道桥调陕坝。鲍来后修建土城堡，将天主堂、男女学校、树园地尽围其中。并成立民团，报名者20余人，不穿军装，吃住自理，轮流守城。当时不仅常有土匪出没，而且散兵游勇也经常骚扰，所以筑城堡建民团，愈显重要。但民团力量薄弱，只能抵御小股土匪，而象杨侯小、赵半吊、李三河等六股土匪就无能为力了。这些土匪进城后，不

但坑害平民，有时将天主堂也洗劫一空。

1933年，鲍恩波调离陕坝，康国泰继任，此人善于交际，并且有高明的医疗技术，就医者络绎不绝，颇受社会好评。

1938年，归绥沦陷，傅作义将军转战晋北，1939年率军由晋北来到河套。其时，傅作义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来套后，将八大处和司令部均设在陕坝。从此，河套地区成为傅作义将军的抗日根据地。傅在陕坝，大兴土木，修缮市容，修建了中山堂和塞上新舍。傅与天主堂往来甚密，每逢请客筵会，即借用教会大餐厅举行。当时傅长官与苏联建立了友好往来，苏联政府曾派遣顾问团常年驻扎陕坝天主教堂，经常为军队上军事训练课。1945年日本投降，美国海军陆战队派部分人员来傅作义部下，组成中美训练班，驻扎在大顺城天主堂。

1940年日本飞机经常来陕坝侦察，甚至狂轰滥炸，最多一次是在是年夏天的一个上午，日机九架，列队由东而来，在陕坝上空盘旋两周后，投下许多炸弹。天主堂大院及普爱学校都中弹，但无人员伤亡，陕坝城内部分建筑物被炸毁，居民也有伤亡。

1941年，康国泰调往蛮会，周其智（国籍神父）任本堂职。这是陕坝第一任国籍神父担

任本堂。教友们无不欢欣鼓舞。周神父莅临陕坝时，普爱男女学校及教友千余人前往陕坝南门外夹道欢迎。

1945年抗战胜利，举国欢庆。1946年4月，在绥远公教医院任院长的王守礼（比利时神父）被选圣为宁夏教区的主教，5月2日由绥远穆清海总主教主礼祝圣。王守礼主教到任后，指定傅亭维为副主教，并于7月10日在陕坝成立普爱中学，委任孙仲贤神父为第一任校长。所聘用的教师皆为有才学的中外神父，又从北京聘请了一些大学毕业生来校任教，学校师资力量雄厚，教学蒸蒸日上，声誉大震。王守礼还派郭正基、马仲牧、韩进恒、方斗轩等神父到北京辅仁大学深造，选择了不少修女和教友女生到绥远公教医院学护士深造，准备普遍设立门诊和学校，但未全部实现。

1946年解放战争爆发，为了逃避战火，先后由集宁教区来了许多神父和修女，王守礼都收容下来，在教区服务。将献堂会修女先后安排到召滩、乌兰淖、三道桥、新堂、临河等堂口。1948年归化城神哲院也全部迁来陕坝，后又迁至三盛公，利用原女校校舍作为大修院的临时院址。1949年10月，“九·一九”和平起义后，又迁返归化市旧院址。

10、黄羊木头堂：1907年建立。首任本堂郎国安。先后有十五名神父任本堂。

11、三道桥堂：1923年建立。首任本堂鲍恩波。先后10名神父任本堂。

1922年，罗马教皇在中国的代表刚恒义主教将教区重新划分，原西南蒙古教区划分后包括河套、宁夏、陕北三地区为一个教区，命名为宁夏教区。由甘肃凉州调来荷兰籍主教费达德就任第一任主教。费就任时，随同而来的有七位神父，三位修士、三位修女，还有30余户教徒来此安家落户。主教命鲍恩波神父带领这30户教徒到三道桥定居。在此期间，教会在三道桥开垦大片土地，成立新教堂。将凉州来的这些教徒安排到沙沟渠落户，以后人称此地为凉州圪旦。

1921年由山西府谷迁来此地经营土地的大地主杨米仓在开挖杨家河时，向天主堂借了一大笔款，一时难以偿还，乃将其包租蒙人的土地转让于天主堂一部分。鲍恩波随将这些土地转让给教徒耕种。钱无利，地无租，双方皆大欢喜。鲍恩波遂在这里修建简易经堂，又设立经言问答书房和雏形小学，男教员有王喜太、胡开、温若望、女教员为王俊。直到1924年正式成立小学，扩建校舍五间，学生由30余名增至八九十名。后实行男女分校。男校聘请樊秀、张斌、赵

海生、鲁宗连、李文荣任教。1936年，石杨修主教派去修女刘马、钟亚加大、王伽拉、宋玛利等在女校任教，学生最后增至六十人，分了班级，又聘请傅瑞英代课。

1927年鲍恩波调往陕坝，于广义继任本堂。于到任后，培植百亩大的一片树园地，栽种杨、柳、桃、李，景致幽雅。先后由李二红、董二红经营看管。

数年后，于广义调离本堂到陕坝普爱小学任校长，蔡化民继任三道桥本堂。一年后，蔡又被调往上海，由贝清明任本堂。贝清明任职期间，教徒已增至七百多名。遂筹资修建一座颇具规模的圣堂。新圣堂宽敞宏大，装璜典雅，有大小祭台两处，配备有风琴，唱经班，每逢大瞻礼日，装点的更加富丽堂皇。此外贝又修建城堡，将圣堂、神父住房、男女学校，以及其他附属建筑和八家教徒围括在内。

二道桥和胡贵城（今杭锦后旗沙海乡）都是三道桥附近教徒比较集中的地方，每处有教徒二、三十家。为了方便教徒过宗教生活，在两处教堂修建了小型经堂及数间住屋，作为送弥撒点。贝清明在任时，要求主教派来国籍神父段云为副本堂，每星期日轮流到两处送弥撒，以后又于刘官府城（今杭锦后旗查干乡境内）三淖开设了送

弥撒点，主教派段万科神父到此担任副本堂，以解决送弥撒之急需。

1939年贝清明调往渡口堂任职。三道桥由段云神父任本堂。1941年，段万科另调，由国籍神父刘厚基充任副堂，不久就调往胡贵城任本堂，侯允希神父受命来三道桥补副本堂缺。

在抗日战争期间，日伪军于1939年冬一度攻占陕坝，并沿杨家河进犯二道桥、三道桥，后开往澄泥圪卜，在此期间，三道桥天主堂遭受破坏和洗劫。1940年，傅作义将军率部反击，攻克五原，全歼窜入河套的日寇和蒙伪军，此即著名的“五原大捷”。五原战役胜利后，段云神父下决心修复圣堂，重建家园。乃请示主教，给以资助，主教欣然允诺。遂从渡口堂运来大批木料，工人就地雇用，资金虽由教徒捐助一部分，但缺额甚多，后有人提议，杨米仓开挖杨家河时曾向天主堂借过大笔款项，至今未还，何不向杨家索要，于是请来杨家主事人四杭盖，说明情况。四杭盖通情达理，承诺补还八千元。资金解决后，工程进展迅速，七月初全部竣工，八月五日举行开堂庆典，邀请各堂神父教友代表及地方有关人士参加，与会者近七百人。

1943年实行新县制，三道桥划为米仓县，县府设在天主堂内。“九·一九”和平起

义，河套解放，米仓县建制撤销。

1945年日寇无条件投降，1949年解放。是年八月王守礼主教将段云和孙雪帆对调，段到五原任本堂，孙来三道桥。三道桥副堂仍是侯允希。孙雪帆在任期间，原来天主堂给教友的土地，都无土地证，孙委托郝德虎在地政局办了土地执照。

1947年三道桥天主堂正式成立门诊。李枝贤任主治医师，以后，又有献堂会修女周进勋、南宏义共同办所，这三位都是原绥远公教医院的毕业生，治疗技术高明，有丰富的临床经验，颇受群众的欢迎。

1948年南瑞光神父来三道桥任副堂，南调走后，刘国恩继任（南、刘都是集宁教区的国籍神父）。1952年，万斗轩神父由北京辅仁大学毕业归来，调任三道桥本堂，刘国恩仍为副堂，住堂修女为李枝贤、武文新、穆进业。

1954年刘国恩神父在一次施工事故中致残身亡。1957年万斗轩调往新堂任本堂职，从此，三道桥再没有住过神父，住堂修女武文新、李枝贤相继调离，穆进业因病死于陕坝天主堂，这一阶段只有宋钦一修女住堂，直到“文革”天主堂关闭为止。

12、圣家营堂：

新建营最初叫张大旗圪旦。张大旗原来是一

个地主，曾在哥老会任过官职。传说有高司令者，由外蒙大库伦率军撤退时，张为之扛大旗，因此当地人送他一个绰号“大旗”。天主堂成立后，改称为圣家营子，解放后，又改为新建营子。属临河县管辖（今临河市古城乡新建营村）。教徒三百余名。

该堂口建于1929年，创始人比籍神父于广义。建有经堂一所，土木结构，计五间，神父住屋两间，厨房一间。当时于代管五原及黄合元五户教徒。民国14年临河警察哗变，于广义被绑架，贝清明以现洋赎回。

于广义在职期间，曾筑起一个小城堡，将天主堂和五户教友包括在内。小堡后面，约有一顷大的树园地，栽有榆杨柳树。民国十四年成立民团，仅一年就解散了。

该堂成立男女学校，男校校舍三间，学生30余名，杜锦堂、张根桂、高步云、郝贵福等曾先后在此任教。女校建校初仅设立经言要理班，由邬老太太教学，后发展为初级小学，主教派修女王玛利、阎加拉、张广义、刘维民曾先后来此住堂并教学。校舍两间，学生20余名，所学课程与男校相同，该堂教友最后增至三百余名，教友多来自磴口县、东川萨县一带。赵太基曾任该堂会长。

1947年该堂设立门诊部，由刘维民修女担任治疗。刘维民曾在三盛公门诊当过助手，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所有药物及医疗器械皆由天主堂供给。刘修女待人热情，颇有救死扶伤的精神，凡来就医者，都能享受满意的治疗，故而来堂求医者，络绎不绝。

1929年于广义接任陕坝普爱小学校长，比籍神父米化中，调任该堂本堂，不久米化中便调往大发公主持该堂教务。此后圣家营子属大发公代管，每月由大发公神父送一至两次弥撒。1931年秋，新晋铎的段云任大发公副堂，于是每星期可去圣家营子看望一次教友。

1943年计善如（国籍神父）被调往圣家营子任本堂，计任本堂时，黄济渠水在鸭子兔出岸，圣家营子成了一片汪洋。因有土堡截水，教堂才幸免于难，居民出城只能乘木筏行走，最后居民移至三里外高处，挖地窖栖身。人们风趣地称此处为土家营。

1952年土改，计善如离任，韩朝枢神父（东北人）任本堂。1955年该堂关闭。韩朝枢任期仅二年。

13、新堂（在今杭锦后旗红旗乡境内）：
1923年建立。头三年由陕坝堂代管，1925年冯文汇为该堂首任本堂。先后六名神

父任本堂。

14、五原堂：1923年建立。开始由圣家营子代管，1925年，康国泰为首任本堂，后又有五名神父任本堂，从1945年起由陕坝堂代管。

1875年，比利时神甫德玉明西行阿拉善旗时，途经中滩（今乌拉特前旗）西山咀到达五原（当时五原县尚未成立）保德树、黄合源等地，曾在此住过一段时间，亦略有收获。乃又向西行到达阿拉善王爷地大力发展教徒，成立了十数个教堂。

五原自王同春、瞎陈四等人修渠开荒后，种植业大为发展。于是外地人前来耕种者日益增多，固阳、萨县等地天主教徒亦有来者。但此时五原还没有天主教堂。

1923年圣家营子教堂比利时神父于广义任本堂时，代管五原教友。教区主教会也在五原发展教会。于到五原后，即先到保德树、黄合源等地，企图在先驱者德玉明住过的地方发展教徒。岂料此地教徒因耳闻磴口县教会发展情况，已绝大部分搬到磴口去了。他到乡下四处寻找，经了解教徒四处散居，且对教会的道理经卷有些生疏。乃派常二喜、冯国璋二人赴五原传道，并计划在五原城内成立经堂。但因于某不久被调走，计划未能实现。

1925年，教区主教委任比国神父康国泰为五原本堂。康到任后，购买了贾某前后两处院落。院东尚有菜园，总计面积九亩余。然后将原有房院进行修缮，有的改建，有的扩建，并将两院改成中、南、北三院。东设经堂，北院为神父住房。神父住房门前栽杨树六株，院内种有桑树，夏季花草繁茂来此地观玩之人不断。本堂康国泰懂医学，常给附近的人治疗疾病。

1932年康国泰调任陕坝本堂，比国神父郭某某调来继任。郭修有鸽楼，养鸽数百只，常用雏鸽改善伙食。郭某调走后，中国神甫李世芳接任。抗战时期李调乌兰教堂，傅亭维神甫继任，刘厚基充当副堂。此时院内设立门诊，修女李三爱和武某二人主持医疗。李曾在归化城的医院学习三年，有医疗技术，前来求医者甚多，有时也为妇女接生。

1940年教区主教将两修女调走，门诊停业。

1939年傅亭维他调，孙雪帆继任。孙某善于交际，接触面广。当时在五原驻扎的三十五军和地方机关内有不少教徒，每到星期天必来堂祈祷。

1945年抗战胜利后，孙雪帆和三道桥本堂段云对调。段曾在三道桥开设门诊，到五原后

仍操旧居业，但只着重外科。

1947年段买了贾某的一处院子。其院紧靠天主堂东院，足三亩大，有土正房五间，尽让教徒住。

1948年国际上组织了个救济团体，取名“华洋义赈会”，以解救因战争而生活贫困之群众。河套地区亦得到一部分救济品，如大衣短衣及布匹等。这些救济品先运到陕坝，然后再发给各县。规定由地方各教会出人组成一团体去领取，领回去再发散。五原县派段云神甫去领取。段云到陕坝后，将五原和安北县的救济品满载一大汽车运回。发散时有政府人员、耶稣教、红十字会、天主教出人共同参加。

1950年五原堂教友人数共计300余人。这些人如上述所说并不全是当地的。有抗战时期由内地来的数十户；解放后由山西朔县来的有七、八户，住在梁团长圪旦（如郑、陈、康、张等人，内有张子静，以后到县卫生院工作，现在五原县中医院当大夫）；由河北献县来的段显阳弟兄两家及姓刘的一家，这些人都住在堂院；还有其他的都住在乡间。

十年动乱期间，五原堂遭“红卫兵”洗劫。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五原教堂恢复宗教活动。神甫一年两次去看教友。在袁庆、武振华住

的院内行祭，教友踊跃参加。1984年王泽普在该院东边建筑两间土房，教会以二千元收回作为经堂。开堂前由徐瑞祥负责管理。1986年夏徐瑞祥去世后，现由武德聆负责。五原境内有教徒500余散居各乡，城内亦有十余家。

15、临河堂：1929年建立。1937年由陈宽明任本堂，先后三名神父任本堂，1957年由陕坝堂代管。文革期间关闭。现又重新开放。

16、大顺城堂：1936年建立。首任司铎戴得辉，先后五名神父任本堂。1953年后由陕坝堂代管。

17、召滩堂：1948年建立。首任本堂宋连明，继而杨华。1955年取消，由补隆淖堂代管。

18、十八顷地堂：1950年至1951年12月29日由史东昌任本堂，该神父被驱逐后，由蛮会堂代管。

此外，在磴口县境内，还有南粮台、富太奎、旧地、圣母堂、天兴泉等堂口。天主教堂几乎遍布河套各地。

四、天主堂办学情况

天主教为了吸引农民信教，在采取谁信教给谁地种的同时，还创办各级各类学校，招收大批儿童入学。虽然其目的是为了扩大教会影响，培

养忠实信徒，但能拨款兴学，就人烟稀少，文化落后的河套地区来说，客观上对提高人民的文化与科学水平起了极积的作用，产生了一定影响。现将天主教堂所办学校简述如下：

（一）普爱小学

1、三盛公小学

1880年，天主教堂首先在三盛公办起三盛公小学，其中分设男女两校。学生来源主要招收教徒和附近居民子女。建校初期学生只有三四十人。教学内容以经言问答为主，兼学文化课，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民国建立后的1924年才开始学习国文、算术、史地。女生兼学缝纫、刺绣、手工工艺。同时也注意体育锻炼。学校行政管理权由本堂神父掌握。办学经费，包括教师聘薪、学生膳食费乃至部分贫寒学生的衣着费用悉由教会捐助支付，这就为教友和教外农民的子女入学提供了方便条件。1893年，三盛公大堂落成后，学校又重新修建了崭新的男女校舍。男校教室八间（大堂东侧），女校四合院一处（大堂西侧）。这些校舍的建筑坚固美观，是当时当地仅有的宏伟建筑，至今近百年依然存在。男校教师多属清末老学究和忠实信徒。女校教师均系中外修女。学校从培养忠实信徒出发，给学生灌输信德、哲理，

以学习宗教礼仪为主旨，也对学生进行道德伦理教育。学制为六年。男生毕业后一部分继续升入小修道院学习，一部分则回家劳动。女校学生毕业后，如自愿守贞，即由教会保送萨拉齐（今土默特右旗）巴拉亥女校学习，该校是一所为培养修女而专设的学校。

1924年，女校改名为女子高级小学，主要吸收河套各教堂学校毕业的教徒女学生。初期学生仅五十人，后增到近百人。校舍及教学设备完善，环境优美。所学课程除按国家教育部规定之科目外，兼学圣经要理和唱经。学生一律住校，膳食费及书籍用品悉由教会供给。学校有专职修女负责管理，制度严格。学生一经入学，不得随便请假离校，只有寒暑假方能回家探视。家人来访也得按指定地点和时间进行，不得在校住宿。学生下课休息或课外活动都要集体游戏，不得擅自行动。宿舍、饭厅内不准随便谈话，不准和男校学生互相往来。所定校规学生必须严格遵守，如有违犯，要给予处罚。

女校毕业的学生如自愿深造，经教会审核批准后保送宁夏师范学习或绥远公教医院学医，旨在为教会培养师资和医务方面的中高级专业人才，使她们当修女后能从事教学或医务工作，为教会忠实服务。该校历届毕业生中守贞当修女的

有：武芳济、魏明哲、樊光临、李文清、张敬珍等十余人。从该校毕业后升入其他院校并有所成就者亦为数甚多。如傅希贤现为北京医学院大夫，韩梅芬是上海第二医学院毕业生，韩梅芳是苏州美专毕业生，陈玉琴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史学系，现任大同中学教师，周广英是北京辅仁大学化学系毕业生，现在北京制药厂工作，李桂珍现任宁夏中卫医院院长，李德芳等数人均在呼包二市从事医务工作。

2、渡口堂小学

天主教在磴口地区成立的小学中，规模最大的是渡口堂小学。该校于1905年开办，实行男女分校。

渡口地区教徒比较集中，天主堂为使信教儿童从小受到宗教教育，最先是开设短书房，利用农闲季节招收部分未入学儿童学习，内容是经言问答，这是入小学前的基础训练科目，一年期满后，背诵成绩合格，愿上学者送入小学校（当时称为常书房）继续学习。

这所学校创建时间较早，开始规模不大，是一所初级小学。当时办学条件简陋，直到1947年教堂才购买了当地农民张文忠院落一处，作为教室、办公室、厨房、库房，并开辟了体育场，增加了班级，扩大了招生名额，由初级

小学扩展为完全小学。

开设课程和国立小学相同，教材采用国民政府教育部核准的统一教材。招生对象除教徒子女外，也招收教外学生入学。对教外学生，平等相待，不强求他们学习宗教礼仪和过宗教生活。学制为六年。从该校毕业的学生一部分经过考试可入陕北普爱中学，有的也可报考其他中等学校学习。

3、补隆淖小学，东堂小学，南粮台小学、天兴泉小学

补隆淖小学是天主教在磴口地区创办的规模较大的第三所学校，创建于1906年。东堂小学，南粮台小学，天兴泉小学于1886年先后建立，开始均为单班小学校，各校学生不过十儿人。上述学校除南粮台学校外，其他几所小学逐年都有发展，解放后成为全日制完全小学。

1942年，宁夏教区所属天主教办的中小学，在补隆淖上套以南者，校名一律冠以“明正”二字。补隆淖以北下套地区的学校，校名一律冠以“普爱”二字。天主教在磴口有三盛公、渡口、补隆淖三所明正中心小学和东堂、天兴泉两所明正初级小学。上述五所学校解放后于1952年全部交由人民政府接管。

4、三盛公修道院

天主教传入中国，教会享有很多特权，所办

学校一切由教会管理。教务活动大多由荷、比、德等外籍神父掌握。他们深知天主教要在这一地区源源传续下去，不断扩大影响，壮大势力，单靠外籍神父是力所不能及的，必须培养当地国籍神职人员，补充扩大传教队伍。因此，各大教区相继创立大小修道院。原西南蒙古教区主教闵玉清，在主教座堂所在地三盛公，于1887年成立了小修道院。初期因校舍尚未兴建，人员配备不齐，便暂时和三盛公小学合并上课，仅一个班，学生十儿人，开设课程除国文、数学、史地外，还学拉丁文，并专设神修课，学制六年。学生毕业后有志继续进修，经多方考核符合条件者，由教会保送进入高一级修道院，即神哲学总修院。三盛公小修道院第一届毕业生段世忠、张怀义二人祝圣为司铎，是西南蒙古教区所属的河套第一批国籍神甫。段正是现在陕坝本堂神甫段云之伯父。

1893年，因学生不断增加，原校舍容纳不下，乃另行修建校舍。新建校舍有院长室、课堂、寝室、膳堂、小经堂等。采取隔年招生的办法，随着办学条件改善，增加了班级，增设了课程，扩大了招生名额，配备了专职教师，使学校步上正规。

1905年，闵玉清决定把西南蒙古教区东

迁萨拉齐(现土右旗)二十四顷地天主堂,因该地村庄多,人口集中,利于传教。当时由于二十四顷地天主堂正在维修,故将三盛公小修道院临时迁移到萨拉齐小巴拉亥,直至1910年二十四顷地修道院校舍落成,才将小修道院正式搬迁到二十四顷地。自此,西南蒙古教区所有小学毕业生,凡自愿修道经考核合格者,即送入该校培养。当时院长是吕文化,后来由徐正鹄接任。课程除原设课程外,加设法语一门。学生由三十名增加到六十名。康景东、郝道宾、王文昌、傅亭维、苏玉亭等人就是在该院毕业后继续升入总修院的。除苏玉亭外,其他几人于1920年至1923年先后晋升为司铎。1927年孙雪帆、白祥晋升为司铎。1930年郝若望晋升为司铎。1931年周其智、计善如、张升文、段云晋升司铎。1932年,天主教在上海召开主教扩大会议,重新调整天主教区,将西南蒙古教区划分为绥远、宁夏两教区。

绥远教区包括归绥(今呼市)、包头、武川、固阳地区;宁夏教区包括宁夏、河套(今巴盟地区)以及陕北定边、靖边、安边一带。同年原蒙古教区通力合作在山西大同建立了大同天主教神哲学院。自此,绥远、宁夏两教区小修道院毕业生均转入大同神哲学院总修院学习哲学和神

学。一九二二年宁夏教区由甘肃凉州调来荷兰籍神甫费达德任主教，主教座堂设于三盛公。于一九二四年在三盛公又恢复了原来的小修道院，首任院长为冯文汇。招收新生二十四名，分设两个班，即大班、二班。大班四人，二班二十人。课程设置有国文、数学、史地、动植物兼以《幼学四书》、《东莱博义》、《千家诗》、《纲鉴易知录》，并开设拉丁语。除上课自习外，要按时诵经祈祷。从四年级起加学法语，后改学英语。招生定为二年一次，招收名额约二十人。院长先后由比籍神甫冯文汇、罗明坚、德维则、樊静安、裴高德担任。直到1946年才由刘静山担任院长，从此，小修道院的领导管理权才由国籍神甫所掌握。

这所小修道院从成立到1951年停办，历经六十四年，先后为总修院和大同总修院输送修士六七十人。其中神学毕业晋升司铎者四十五人，直接出国留学二人。有的修士晋升司铎后先后考入原北京辅仁大学深造，也有的考入其他大专院校深造。这所修院为教会和社会培养输送了不少人才，在宁夏教区的教务发展史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5、三盛公公学

自西南蒙古教区划分为绥远、宁夏教区之

后，当地人口逐年增加，这两个教区的教务活动很活跃，教徒数量也随之增加，教徒和当地群众子女入学要求越来越迫切，加之教会要为修道院培养输送修道生，原三盛公小学已远不能满足要求，于是天主堂将原小修道院的校舍加以扩建，创立了三盛公公学。学制为三年。招生对象是河套各堂口小学四年级以上学生（包括四年级）。校长先后由吕文化、石杨修、冯文汇担任。教师聘任神甫宋某、孙某、冯辅斌、王太喜、刘静仁等担任，学生约七十人。教材采用教育部规定的统一课本，除开设国文、算术外，还加学四书、唐宋八大家诗文，教会经言要理也穿插进行。学生毕业后，如自愿报名修道，经教会审核批准，保送二十四顷地小修道院学习。由该校进入修道院的有孙雪帆、宋显等十人。未能考入修道院的学生教会择优聘用为教会小学教师。当时河套各堂口的小学教师基本上都是该校的毕业生。

1924年，三盛公小修道院恢复后，该公学迁至陕坝，改名为陕坝公学。1925年更名为普爱小学。

6、临河等地区教会学校

临河等地区教会学校甚多，其中，横舟高级小学校远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成立，原

址在三盛公，民国11年（1922年）移太安镇，建筑齐全，设备完善，为教会学校之最优者。其他各校皆于民国初期先后设立。惟功课未能遵章教授，校长由神父兼任，教员均以笃实信徒充任。兹将临河等地教会学校列表如下：

（二）普爱中学

1946年9月，天主教在陕坝建立了普爱中学。这是天主教会私立的一所完全中学。

1946年9月，王守礼出任天主教宁夏教区主教后，就在陕坝着手筹建普爱中学。当时在绥东天主教办的中学有：归绥市的恒清中学，包头的培英中学，集宁的平澜中学。教会建立这些学校的目的都是为了传播宗教教义，扩大其社会影响。但客观上对发展绥远地区的教育事业，在培养人才方面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普爱中学建立后，第一班招生50名，开学时，因校舍未建，只得借用陕坝天主堂私立普爱小学南院房舍暂作教室。创建时王守礼主教任命罗马传信大学的毕业生孙仲贤神父为普爱中学校长，教师一半以上由神甫担任，如傅亭维、武慕庵、陈宽民等，缺额由地方教师担任，如张国良、纪有兴、宋海潮等。课程设置有：语文、数学、英语、理化、动物学、植物学、矿物学、生理卫生，还有《童子军》课，由傅作义的部将宋海潮兼任教

学校名称	地 址	建校年月	学生班次人数
横舟高小	太安镇	民国十一年	六班一百二十人
太和镇小学校	太和镇	民国四年	八班二百五十人
大发公小学校	太熙镇	民国四年	二班四十人
侯家营子小学校	太守村	民国四年	四班六十人
王亮滩小学校	太安镇王亮滩	民国六年	二班三十人
乌兰淖尔小学校	乌兰淖尔	民国五年	四班二十人
黄羊木头小学校	太和村黄羊木头	民国四年	四班二十五人
三道桥村小学校	平治村	民国八年	二班三十人
太安镇女子小学校	太安镇	民国十二年	五十人
太和镇女子小学校	太和镇	民国七年	四十人

师。与普通中学所不同的是，普爱中学还设有宗教课，各班每周一次，由天主教神甫陈宽民讲授。

1946—1947年这两年，学校只招收男生，不招收女生。

1948年在陕坝天主堂普爱小学的北面建立了新校舍。其房舍有：办公室、教室、宿舍、食堂、还有平坦的运动场。教室东面有宽广、幽静的校园，每到风和日丽之时，杨柳吐绿、芳草含新，百花飘香，鸟语蜂忙，景色秀丽，令人心旷神怡，真是一个学习的良好场所。是年秋开学，就迁入新校舍上课。

在新校舍建成以后，学校逐年又新建了图书室、化验室。文体方面的乐器、运动器械也应有尽有。这时学校的设备基本上完善了。

普爱中学从建校到停办的五年中，各年招收的班级和人数如下：

1946年招收一个班，1947年招收一个班，1948年招收两个班，1949年招收两个班，1950年招收三个班，前后共招收九个班，学生人数最多达四百至四百五十人，女学生占四分之一，信教学生占三分之一。

学校教师除由资历高的神甫如：庞世宏、李成志、孙仲贤（校长）、德隆教（荷兰籍）、池瑞章、侯允希、王甫田、武慕庵、陈宽民、常

非、杨华、邓作光、傅亭维等担任外，尚有从北京辅仁大学、天津南开大学、兰州大学招聘来的徐有明、赵凤鸣、杨成名、李继祖等教师。在当地聘请的教师有：张国良、徐宝善、孙玉、邢怀义、李贵珍、冯国祯、赵国兴等。师资质量是比较高的，教学要求也是很严格的。

学校的最高权力机关是校董事会。董事长由王守礼主教担任，其他董事由校长和社会士绅担任，如陕坝商务会会长王乐天等人。重大问题都由董事会决定。学校设校长一人，下设教导处、训育处、总务处。各处分别设主任一人，干事若干人。学校校长一直由孙仲贤担任。教导主任先后由武慕庵、庞世宏担任。训育主任先后由王甫田和侯允希担任。总务主任由傅某担任。

1948年秋，学校谱写了校歌，校歌的词曲作者分别为庞世宏、杨华。歌词如下：

阴山苍苍，河水茫茫，昔日胡马嘶风，铁衣寒光；今日宇榭亭阁，明窗几净柳荫堂。诵声朗，轻歌扬，教育着活泼的少年郎，慧光如帚，扫除了西北的多少文盲。慈祥温良，慰暖了青年的心房。安如海滨的灯塔，驱走了暗魑魔障。它有基督的精神，情爱的心肠，抵击了人间的残暴，消除了世界的凄凉，建设起温情的吾灵地堂。它正在为国家培植英才栋梁。这便是我们的普爱——塞

上曙光。我们要永远爱它，永远爱它。我们的品行该如惠兰那么清芳，我们的学识许似黄河那么深长。喜桃林清书，莫慕紫薇郎，若涛涛春江，日日应自强，让母校爱的光芒普照无疆。

学校在1948年侯允希担任训育主任时，由陕坝镇和平小学聘来一位姓梁的老师。其人擅长书法、乐器和戏剧表演，在教导处任教务员。他组织同学排练晋剧，曾演过《三岔口》、《走雪山》、《打官门》等晋剧。石平云、石靖国等同学当时是名角。每逢节日还搭台演出，博得校内外好评。解放后在1949—1950年间，还排演过《刘胡兰》、《害人的一贯道》等大型歌剧及《兄妹开荒》、《红布条》等小型秧歌剧，有力地配合了当时土地改革和反霸减租运动。

五、天主教的“三自革新”爱国运动

1949年全国解放以后，以王守礼为首的河套地区天主教堂内的极少数神职人员，他们在帝国主义分子黎培里的指使下，积极筹划在河套各教堂成立“圣母军”这一反动组织。1950年王守礼派李世芳神父去北京与“圣母军”组织联系。李回来后，首先在河套各堂口组织了“圣母军”，继而在磴口县各天主堂也建立“圣母慈爱祈祷会”。他们散布反动言论，说什么第三次世

界大战就要爆发，美国原子弹如何厉害，阻挠青少年加入共青团和少先队，破坏教学活动等等。坚持反动立场，与中国人民为敌，仇视中国共产党与人民政府。为了保障人民利益，维护社会秩序，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1951年根据上级指示精神，河套地区坚决取缔了圣母军，并对其主犯给以应有的惩罚。

1951年，和全国各地一样，河套地区爱国神职人员及其教友，高举爱国主义旗帜，积极响应四川省广元县王良佐神父提出的“三自革新”倡议。是年春，在陕坝成立了天主教“三自革新”委员会，开始了反帝爱国斗争。首先让王守礼辞职，把管理教区大权让给中国人办理。1952年在“三自革新”委员会的领导下，爱国神父和教友驱逐了外国神父岑化中、魏允新、文德海等。最后又驱逐了王守礼和德龙教。在党的领导下，该组织协助政府有计划地定期组织神职人员学习时事政策，座谈讨论宗教方面的有关文件精神，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分清敌我，明辨是非，坚决走爱国爱教的道路。

1956年5月，成立了河套教区天主教爱国会，由孙雪帆神甫担任主任，郝威神甫任秘书。同年孙雪帆代表河套教区，出席了北京召开的天主教爱国委员会成立大会。1958年孙雪

帆因执行王守礼指示被捕，由徐声波神父担任代理主教。同年六月召开了巴盟天主教爱国会改选大会，会上改河套教区为巴盟教区，改河套教区天主教爱国会为巴盟天主教爱国会；将代理主教改为教区长，会上选出了新的领导班子，徐声波被选为巴盟天主教爱国会主任，郝威被选为副主任，王世彬被选为秘书长。同时选出了巴盟天主教教务委员会成员，徐声波为教区长，郝威为副教区长。从此天主教在河套地区才算真正摆脱了外国传教士的控制，开始由中国神甫自主办教，开展教务活动。

1958年人民公社化后，将巴盟各堂口进行了规划，除陕坝和三盛公两堂作为重点外，其它堂口均定为“送弥撒点”。同时组织神职人员，参加社会服务，种园地、搞医务，参加缝纫组等。是年秋将爱国会由陕坝迁到三盛公。

1959年巴盟政治学校成立，组织所有神甫修女参加了学习，当时杨志荣同志担任教育长，他号召神职人员自谋职业。由于神父修女积极响应，大家都参加了巴盟政协综合服务厂，由郝威任厂长，王世彬任副厂长，除李广信、王睿明是磴口县小学教师，李云卿在供销社工作，樊光临在政校当校医外，其他人员均为服务社工人，投入生产第一线。

1962年5月在巴盟政校（三盛公）召开了全盟天主教爱国会常委扩大会议，会上郝威当选为爱国会主任和教区长，王世彬为秘书长。同年秋郝威出席了北京天主教爱国会第二届代表大会，并在会上当选为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委员。天主教爱委会在这段时间里，着重搞了河套传教史的编写工作，至1964年写出了四万字的初稿。

1981年6月召开巴盟天主教爱国会第二届会议和巴盟天主教教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郝威被选为主任，李文枢、王世彬、刘静山被选为副主任，石玉安为秘书长。根据工作需要，进一步加强和健全“两会”机构。1984年6月13日至20日，召开巴盟天主教“两会”扩大会议，神职人员和教友共50余人，欢聚一堂，学习中央文件，大家心情舒畅，畅所欲言，在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的基础上，选出两会新的领导班子：主任郝威，副主任郭正基（兼秘书长）。李文枢、王世彬、李化民、石玉安（兼副秘书长）。会议结束后又召开了常务委员会，进行了各堂口的人事安排，决定了三盛公、陕坝天主堂本堂、副本堂和住堂神父。

爱国会自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团结广大神职人员和教友，发扬爱国

主义精神，拥护社会主义，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爱国会协助政府宣传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落实教会遗留问题，彻底平反冤假错案；配合本堂神父恢复、维修、开放教堂，满足教友正常宗教生活；协同教务委员会办好教务；开展与国际天主教人士的友好往来；向呼市、北京推荐修道生5名，举办修女初学班；对年老体弱的神父、修女和其家人生活上有困难或生病遭难的教友，爱国会进行走访、慰问，给予经济补助，发挥了联系教友的桥梁作用。

⋯ ⋯ ⋯

作者后记，本文在搜集整理成文过程中，曾得到段云神父、樊永业神父及阿盟阿左旗政协同志及阿左旗档案馆提供的资料，在此一并致谢。另外，需说明的是，为全面系统起见，将《磴口县文史资料》第六辑上刊登宿心慰、朱永丰二位同志所写的文章的部分章节摘录纳入本文。

庚子赔款在磴口引出的风波

赵忠贤 张文忠

鸦片战争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教会和传教士在中国沿海地区活动已很广泛，那时，他们就妄图用十字架征服中国。鸦片战争后，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同英、美、法、俄、德等帝国主义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出卖中国主权。中国封闭的大门被彻底打开。不平等条约紧紧束缚着中国人民的双手，而给外国教会和传教士创造了有利条件。传教士们进一步伸入到中国内地和边疆。1864年前后，欧美的天主教、耶稣教和沙俄的东正教，依靠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向中国派遣的传教士越来越多，沿海和内地已经形成教会的势力范围，边疆地区如西南蒙古一带，也逐渐被教会所占领。他们在那里建立教堂，广收教徒，收集资料，干涉诉讼，利用民族矛盾，进行文化渗透，并为本国政府出谋划策，攘夺中国利权。中国人民对此极其痛恨，不断进行反抗。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末，反教会斗争一直是近代中国人

民反帝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显示了中国人民的强大力量，而且进一步激起了爱国热情。

1900年（农历庚子年）终于爆发了震撼全国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

义和团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帜，矛头首先指向外国传教士。义和团烧毁教堂，驱逐教士，斗争烈火很快燃遍沿海和内地，也波及到边疆西南蒙古一带。

1900年6月，居住在二十四顷地的西南蒙古主教韩默理闻得风声不好，便让他手下的六名神甫潜逃到阿拉善旗三盛公。而他自称主教任重，不能放弃职守，便纠集教民与义和团抵抗死守。七月二十日守城陷落，死伤教友一百二十多人，教堂被焚毁，教民逃散，韩默理主教于七月二十四日在托克托县被烧死。

在义和团运动迅猛发展之时，阿拉善旗政府命令所属磴口、道兰素海、哈拉和尼图、沙金套海日巴格总管阿木尔吉日嘎拉（安九大人），迅速遣散住在三盛公的外国传教士。当时有三盛公教堂比利时神甫冯学源、戴天禄、司怀义、郎国安、包海容五人，二十四顷地逃来法国神甫蓝广济、雷中和、贾名远、魏怀仁、费怀勇、吴兴国六人，下营子逃来荷兰国教士王万福、梅百魁二人，乌兰布日格逃来比利时神甫步世明、胡际

昌二人，计神甫十五人，准备向乌兰巴托（大库伦）逃遁。这些传教士想逃走又无法走脱，便派他们的教民贾达、张八魁子、孙先胜以及孙章俊等人去见安九大人，请求安九大人帮助和保护他们。安九大人同意了他们的请求，借给他们骆驼二十四峰做骑乘，驼鞍24个，白面400斤，皮靴五双，铜锅一个，大布帐篷一个，路费白银二十七两六钱，连同以上所借东西折合白银共计1138两6钱。并雇用准格尔旗蒙古人玛西和一位汉人二贵子送他们。又派二十名蒙古兵，护送十五名神甫，于1900年7月29日起程行四十二天，始抵蒙古乌兰巴托，后十五名教士搭西伯利亚火车返国。洋神甫们临走时，恳求安九大人，在他们走后，保护教堂，照顾教民，把三盛公教堂周围小教堂拆毁、东西放在三盛公教堂内，安九大人也同意了。外国传教士走后，安九大人派兵保护三盛公大教堂，按洋人要求拆了三间小教堂，把木头等存放了起来，并给缺衣少食的教民按月发了粮食，发了衣服。

1901年，义和团运动失败，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被迫同英美等十一个国家签订《辛丑条约》。条约规定中国赔款白银九亿八千万两。外国传教士又乘机卷土重来，全国各地教堂纷纷向当地政府勒索赔款。三盛公教堂主教闵玉清返回

来后，也捏造事实诬告阿拉善旗，借口三盛公教堂周围小教堂被拆毁，要阿拉善旗赔款。先是要求赔银三十四万两，几经交涉又由三十四万两压缩到二十四万两、十八万两、八万两，最后以五万两达成协议。这些赔款并不包括在清政府整个赔款之内。

1901年春，原三盛公教堂第一任本堂神甫闵玉清朝圣了西南蒙古教区主教后从北京来到三盛公。他在任三盛公教堂本堂神甫时即与阿旗总管安九大人矛盾很深。闵玉清这次到三盛公的目地就是要借庚子教案敲榨勒索阿拉善旗，以捞得巨额赔款，同时报复安九大人。

闵玉清听信教民贾达等人的谎言，捏造事实，说庚子年天主教神甫走后，安九大人带领蒙古人拆毁了教堂，偷走三盛公教堂的东西，欺压教民等等。闵玉清据此向阿拉善旗提出赔款白银三十四万两的无理要求。闵玉清雇佣奎白子、奎俊英二人同他到定远营，对阿拉善旗王爷道鲁德色楞和其他政府官员说：“你们蒙古人破坏了我们的教堂，杀害了我们的教民，我们受了很大损失，你们蒙古人要给我们赔一大笔款。”道鲁德色楞王爷听后冷笑一声义正辞严地说：“你所说的都是捏造的事实，骗人的鬼话！你们在遭难逃跑时，我们蒙古人给你们帮助解决了口粮和骑乘，安九大人还派人护送你们，这难道也是欺压你们

吗？”闵玉清原想讹诈阿旗，一举成功，没想到阿旗王爷不买他的帐，阴谋难以得逞，他也感到理屈词穷，只好灰溜溜地回到了三盛公。

闵玉清虽然在阿旗王爷面前碰了钉子，但他并没有死心。又上告到宁夏部院，还派名叫何三成的教民去归化打官司，他自己则去北京方面找八国联军领事馆，另一方面向中国总理各国衙门告阿拉善旗的状，要阿拉善旗赔款。闵玉清在给清朝政府总理各国衙门诉状中捏造事实，把安九大人派兵护送十五名神父回国反诬为派兵企图枪毙这些神父，还说外国神父走后，安九大人带领蒙古人把三盛公教堂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拿走，三盛公教堂作了喇嘛庙，其他教堂也被烧毁。又捏造了安九大人聚众造反的假话，说安九大人和汉族教民王祥林联合，招收乌拉特、达拉特两旗人马在乌兰布鲁克地方进行骚乱。清朝政府在外国侵略者的逼迫下，竟然不问青红皂白，根据闵玉清的诉状，下令宁夏部院了结此案，让阿拉善旗赔款。宁夏部院接到清政府命令公文后转发阿拉善旗，并决定把赔款案在宁夏判决。还在公文中写道：“立即查清阿木尔吉日嘎拉的叛乱案，根据情节严肃处理。”为了澄清事实，揭露闵玉清捏造的谎言，阿拉善旗政府专门派官员对闵玉清诉状中提及的事作了调查，上报清政府蒙古部院和陕甘宁军部总

督及宁夏部院。现照录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五月二十日上报陕甘宁军部总督的一份公文：

为据情咨报事，本年四月二十四日准 贵督部堂咨开教士闵玉清，鄙旗安九即阿木尔吉日嘎拉结联王相林子，纠集乌拉达拉兵在乌拉包大肆猖獗，滋扰为害。等因准此，刻即派员前往侦探虚实，一面先行咨复在案。嗣据派往侦探之蒙员副管旗章京云骑尉台吉那木尔稟称，行抵达拉特旗属之乌兰包地方，眼见安堵如常，并无纠集兵马驻扎该处之事。复查阿木尔吉日嘎拉因教民将好为仇，多方诬赖，不得已前往归化城一带，寻觅三盛公神甫戴天禄等前来质证解纷，藉办一切事宜去讫。王相林子本系奉教之民，因反教逃避尚无下落。计以时日，两人踪迹不明，断无结联之理。惟由三道河子旋回时，三盛公教民突于四月二十四日夜間，造言由洛翁昭渡口过来之兵甚多，亟宜入寨据守防备，于是纷纷搬入教堂寨内，将派往保护之兵概行逐出。随即修筑炮台垛口，各方具竖白旗。又聚铁匠数十名。意在多修炮台，广储军械，居心更形叵测等情稟报前来。查此次无限风波，具系凭空捏造。即如闵教士所稟，结联纠集之兵，教民倡言洛翁昭渡河之众，迄逾多日影响毫无，其为煽惑聳听已可概见。盖其意外猜疑，故作惊慌，造言生事之心，实有难以情感理喻者，

诬噬刁难非为索赔无厌起见，至散给该教民籽种牛力，委因亢旱拮据，罗掘已尽，备文向宁夏道商，借仓粮未蒙允诺，只得再为设法，另筹散给，以维时局。再鄯旗磴口、道洛苏海、哈拉和尼图、沙金套海，即黄河西岸等处，自嘉庆及道光三年开成熟地计一千一百九十顷零六十七亩，同治年间回匪扰乱，佃户逃徙，地遂荒芜，仅余四百余顷。光绪二年，法国德玉明奉总署执照，前来由佃户手转租地，开至六十余顷，每年照章交纳租银，立有地租簿为据。从此招来各省汉民男妇至数千之众，筑寨修房，自由自便。德玉明物故，洋人韩贾路等继来主教，具耕凿相安历有年。所此鄯旗地亩均系租种，并无典卖之实在情形也。所有蒙员，探明乌兰包无兵纠集，实系闵教士捏词妄控，既洋人在鄯旗租地各缘由，理合一并咨复。为此合咨贵督部堂，请烦查核来文，事理施行，须至咨覆者。

光绪二十七年五月二十日。

阿拉善旗政府虽多次将实情稟报清政府蒙古部院及陕甘宁总督，请求合理解决，不要听信闵玉清的谎言，让阿旗赔款。但清政府不但不解决，反而说此案关系到外交大事，问题严重，斥责阿拉善旗对赔款案处理太慢，要尽快处理。阿旗政府无奈，只好同意赔款。但闵玉清要求赔款

白银三十四万两，数额太大，阿拉善旗无法解决，因此一时不能结案。

为了结赔款案，1902年三盛公教堂和阿拉善旗政府双方派代表到宁夏部院商谈。阿拉善旗派总管阿木尔吉日嘎拉参加，闵玉清听阿旗派出安九大人，他作贼心虚，没敢亲自出面，派教民张二贵子、孙章俊、贾达参加。而张二贵子和贾达到银川后没敢出庭，装病躲了起来。只有孙章俊一人出庭和安九大人对证。安九大人讲了当时外国神父逃走时和走后的真情。孙章俊在事实面前也只好讲实话，他说：“光绪二十六年七月，拳匪祸乱，外国神父生命难保，决定逃往乌兰巴托。困难时请求阿木尔吉日嘎拉帮助。阿木尔吉日嘎拉给外国神父帮助了骑乘、帐篷，吃的和用费等，还派蒙古兵护送。当时神父们要求阿木尔吉日嘎拉在他们走后保护教民，保护三盛公大教堂，拆毁周围小教堂。阿木尔吉日嘎拉对神父说：你们把能带走的东西尽量带走，实在带不走的東西用俄、汉、蒙三种文字登记造册，我们各持一本，以便存查。神父们说没有记帐的时间了。于是把东西锁在箱子里，钥匙交给他们可靠的教民保存。因此箱子里放了些什么东西，值多少钱均不清楚。神父们走后，阿木尔吉日嘎拉派兵看守了三盛公教堂，给缺口粮的教民按月发了口粮，

缺衣服的发了衣服，这些事实众人都知道。”经过这次对证，搞清了三盛公案件的真实情况，使案件稍缓和了一些。阿旗政府为顾全大局，事后违心地撤销了安九大人的总管职务。闵玉清实现了报复安九夫人的目的，很是得意。但他坚持赔款不得少于二十四万两。后又减为不少于十八万两。然而这样大的数额阿拉善旗根本无力赔款，赔款案还是解决不了。

1903年，教会和阿旗双方再次到宁夏部院就赔款问题谈判。闵玉清派法国神父贾明元参加，阿拉善旗派管旗章京苏德那木旺希格、陈忙海来，大惠三人参加。神父贾明元坚持要按闵玉清的意见赔款十八万两，阿旗蒙古官员们勉强同意赔款四万两，双方争执不下。经宁夏部院官员们调停劝说，采取折中办法，赔款八万两，并就这样判决了。赔款方式是交现银五万两，三万两以土地抵押。阿拉善旗暂时接受了这个赔款数字。但交五万两现银阿拉善旗还是拿不出。为此阿拉善旗政府曾几次请求清政府预支阿旗王公们的俸禄银八万两，以结赔款案。兹抄录光绪二十九年二月十六日阿拉善旗政府呈清政府的一份公文：

御前行走阿拉善和硕特额勒特扎萨克和硕亲王多罗额駙加四级多 为咨请事案准

宁夏将军，咨开三道河教堂议赔一案，现有

教士贾明远来宁议办，令即遴派蒙员前来，等因当即飭派本旗管旗章京索特纳吗旺扫克、莽哈赉、魏德惠等克日赴宁，听候议办。嗣接宁夏镇道印委各大员公函，内开教士索数仍在十七八万，蒙员免应四万。复经公同筹议，迫加一万，仍未应允。嗣蒙将军会同镇道，酌中核断，以八万作抵。本旗筹顾时局，无可如何，免为应允，仍声明如索现银，遑论八万巨款无从画筹，即数千亦难猝办。必须多展年限，设法拼挡，声复去后，旋接印委各大员公函，并蒙员莽哈赉回称，八万了结之说必须现银五万，以地抵押三万，始议立交现银一万，其余四万分作二年，继又有分展五年立刻照办，即可就绪。等因窃思悬案逾年，应求速了，固不敢失此时令，然以地抵押，滞碍种端，叠经声叙在案，惟是无米之炊，万分焦灼，不得已无可如何之中，思挹注通融之法。查蒙古王公岁支例俸，亲王每岁为数二千，拟请以此作为还项，恳祈据情奏由官款赏借银八万两，迳付教士，立断葛藤。即以所支王俸，全数按年归还，实际有著之款，接续扣归，究帚数之日，一面函请印委各大员，婉告贾教士，暂候时日，听候恩命，赔款如数付交，幸勿催促，除咨请宁夏将军鉴核奏办外，为此合咨贵都部堂，请烦查照，俯赐奏请施行，切叨公便，须至咨者

右咨

钦命头品顶戴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总
督陕甘等处军务粮饷兼管巡抚事嵩

光绪二十九年二月十六日

阿拉善旗政府虽多次呈文请求清政府预支俸
禄银以了结赔款案，但清朝政府不同意这样做，
反而斥责阿拉善旗不应以此拖延赔款时间。可阿
旗政府确实赔不起这笔款，因而一直拖到光绪三
十一年（1905年）还未了结赔款案。

1905年阿拉善旗第九世王爷拉王布仁吉拉
继位后，他去北京请求清朝外交官金清旺和法国
大使吕某从中调停，最后决定阿拉善旗赔款五万
两，了结了延续五年的赔款冤案。阿旗和三盛公
教堂签定了赔款合同，阿旗以三盛公教堂、渡口
堂、补隆淖堂三个教堂种过的土地共十一处（除
荒地外，熟地94顷40亩）抵三万两银子。合
同规定，银子没有利息，地不交租金，什么时候
交款什么时候还地。剩下的二万两，阿旗勉强交
了一万两现银，另一万两分期四年还清。现将当
时双方签定的合同照录如下：

为立合同事，缘光绪二十六年，拳匪肇乱，
本旗道洛苏海，三盛公地方向有教堂，经准宁夏
部院移开恭录

上谕令将教士驱遣回国，教民解散，恐被拳

匪扰害在案，因而虽有护送教士，次有教堂损坏、遗失物件，控经五年，尚未拟结，今奉法国吕使

庆亲王那尚书议断，将该三盛公教案之赔款以银

五万两了结，永断葛藤，等因本旗即将准爱堂名下三盛公与附近拾处教堂旧有租种地及毛闹海之地共拾壹处，抵押与教堂，作典价银三万两，不计年限，现交宁平银壹万两，下余银壹万两，自明年起每年拾月内交银二千五百两，仍以宁平交付，作为四年归清。此项所押地亩，乃地无租，银无利，俟后银齐到赎回，照章出租交旗。自貳拾陆年以后，本旗与教民交涉嫌疑各件，亦入以次赔款内一并和息，一了百了。嗣后本旗与教堂共相和好，永杜争端，恐口无凭，特立合同两张，各执为凭，所立合同是实。

立写合同人：总理三盛公一带教堂主教闵玉清，

阿拉善旗记名协理四等台吉 那木吉勒

梅林章京 格立各

副参领总管 莽哈赛

佐领 把依尔图

合同为凭

光绪三十一年七月二十四日订立

合同签订后，三盛公一带的土地全部被天主堂侵占。天主堂除了耕种90多顷熟地外，又大肆开垦荒地，所占土地远远超过了合同规定的数字。闵玉清等外国神父依靠他们的势力，向当地政府敲诈勒索大批银两和土地，然后又将土地租给教徒和农民，从中进行双重剥削。

自光绪三十一年阿拉善旗同天主教堂签订赔款合同后，三盛公一带土地被天主堂侵占三十多年，直至一九四六年才收回。这中间阿旗与天主堂曾签订过三次合同，一次是民国二十年（1931年），一次是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一次是民国三十年（1941年），加上光绪三十一年那次先后四次签订合同。在后三次签订合同前，阿旗政府都派人丈量了土地，超出以前合同规定数的土地都要收租。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阿拉善旗政府派陈爱尔德尼巴图和陈那笋巴图两人，去三盛公向教会索要抵押给教堂的土地。当时，石杨修任西南蒙古教区主教。陈爱尔德尼巴图和陈那笋巴图与石主教谈判，提出要收回原抵押的土地，石杨修说要按光绪三十一年订的合同办，如果阿旗拿出三万两银子，土地马上归还。陈爱尔德尼巴图说，银到之日归还土地是合同里定的，这没有问题，我们已将三万两银子带来了，但是合同

中规定的只是毛脑海（渡口堂）等十一处熟地，并没有规定开垦荒地。可是在这几十年中你们大量开垦荒地，对这些新开垦的地要丈量清楚，并按照阿拉善旗规定的现行地租按年计算收租。这样一提石杨修主教着了急，因为如按年计算收新开垦的土地地租，对他们不利。石杨修再不敢耍花招了，只好老老实实地谈判。双方都不再追究三万两银子和合同外开垦土地的地租问题。决定光绪三十一年所定合同作废，重新签订合同，地权归阿拉善旗，天主教租种五年，每年交地租二千银元，二十石（六千斤）粮食。当时，石杨修主教在所立凭证字据中写道：

立凭证字据事，查本堂在光绪初年，陆续租到阿拉善特别旗地亩若干处，二十余年主客情谊极笃，从无间言。嗣因庚子变乱，本堂损失颇多，事后会议由阿旗赔银五万两了结。当时除交纹银壹万贰千五百两外，以七千五百两加利缓交，后亦交清。下余三万两因无款交付，以旗地拾壹处作押，当时立有契约，言明银无利，地无租，款到将地赎回。今已多年，现在阿拉善旗特别旗扎萨克和硕达亲王因为清理悬案，特派陈爱尔德尼巴图、魏道布吉等前来本堂接洽赎回原押所有地亩，取消从前一切契约。本主教因与王爷情谊素笃，更为增加日后亲善起见，情愿将以上欠押赔

款银两全数割让，将所押地亩及押到以后建筑修渠等工作即日一概无条件交还，并所有自光绪初年起至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七月二十日止其中一切合同契约全行作为废纸，永远无效。以后租地以新立合同为标准，此系自甘情愿，永无返悔，恐口无凭，立此为证。

立凭证字据人主教石杨修

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七月十九日在三盛公天主教堂缮立

自此阿拉善旗收回了抵押出去几十年的土地，才有了土地自主权。但是天主堂对农民的剥削并没有改变。比如三盛公教堂向农民收缴地租逐年增加，据调查统计，1921年共收租粮食256石，1929年收租粮食286石，1939年收355石粮食，1944年收租粮食542石。（每石折合300市斤）渡口堂、补隆淖两教堂收地租更多。

民国三十年（1941年）五年合同期满，阿旗政府派陈那笋巴图到三盛公与天主堂重新签订了合同。这次合同规定天主堂继续租种土地五年，每年交租银五千银元，三十石粮食。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合同期满，阿旗政府派陈那笋巴图和白图布巴依尔和天主堂交涉。他们对天主堂神父说，这回我们要丈量土

地，如果你们继续租地，我们就按丈量实际亩数收地租。你们若不再续租土地，我们就直接租给农民耕种。外国神父们不同意这样做，还是想向过去那样少交租多种地。但是陈、白两位官员坚决拒绝了他们的要求，除给他们在三盛公、渡口堂、补隆淖每堂留地十顷，共三十顷地让暂时耕种，天主堂和农民一样交租，其余土地全部收回，由阿旗政府直接租给农民耕种。租地的方法是原来谁种还由谁种，详细丈量了亩数，各自签订了合同。从这时起，阿拉善旗才真正收回了土地的所有权。直至一九五二年冬土改时，才将租种给天主堂的三十顷地全部收回，分给农民耕种。庚子赔款冤案至此才宣告结束。

巴盟历史上的教会教育

郭轶平

巴盟地处边关要塞，自古以来战事频繁，人口或聚或散，历代教育多属空白。尽管汉朝统治者曾昭示郡国设学，但资料匮乏，当时巴盟境内的五原、朔方二郡设学情形难确其详。想来二郡远离封建统治中心，鞭长难及，即使设校布教，教育势必不会比中原地带发达。

直至清末，乡村中仅有一二私塾，由各商号地主之司帐兼教习，课读子弟。其形制简陋，难称学校。教习塾生的目的，只为接续帐业而已，故仅诵读经书，待到塾生粗通文墨，目的即达，无所谓教育可言。

1840年爆发鸦片战争，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清王朝丧权失地，赔款折兵，一批批洋教士在列强炮舰的羽翼下深入到了中国腹地。

一八七五年，比利时“圣母圣心会”传教士德玉明、桂德贞来到我盟三道河（即磴口旧城，后称三盛公），在东堂村附近的沙梁上搭穹帐筒

居，劝化蒙民入教，购置田产，兴工设堂，建立传教据点。随后扩充教堂，迁徙外地教友，人丁集中，兴办教会学校条件渐臻成熟。设校布道被提到教会教务的议事日程上来。

（一）教会办学的社会文化背景

十九世纪的七十年代，塞外河套，人烟稀落。清朝封建统治者只重科举，不重教育。贫家子弟无处就学。年节喜庆，一般农户用碗托蘸墨，扣于红纸之上，聊充对联，庆贺节日。各地虽有一、二私塾，只限于富家子弟课读经书。教习课程不外《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四书》、《五经》。教法陈旧，很少讲解。教习目的，仅为豪门富户培养管家。因此，私塾学生，根本学不到系统的科学知识。

那些迫于水旱灾害逃荒定居于河套的农民，初到此地，创业艰辛，耕种繁苦，他们只盼儿女尽早投入农事。儿女尚小，可作家务帮手，打柴汲水，洗衣烧饭，不敢做使儿女入学求知的美梦。一般农户，衣食自顾不暇，也就没有让子女登科入第、出将入相的幻想。因此，除宽裕人家的子弟有幸在私塾读书识字外，当时河套儿童接受教育者，寥寥无几。

这种文化教育的落后状况，对传教自然弊多

利少。教会需要受过一定教育的人，这对于理解教义，接受教理不无益处。教会更需要一批文化素质高的中国教士传布教义。所以培养这种人才的教会学校便应运而生了。很清楚，教会起初办学的动机，并不在于普渡童生到达知识的彼岸，只不过旨在使儿童识字，以便讲述经义，扩大传教范围，提高信众素质。

据《西湾圣教源流》一书记载，办学的动机颇触动了南公（怀仁）的心怀。按他的主意，不明白道理的教友，大约是冷淡和不好的教友。他出布告说：“我叮嘱信众一件事情：每人要紧明白当知道的道理，你们领过圣洗圣事。这还不够，每人就该当学会那耶稣的道理。父母在天主台前有大本分，给儿女讲要理，也牺牲些钱财，为叫儿童学得知识。每堂口要设立学房。这是一件很喜悦我心的事情。”在布告中，南怀仁许诺，求入修道院的教士，若操行相同，谁识字先录取谁。

（二）教会要理学校

1875年，三盛公天主堂落成。1880年，传教士刚立住脚，即开始解决设校问题。由于各种原因，正规学校难以设立，于是创建短期书房，称之为“要理学校”。顾名思义，学习内

容多为教会教义。理解教义需先识字，教会编印了识字读本，以问答形式讲解教义，认读生字。计有四种：《领洗问答》，《告戒问答》，《坚定问答》，《婚配问答》。由于所上课本多为问答形式，故这类学堂多被称为“问答书房”。

据现陕坝天主教堂段云回忆说：“教会办学的起点首先是使信教群众的学龄儿童学习，背诵教会经言要理兼读书识字，循序渐进。例如我初上学时，学校教室的墙上挂上许多常见多用字，让学生识别朗读，直至学生们将全部挂在墙上的生字认清记熟，再换新生字。这种识字法效果较好。”可见教会要理学校的教学宗旨和方法之一斑。

教会要求教民中七岁以上的儿童入要理学校受教。教民多为贫寒农户，故贫富儿童都可以上学识字，不交学费、书费，外村学生的食宿费也由教会负担。

由于教会的提倡，加之识字的功效，且不收学费，并解决食宿费，教民也愿意送子女入要理学校就读。最初学额当然不多，课时少，学期短，入学的多为男性儿童。后来，不过一两年，女性儿童入学就读的也渐渐多起来，于是分设男女要理学校。

据段云回忆说：“三盛公原在1880年便

开设了男女要理学校。学校开始除学习教会经言要理外，兼学文化课，识字课。如读《百家姓》、《三字经》、《名贤集》等。继而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迨民国成立后，开始采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国文、史地、算术等课本兼学体操。”由于采用了中国传统的小学课本，所以也聘请了清代地方上的老学究老秀才一类的塾师教读学生。如刚成立学校时，要理学校聘请了山西籍的孙宋二位先生教读《三字经》、《百家姓》之类的课程。另外还有河北籍的冯国璋先生也被聘为要理学校教员。

要理学校最初学生不多，计有三、四十名。生员来自三盛公本村及附近金沙庙、旧地等乡村中。老师的薪金由教会发给。学生上课最初坐土炕，不久换坐桌凳。老师教学用粉笔，学生用石笔石板练习课业。当时钢笔、铅笔尚不普及，但学校注重毛笔练习，学生每日写仿，老师逐日批改。随着教徒人数的不断增加，学生也相应地增多了，教室不敷为用。1893年，三盛公大堂建成后，另行修建校舍八间。可见至此班级容量的增添是迅速的。

女校的学习内容基本与男校相同。所不同的是，较大的女生兼学裁缝、刺绣或打麻线。新入教的成年妇女也有参加学习的。

读完要理学校，有些女子不愿出嫁，甘愿矢志守贞的，教会就进一步培训她们，保送这些妇女到萨拉齐小巴拉盖天主堂女校，在那里对她们进行专门训练。

三盛公天主堂最初派出的女学生有郭罗撒、武金花、武路济亚、李文清、朱淑斌、武芳济、陶佩贞、张临峰等人。在这批早期外出的女修士当中，尚健在的有武芳济、朱淑斌。以上这些人都独守终身。在宁夏教区从事教学工作。

宁夏教区主教、比利时人王守礼著有《边疆公教社会事业》一书。该书中的一份统计资料记载了早年教会在我盟及附近地区教会办学的实绩。1880年三盛公教堂始办要理学校，迄1906年为止，在这二十余年的时间内，西南蒙古教区（我盟三盛公为该教区的主教府，包括包头东到宁夏边外、以及陕西三边口外和伊盟鄂托克旗南部一带地域）要理学校有了较迅速的发展，下面是1888年和1906年的两次统计数据。

1888年

男校二十二所，男生二百零四名。

女校六所，女生九十五名。

1906年

男校三十五所，男生一千零八十八人。

女校三十八所，女生一千二百人。

从两表的对比中可以看出，教会办学实绩累累，学校成倍增多。其中男校增加了近三倍，女校增加了六倍多。而生源增加更见迅猛，其中男生增加了五倍多，女生增加了十倍多。在清王朝的统治下，地处边疆的我盟境内，众多女性儿童有了上学读书的机会，从受教育的角度看，不能不承认教会为妇女教育办了一件大好事。

教会要理学校最初为短期性质的书房。农闲时开学，农忙时停学。课堂上老师讲，学生记诵，教法陈旧。体罚很盛行，罚跪、打骂充斥课堂。有的教员甚至用烟袋敲学生脑袋，性质与私塾无异。

（三）教会学院

由于要理学校发展迅速，学期延长，学级增添，科目逐渐增多，师资短缺就成了突出的问题，日益紧迫地摆在教会教育面前。为了解决这一与日俱增的矛盾，教会开办了公学院。

三盛公修道院于一九〇五年东迁土默特二十四顷地天主堂。为了培养师资，三盛公教堂扩建了原修道院校舍，成立了三盛公公学校，命名为“三盛公公学院”。公学院第一任校长为吕文化，继任为石杨修、马文辉等。教员除了前面提

到的孙宋二老先生外，增聘退学修士冯辅斌、王喜太、刘静仁等在公学院任教。

公学院学员由河套境内各堂口要理小学毕业的学生中选送。最初送公学院学习的有渡口堂、补隆淖尔堂和蛮会堂。由于学生大多来自外地，所以公学院的学生全部住校。学校提供食宿，衣服、行李由学生自备。不收学员学费，课本由学校免费发给学生。学生伙食为一星期两顿白面，其余为小米饭。副食多与当地住户相同，大多为土豆、酸菜等。

公学也分男女校，每班学员四十多名，住校生宿舍为单格隔开，每人住一格。宿舍中严禁谈笑，按时起居，否则施以严厉的体罚训导。

公学的课程有了较多的增加，增添的科目有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等，与现在的中学课程不相上下。公学也设国文课，学习唐宋八大家散文、四书五经、诗词歌赋等诗文。

公学尤为强调的是修身教育。为的是使儿童“成为一个好的国民，使他们明白孝悌之道，服从长上的命令，爱护同辈的人，使他们知道勤劳与节约的价值，以及婚姻神圣和人生的要务”^①这种修身课一方面意在培植驯顺的国民，使之不

注：①摘自王守礼《边疆社会公教事业》。

②见范长江著《中国的西北角》。

至杵上逆乱。另一方面，作为宗教，修身课自然有劝人为善的一面。但是由于学校灌输的思想大多是什么“西方文明”、“中国贫穷落后”的一套，不少儿童在这种教育下，崇洋思想和自悲感很浓重，只知有教，不知有国。校内从来不组织爱国活动，只悬挂比利时国旗，不准升起中国国旗。一个记者在参观了三盛公教堂后写到：“记者在三盛公时，看过他们的国语课本，是他们教会自己编的。里面虽是汉字，但有两种思想叫人看不懂：第一，它说中国之所以穷，由于实业不发达。实业不发达，由于大家懒，即是不知振作，……第二，人是造化主造的，不是人进化来的，人是有定的，总逃不了造化主的定型。象我们这样被压迫的民族，也是造化主先定好了的。我们大可以安心使人压迫，被人欺压，不要起来做什么反乎天意的解放运动。”②由此可见，教会学校修身课的性质。

但是，不可否认，传教士来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文化与当时的中国封建文化是有先进落后的区别的。与当时的中国封建教育相比，有它值得肯定的一面。在外国传教士的劝化下，许多善良的中国人信了教，他们的子女有了接受教育学习科学文化课的机会。河套地区的教育较之以前有了前所未有的进步。

公学院特别重视毛笔字的训练。钢笔和铅笔也开始使用起来。学校校园宽阔，辟有体育运动场地。校舍整洁，窗明几净，标本挂图，实验仪器，应有尽有。成为一所正规的教育园地。

学校管理主要由教士负责。外国教士也担任教职，讲授修身课和自然科学科目。

公学院毕业的学生有的到土默特二十四顷地当修生，有的到本教区各堂小学担任教员。自民国十三年各堂成立新制小学起，教员大部分由公学院的学生担任。

据《边疆公教社会事业》统计，一九〇六年，西南蒙古教区（主教府在我盟三盛公）已有公学三所，在校生七十七名。可见教会和培养师资的重视之早之快。

（四）三盛公公学院迁往陕坝

陕坝是自宣统二、三年圣母圣心会设了教堂后繁华起来的教会村堡。这里教友集中，便于办学。一九二三年三盛公成立主教总堂时，也成立了修道院。于是将公学院迁移到陕坝，新建校园校舍。当时，陕坝公学院建设规模较为气派，被命名为横舟学校。首任校长为荷兰人冯文汇。继任为比利时人吴守信，中国籍神甫傅亭维、比利时

人于广义，以及刘宁民、谢久敬、宋显、徐声波等人。教员先后有苏玉峰、韩荣昌、李精明、李元朴、张国良、王世臣等人。

各堂学生小学毕业后多到此校继续学习。学生全年学籍费食宿费共收十元。学生全部住校。

一九二四年，教会学校校董会商定，凡属临河境内天主堂所办的学校，一律定名为普爱学校，从此陕坝横舟公学院改名普爱学校。并于一九二五年正式报请备案。不分教内教外的学生兼收。普爱学校的学生在抗战期间到街头做宣传，唱抗战歌曲，贴抗战标语，为救亡图存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在临河县举行的各项运动会上，该校成绩比较可观。

（五）教会女子高年级学校

教会对于教民家庭的女性儿童受教育问题一向比较重视，抱同等施教的态度。因此在立男公学的同时于三盛公主教府成立了女子高年级学校，河套地区各堂口教友女子多到此校学习，学生人数逐年增多。嗣后扩建了新校舍，费达德主教由比利时邀请来外籍修女八名协助办理学校。这所女子学校的院落房舍在当时河套来说，比较讲究。校园内构筑假山，种植花草树木，环境十分优雅。

学校学制，遵行国家规定，课程设置亦遵循部颁标准。聘任傅亭维、陈宽明、冯辅斌、石浩德等比较胜任教学的教师担任教职。学员的食宿费用概由学校负担。

一九三二年，石杨修主教成立国际修女会“圣母会”，专门培训中国修女，为将来在各堂口开展医疗工作和培植女校师资作准备。三盛公女校毕业的学生加入“圣母会”当修女的不下六十名。

“圣母会”专门招收和培植教友家庭年满二十岁有志为教会献身的女青年，自愿报名。经教区批准后，三五人一批，进入专为她们设立的修女会初学院，接受三愿教育（即绝财、绝意、绝色）和会规教育。初学期限为二年，二年期满后，凡本人在完全自觉的基础上严格遵守“三愿”，遵守本会一切规章纪律的女青年，经教会认为具备要求的，即准予招收。被批准入会的修女，必须在本教区主教前宣誓将信守誓愿。誓愿年限最初为一年，一年后仍自愿留会又无特殊原因，主教可以允许发二年期限的愿。二年期满后，如无变故可发五年愿。以上有年限誓愿，为暂愿。每次有期限暂愿期满后，宣誓者去留与否，有绝对自由，任何人不得干预。发过誓愿满四十岁者可发终身愿。修女一经发愿，必须穿特

定的会衣会服，恪守本会的一切制度，过集体生活。

三盛公女子高小班成立不久，接着陕坝、蛮会、渡口、三道桥、新堂等地相继开办了女子高年级学校。这些学校的开设，给许多女青年就学或毕业后到外地深造求学，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和机会。

(六) 普爱中学——教会的完全中学

一九四六年，比利时人王守礼升任宁夏教区主教后，当即筹备在河套陕坝和宁夏银川两处开办两所男女中学，两所中学均于一九四七年按原计划开学。

设在陕坝的名为普爱中学。本校是在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即一九四六年九月成立的。这是一所教会办的完全中学，一九四六年九月即招收第一届一班五十名学生。由于当年未及建造校舍，故暂借陕坝私立普爱小学房舍授业。曾留学意大利罗马传信大学的孙仲贤受命出任校长。

担任该校教员的有神甫傅亭维、武慕庵、陈宽民，另有非神甫纪有兴、宋海潮、张国良等人。

学校开设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生物、生理、矿物等课程。这些课程的设置都遵

照当时的教育部颁标准。另外还有童子军课，由傅作义部将担任教习。当然，教理课是必不可少的，由神甫陈宽民讲授。

最初两年内普爱中学只招男生。后来则同时招收女生，男女分校。

一九四八年，普爱中学校舍建成。它座落在陕坝天主堂普小的北侧。办公室、教室、食堂、宿舍建在校园西侧，教室东侧是宽敞的校园。是年秋季，迁入新校舍授课。嗣后学校又扩建了图书馆、化验室等。

普爱中学先后共招收九个班，四百多人。第一年招收一个班；一九四七年招收一个班；一九四八年和一九四九年各招收两个班；一九五〇年招收三个班。其中，有三分之一学生是信众，女学生占有所有学生的四分之一。

为了提高办学质量，解决好师资来源，当时教会采取了两种办法：一为就地取材挖潜，培训提高部分教师。同时着眼于未来，采取请进来和派出去的两种办法。为解决师资短缺和质量不高的矛盾，从教会兴办教育之始，就不断从外地延聘教学经验丰富，教学有方的教师来教会学校任教，使教学质量日趋提高。普爱中学曾先后从北京辅仁大学、兰州大学、天津南开大学招聘了徐有明、赵凤鸣、杨成名、李继祖来校任教。

普爱中学设有校董会，校董会是学校的最高权力机关。董事长由王守礼主教出任，董事由校长和社会士绅充任。重大问题皆决于校董会。普中校长一人，该职一直由孙仲贤担任。学校设教务处、训育处、总务处。武慕庵、庞世先先后担任过教务主任。

普爱中学办学的成绩是显著的，在当时河套地区屈指可数的几所中学中，该校独树一帜，办得很有特色，为社会国家培养了不少人才，在河套地区颇有声望。

一九五一年三月，政府接管了普爱中学，并与奋斗中学等学校合并定名为陕坝中学，亦即现杭后一中的前身。

（七）教会新制学校

民国成立后，政府中的有识之士，日益感到教会教育对中国的教育是一种冲击和威胁，于是改造和取缔教会学校的呼声日高。结果是要求改良教会教育，使之按照政府的旨意办学。

因此，教会不得不按照政府的要求，在各教堂创办了初级小学，在各大教区创立中学或师范学校。课程完全遵守教育部颁标准，另加教理课。

据《边疆公教社会事业》记载，1925年

这种按照政府办的新制小学宁夏教区有男校十一所，男生二百一十八名，女校尚无。一九三五年，即十年后，男校发展到二十所，男生一千零二十六名，女校十七所，女生七百四十八名。要理学校仍保持原有规模。可见新制国民学校的发展，实际即教会学校的总体发展是迅速的。

当时教会公学的初高两级男女校也有较大的发展。一九三五年，宁夏教区有公学初高两级男校四所，学生一百六十六名。女校二所，学生四十五名。这些学校培养出的学生，作为教会学校的师资，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本教区，主要是河套地区的各个教堂的要理学校和国民学校任教，充实那里的师资，为教会教育克尽职力。

据一九四三年四月出版的《边疆通讯·绥宁边区教堂问题》称：绥宁边区有“天主堂二十余处，小学校二十一所。内完全小学一所，男女修道院各一所（设于三盛公），学生共一千零二十一人，内计男生五百九十四人，女生四百二十七人。……绥宁边境各教堂，皆立有初级小学校，男女分校，并皆系复式。经呈报所在地之县政府立案，其在宁夏磴口境内称私立明正小学校，在绥远临河境内者，则名私立普爱小学校。并在三盛公设有修道院一所，招收男女修士，造就宗教人才。三盛公有女子完全学校一所，陕坝有男女

完全小学各一所。各教堂办理教育之经费，皆由传教经费内抽用，近二年来，因受欧战影响，传教费不能汇到，故各学校经费，渐由教民自由捐助小部，以资维持。”

该文并列有部分教会小学统计资料一份，兹录如下：

教会小学校学生数一览表

学校所在地	校名	男生数	女生数	合计
三盛公	明正一小	40	80	120
天兴泉	明正四小	20	18	38
渡口堂	明正二小	99	59	158
补隆淖尔	明正三小	32	30	62
黄羊木头	普爱	30	20	50
乌兰淖尔	普爱	68	24	92
陕坝	普爱	140	120	260
三道桥	普爱	30	25	55

另据《绥远省河套调查记》载“私立普爱小学校，设于陕坝镇（即太安镇），系天主教私立之教会学校，创建于清宣统年间，初创时煞费苦心，入学者予以种种优待，久之，人乃趋之若鹜。该校设备极佳，有西洋化之概。课本多采经典诗词，学生无由索解，然亦不加解放，训管又颇严厉，学生思想身体俱为之禁锢，致无丝毫活

泼气象。教师多为教会司铎，外匡人中国人皆有，于教育素无研究，且乏办学经验，是以设教垂二十余年，而其学生，殊罕成绩。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经司铎康国泰锐意整顿，力加改善，添聘教员，遵章以私立小学呈准立案。现有学生一百六十七名，分高级一班十六名，初级五班一百五十一名。因该校供给书具，学生称便，并家长笃信耶稣，咸愿送子弟入该校攻读，此其所以较各县立学校为多也。校长一，教员四，内有比利时人，经费甚充裕，开支无定数，校长教员，均由教会供给膳宿，薪俸每月均不过二十元。公杂费开支若干，向教会支领若干。该校今后倘能延聘优良校长教师，依照小学规程，本诸现代教育思潮，积极整顿，则成绩可佳，可预卜也。

私立普爱第二小学校，设于第二区属下之蛮会天主教堂内。距城六十里。由天主堂主持一切，性质与陕坝之普爱小学同，盖即其支校也。学生一百二十一名，分初级四班，设备尚好，较陕坝略有逊色。校长一，教员三，程度平庸，精神欠振，亦因待遇太薄所致耳。女校亦另有一所，设备不佳，学生五十八名。炕坐诵经之小女生居多数。余初级二班。教员二人，皆童贞女。教授训育，均欠研究。斯校亦应设法整顿，否则将为

潮流所迫而渐淘汰也。”以上记载说明，教会不遗余力创办学校。经费设备均较当时国立小学为强。学生书学杂费，几于不缴。对于推进当时地方教育，开启民智，尽力匪浅。

总之，教会兴办教育是肯花血本的。从一八七八年建立三盛公教堂起，以后又陆续在我盟境内设立了东堂、天兴泉、圣母堂、粮台、兴盛扬、富太奎、旧地、哈拉兔、王亮滩、渡口、补隆淖尔、黄羊木头、乌兰淖尔、蛮会、三道桥、陕坝、大营子、大发公、隆兴长、大顺城等大大小小几十个教堂。他们每设立一处教堂，同时也就设立男女小学校。学生起初只学经言，后来加学其它科目，数理科占有很大比重，客观上扩大了教育面。

按当时临河地区官方的统计数字有学龄儿童数千人（6020——临河县），教会的二十多处男女小学招收了10——20%的学龄儿童入学，无疑推进了河套的教育事业，使贫寒儿童也有了上学的机会。不能不承认是一种教育方面的贡献。

（八）教会修道院

一八八七年，西南蒙古教区首次在主教府三盛公成立小修道院，做为培植未来国籍神职人员

的重要基地。

修道院所上课业除一般中学课程外，兼学拉丁语，注重所谓道德修养。

修道院成立之初，院长由本堂神甫兼任，嗣后派专人负责。最初担任院长有贺歌南，包海容等（二人皆为比利时人）。

第一批修道生由三盛公小学录取。象段世忠、崔超海、钱奥肯（蒙古人）、张怀义、王二旦、冯辅斌、冯斌义等人，即是第一批修生。后来又招收康景东、郝道宾、王文昌、傅亭维、苏玉峰等生入院修业。

小修院成立之初，尚未建造专用校舍，加以教员尚无专职，故暂与小学合并上课，修道生加开一门拉丁语和一门神修课。后因两校学生增多，原小学校舍不敷分配，乃另行修造院舍，修道生分出小学，在新校舍上课。

第一批修道生高初中六年毕业后，教会发送他们到东蒙古教区朝阳区松树嘴子主教堂专读神哲学和其它神学必修课。首批东送的学员有段世忠、张怀义、王二旦、冯斌义、冯辅斌等。以上几人除段张两人始终坚持不懈修完学业，六年后回到原教区，于一九一一年经教区主教祝圣司铎外，其他几人因经受不起修途中的严峻考验，先后休学还家，未成教果。修生整个学习过程中的

全部费用完全由教会供给。本人不用负担。

一九〇五年，西南蒙古教区主教闵玉清决定将西南蒙古教区主教堂由三盛公东迁土默特二十四顷地。该地人烟稠密，教友集中，便利传教办学。搬迁之前先将该地为义和团焚毁的教会设施（如经堂、住室、男女学校）重新修缮一新，另筑七丈钟楼。修道院校舍暂不及营造，乃将修道院临时设于萨拉齐小巴拉盖天主堂。迨一九一〇年修道院校舍设备齐备后，于是正式将小修道院迁到二十四顷地。凡西南蒙古教区有志于入修院的男青年小修生皆集中在此地培训，称为小修道院。

第一任院长为吕文化，继任徐正鹤，修道课程设置仍与原三盛公修道院相同，另加一门法语课，抗战期间改学英语课。学生由最初的三十名增至六十名。由三盛公修道院转赴该地学习的修生中有六人毕业最早，毕业后被遣送到东蒙古教区的朝阳松树嘴子天主堂修神哲学。他们是康景东、郝道斌、王文昌、傅亭维、苏玉峰、冯斌义等。其中苏、冯二人先后退学还家，其他四人相继被本区主教祝圣为神父。

以后相继由西南蒙古教区到二十四顷地修道院修业者，计第一批为孙雪帆、李世芳；第二批为冯进源、白祥；第三批为郝若望；第四批为周

其智、计善儒、段云等。

当时大同大修道院尚未建成，孙雪帆、李世芳从二十四顷地小修院毕业后，先暂到原察北西湾子读哲学，迨一九二二年大同神哲学院成立后，又转入大同总修院。以后所有各教区的神哲学修士一律转入大同总修院读神哲学。六年毕业后回本教区晋升铎品。

一九二二年，全国天主教的主教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会议重新调整划分了教区。原来的西南蒙古教区。划分为绥远、宁夏两个教区。宁夏教区范围包括河套、宁夏、陕北三边一带。宁夏教区主教堂设在三盛公。首任主教荷兰人费达德，由甘肃圣母圣心会凉州教区调来，于是三盛公第二次成立小修道院。首任院长为比利时人罗明坚，继任德维则、樊恒安、裴高德，最后由中国神父刘静山任院长。解放初修院停办。

一九五二年，我区派在北京辅仁大学读书的万斗轩、韩进恒、马仲牧三位神父共同计议，又经当时教区负责人傅亭维副主教同意，在北京西城宏善寺附近购置十多间住房的小院一处，将三盛公原暂停学修生十数人集中起来学习。由韩进恒负责管理。一九五四年修生们又转呼市哲学院学习。一九五五年我区在哲学院学习的修生部分考入高等院校深造。其中如康之鸣（原籍磴口补

隆淖)考入太原山西大学外语系,毕业后留校,现为外语系教授。申庸(原籍陕坝)考入上海第二医学院,现任上海市卢湾区中心医院内科主任大夫。韩乐(原籍陕坝)考入包头钢铁学院,现在本溪钢铁厂工作。

三盛公修道院从一九二三年成立至一九五二年停办,合计三十年先后为神哲学总修道院输送大修士四十六名,毕业提升为神父者三十四人,中途死亡者二人,因病或其它原因停学者十人。

教会为了使它的神职人员得到更好的深造机会,在石杨修任主教时,曾于一九三四年保送哲学修士孙仲贤(杭后永胜人)到罗马吴尔朋大学学习,毕业归国后又在北平辅仁大学见习二年,一九四七年王守礼当主教时首先在陕坝成立普爱中学,孙仲贤为首任校长。一九四七年王守礼主教又保送哲学修士李知一(磴口圣母堂人)留学罗马,毕业后到新加坡传教,现住新加坡。除此而外,又派遣部分神学毕业的神职人员到当时北平的辅仁大学继续深造。他们是陈宽民(一九三六年——一九四〇)文学系毕业,郭正基(一九四六——一九五〇)文学系毕业,万斗轩(一九四七——一九五一)数学系毕业,马仲牧(一九四八——一九五一)化学系毕业,韩进恒(一九四八——一九五一)生物系毕业。

（九）扒子补隆的教会学校

清朝末年，天主教圣母圣心会占据了我盟西部地区的大片地域，设校布道。但没有能再向东发展。在我盟原安北境内，有基督教“协同会”住守扒子补隆传教。

该“协同会”为美国与瑞典合办，美籍人费安河一八九七年被派遣来华传教，一八九八年费安河来到四野荒塞、草滩百里的扒子补隆，先搭茅庵以避风雨，后营毡帐而顺蒙俗，垦草辟田，植林开路，身备百工，自为自用。在费氏的感化下，不几年，信教徒众渐多，荒野变为居落，扒子补隆初具村镇规模。

一九〇五年，费安河牧师办起教会蒙民学校，聘请二王先生作教员，他自己亲任校长，招收教徒子女十几名，授以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以及圣经警句一类的课程。这所教会兴办的学校成为扒子补隆有史以来的第一处教育机构。

由于费氏安河的感化劝导，当地蒙民感其善意，均自送童稚就学，附近男女，亦多欣往听其讲道。

嗣后，费安河又用庚子赔款修筑汉民小学一所，教读汉民教徒子弟。蒙汉两校学生发展到百十来名，复延聘蒙汉文教师五名担任教职。

一九一四年，费安河决定将蒙汉小学定名为“育英小学”，蒙汉分校上课。汉校男女生分校、分班授课。蒙校初由二王先生管理并教学，后于民国八年（一九一九年）聘任从蒙藏学院毕业的韩文源作教员，教授蒙生。汉男校由陈自铨负责，并担任教学工作。另有四位教师担任教员。教读男汉生。汉女校由毛安乐负责，同样担任教学工作，并聘任王州馨等教员教读学生。

蒙生以学蒙语文、算术为主，汉生以学国文，算术为主。蒙生约二三十人，汉男生八九十人，汉女生二三十人，计一百五六十人。

据《绥远省河套调查记》记载：“县立第二小学校，设于第三区扒子补隆教堂内，距县城九十里，原为该地耶稣教堂内教会小学及蒙古小学校，创设于前清光绪三十二年，牧师费安河者，设学传教，煞费苦心。嗣后教会衰颓，学校不振。民国二十年暑期内，教育局长王时英与教会商妥，改该校为县立第二小学校，教员一，学生三十七名，均系初级，校舍完整，设备粗具，树林荫依，临民复渠，风景优雅，为全县冠。每月经费二十元，拖欠数月，难于领到。”可见该校办学实绩确为全县之冠，遂能为旧教育局改作县立第二小学。

育英小学所需的教师工资、学生课本文具用

品等各项费用，全由教会负担。凡学生中学习成绩优良者，由教会出钱送往外地深造。计送北京者有小尔居白彦、尔居八图，送往西安者有段子高、毛静斋、路宏德；送往张家口有段子光、侯升阁；送往归绥者有曹继贤、王世英、崔继章；送往萨县者有王明德等人。

(十) 教会育婴堂

众所周知，解放前劳动人民生活贫困，挣扎在死亡线上。加之一般贫苦农民不懂节制生育，一家儿女成群，难以维持生计，因此，旧社会广泛存在着弃婴现象。尤其是女婴遗弃现象更为严重。

天主教圣母圣心会初年曾有过育婴院之类的慈善机构，收养河套一带被遗弃的婴儿，但为数不多，后移至土默特二十四顷地抚育。育婴院有专职修女管理幼儿的生活起居、医疗、教育无所不包。

扒子补隆基督教会，在兴办教会小学的同时，也办起了婴儿堂。婴儿堂收养了六名婴儿，尽心抚育直至成人。费安河牧师的妻子詹妮·玛利亚慈善尽职，专事幼儿保育工作。这几名幼儿全为女婴，赐姓“费”，计有费玉香、费素兰、费汝香、费棠香、费汝儿各玛、费梨香等。这些婴儿所需的衣服、被褥、吃食、杂用等费，概由教会

负担。教会培养她们从小信奉“上帝”，以期长大成人成为基督教的忠实信徒。“费师母”对几名儿童倍加爱护，尝称与其爱女威望同等看待，孩子们与其爱女威望一块玩耍，生活得很愉快。

这几名幼儿均被培养成人，受到良好的教育。解放后，费素兰成为乌拉特前旗卫生院助产士，有的还是城镇居民组长。

（十一）教会教育经费

庚子年前，教会学校的办学经费主要从传教经费中支取，当然最初的学校规模小，教堂少，从传教经费中拨出一部分，维持初期的教学费用，不会太成问题。但随着教会学校的逐渐增多，需要修建校舍，购置物资，添置仪器设备，提供师生的食宿直至衣着书籍，日常办公费用，这笔开支是庞大的。但办学经费并没有影响教会办学的积极性，我们见到的是教会教育的发展，学校的增多，学生的不断增加。

一九〇〇年庚子事变后，各国来华传教的耶稣教会，借机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要求赔款。腐败软弱的清政府屈服了，把大量的白银，大片的土地拱手送给外国洋教士。“庚子赔款”使我盟的大片土地割让给来我盟传教的天主教和基督教会，抵充“赔款”。各地教堂则将这些土地租让

给教民耕种，每顷土地每年收租银六两至二十两不等。这样，教会用所谓“赔款”得来的大片肥沃土地作资本，每年收取相当多的租金维持教务活动，确是绰绰有余的。

本文采写承蒙段云、刘静山、樊永业等天主教爱国会宗教人士提供口头、书面资料，谨此致谢。文中史实如有不确，恳请知情者不吝赐教。

乌拉特中公旗历史概况简述

胜 道

乌拉特中旗，原称乌拉特中公旗。乌拉特中公旗系乌拉特三公旗之一，史称三公旗为乌拉特部。乌拉特是蒙古族部落之一，即成吉思汗的胞弟哈布图哈萨尔的后裔。

根据韩葆、那顺巴雅尔、苏德那木道布杰等老人生前提供的材料以及齐那尔巴图、恩和特古斯、色·陶格陶夫、斯仁道尔吉等处收集的材料，并走访了了解乌拉特历史的长辈之后，我才汇集整理了——简述乌拉特中公旗历史概况一文。

在此，我深切怀念安息在九泉之下的三位老人，并对本文给予无私帮助和支持的同志，表示衷心感谢。由衷地希望有暇一顾的贤人智者明鉴，提出批评指正。

一、乌拉特中公旗的由来与变迁

公元1206年，成吉思汗结束了蒙古各部落长期各自为政的混乱局面，统一了蒙古诸部，

成立了蒙古大汗国。当时，蒙古诸部生产、生活及保卫家乡领地所需工具、兵器的制作，全部由男子汉们来完成的。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之后，随着蒙古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行业分工日趋精细，相继出现了制作蒙古包、工具、兵器等手工作坊和手工艺匠专业队伍。这些心灵手巧的工匠部落，主要集中定居于盛产鱼胶、用材林丰富的呼伦、贝尔湖一带。这一部落的头人就是成吉思汗的胞弟哈布图哈萨尔第十五代孙——乌拉特的祖先宝日海。由于这一部落工匠闻名遐迩，所以，称呼为乌拉特部。

1368年，蒙古汗国统治结束，明朝代替了元朝。

1604年，巴图孟克达延汗的后裔林丹虽继承了汗位，企图结束蒙古诸部各自为政的混乱局面，把整个蒙古统一起来。但蒙古封建诸部都想各自相对独立。因此，林丹汗未能实现用武力统一其全蒙古的愿望。正在这时，东北女真满族部落强盛起来，努尔哈赤统一了诸部，于1616年建立了后金帝国。后金帝国统治者为了达到征服蒙古，灭亡明朝的目的，利用蒙古诸部贵族之间的矛盾，以壮大自己的力量，采取了挑拨离间的政策。一方面挑拨蒙古诸部贵族与林丹汗之间的关系，一方面用金银财宝、结亲等手段，争取

了蒙古部贵族结成盟友。清朝皇帝争取到了蒙古许多部贵族，壮大自己的兵马之后，利用蒙古打蒙古的方法攻打林丹汗部。林丹汗无法招架，带领部属撤退到青海。尔后，内蒙古诸部相继投奔清政府，乌拉特部于1633年归顺了清朝。

1644年，满族利用蒙古诸部的力量入关，推翻明朝。后金改国号为清。

乌拉特部归顺清朝政府后，按清政府的命令，先后出兵征战喀尔喀、苏尼特和高丽等，为扩大大清帝国的版图，立下汗马功劳，赢得了清朝统治者的信任和嘉奖。

顺治五年（1648），乌拉特部因征战有功，清廷封额日和台吉图巴为扎萨克镇国公，掌乌拉特后旗（东公），世袭；图门达尔罕台吉鄂木布之子鄂班为扎萨克镇国公，掌乌拉特前旗（西公），世袭；伊拉丹呼硕其色楞之子巴克巴海为扎萨克辅国公，掌乌拉特中旗（中公），世袭。赐包头西、黄河北，包括乌拉山、两狼山在内的辽阔草原为牧地。顺治六年（1649年）之秋，乌拉特三公旗奉清朝政府之命，在图巴、鄂班、巴克巴海叔侄三人带领下，驻守在黄河北岸，乌拉山南麓的昆都伦、哈达莫勒、毛尼胡硕三要隘。因乌拉特三旗头目均被清政府封过公（封建爵位名），所以，人们称其为三公旗。根据

乌拉特前、中、后三旗扎萨克驻扎定居的地理位置，也称为乌拉特西公、中公、东公旗。乌拉特三旗大体上以山水为界，没有详细划分界线，所以三旗属民交叉居住，分别管理各自的臣民，按照清朝政府盟旗建制，隶属于乌兰察布盟的管辖。

清宣统三年（1911年）清朝被推翻，民国宣告成立。民国政府对蒙旗仍然推行满清时期的制度，各盟旗诸王公台吉继续沿袭原来的爵位，坚持旗县并存，“分而治之”的政策，将乌拉特三公旗划归绥远省管辖。

1937年至1945年期间，乌拉特中公旗准、高勒、米尔、乌布尔科尔沁四个苏木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位于西北部的阿鲁科尔沁、玛拉吐尔两个苏木成立了以管旗章京巴特尔为首的“博克梯办事处”，属国民党傅作义管辖，因此，乌拉特中公旗分割成两个部分。

乌拉特中公旗西至瑯杜斯查干山，与阿拉善左旗毗连；西南与杭锦旗接壤，并与西公旗交叉居住；南至黄河北岸；东与东公旗交叉居住；东北与达尔罕贝勒旗为邻，北与喀尔喀相望。据民国二十六年（1937）统计，总面积为35,000多平方公里。

1949年9月19日，绥远省和平解放的同时，

乌拉特三公旗人民也获得了解放。1950年7月18日，在本巴台乌兰敖包举行盛大庆祝会，热烈庆祝乌拉特中旗人民政府成立，宣告了乌拉特中公旗三百年封建统治的结束，乌拉特草原各族人民获得了新生，成为国家的主人。

二、解放前旗扎萨克政体与行使政务的概况

清朝统治者，将蒙古部多数控制在自己势力范围之后，对蒙古诸部积极实行了盟旗建制的管理体制。

清朝时期，旗是由执行中央政府命令的基层军事单位，发展到后来便成为军政合一的基层单位。

楚格拉干(旧时盟)是代表清政府监督检查本旗兵丁注册，战时奉命动员所辖旗军征战；平时帮助解决旗扎萨克解决不了的民事案件，但不能直接插手旗务，更没有权力下达命令。满清政府实行盟旗建制的目的，就在于防备蒙古诸部形成统一的强大力量，削弱其实力，将其分而治之，为清朝大业服务的这样一个基本措施和政策。这样，蒙古诸部内外被封闭、被控制，被分割成相互间没有任何联系的诸多旗，各自为政。然而，蒙古族统治者们又满足于可以世代相袭的高官厚禄。上述情形，在我国其它少数民族历史上是不曾有

过的。

在乌拉特部，建旗以来的数百年间，旗扎萨克的统治地位一直由公诺彦世代承袭。乌拉特中公旗扎萨克、辅国公，由巴克巴海开始到最后一个扎萨克为止，共世袭了十三代。最后一个扎萨克诺颜（乌拉特三公旗虽不适宜称呼诺颜，但因长期叫惯了诺颜这一称呼，故顺其习惯而称呼之）是林沁僧格。民国二十二年（1933），他三十五岁时继承其父王巴布道尔吉扎萨克、辅国公，到民国三十八年（1949）参加绥远和平起义，迎接乌拉特中公旗和平解放，共执政十六载。扎萨克诺颜，是一旗之首脑，除了负责解决全旗军事、行政、司法、税务以及管旗章京以下官员的任免等事务以外，还要完成国家赋予的其他军政任务。

旗衙门是扎萨克诺颜处理全旗军政事务的最高行政权力机构。旗衙门设有：两名协理、一名管旗章京；任命左右梅林章京，左右扎兰章京各一名，协助扎萨克诺颜管理全旗。

下面简述一下乌拉特中公旗和平解放前夕，旗、苏木两级官员及其任务职责：

协理与扎萨克诺颜一样，由中央政府管理并任命，协助扎萨克诺颜处理全旗行政、军事、经济、司法、税务等事务。协理职务必须由享有威

望、有功绩、台吉出身的人来担任。乌拉特中公旗有两名协理。解放前的两位协理是明安满达和巴图毕力格。

管旗章京除协助扎萨克诺颜管理全旗之外，其主要职责是负责处理刑事案件。解放前的管旗章京是巴特尔。

管旗章京下面有：左梅林章京根登朝克，右梅林章京敖特根，左扎兰章京那木吉拉斯楞，右扎兰章京查格德尔斯楞。这四位章京将全旗六个苏木分为左右两翼，分别管理。人们将这五位官员称呼为“掌印五臣”。全旗重大事务由五大官员协商并决策之后，上报扎萨克诺颜和协理批准，方能贯彻实施。

旗衙门还要委任一名达木勒（领催，即管事），其任务职责是，分管旗财政，负责征收各苏木粮食、肉畜、役畜等经济工作。

旗衙门还配备大小管家各一名。根据协理和值班章京的旨意，负责管理和安排旗衙门其他公勤衙役人员，及其经济事务。除此之外，还有若干个衙门笔贴式（书吏）、差夫。他们的职责是起草缮写文书、信件并负责分发、登记、传递、押送犯人等事宜。

乌拉特中公旗衙门在其三百年间，主要是住蒙古包办公。由于大规模垦荒开地，加之土匪作

乱，局势动荡，经常流动搬迁。旗衙门曾先后穿梭于昆都仑花（包头附近）、达巴干高勒北口、伊和乌力吉吐（后旗）、温都尔珠萨郎（中旗巴音哈太苏木）、毕其格吐塔拉（中旗温根苏木）、巴日哈山、阿吉吉玛塔拉白（温根苏木）、宝日罕吐（川井苏木）、乌力吉吐宝日呼硕（后旗）、乌兰陶勒盖（后旗）、川井、东升庙、德日苏淖尔、本巴吐乌兰敖包等地，不断搬迁，流动办公。

旗衙门下面设有基层单位，叫作苏木（亦称“箭”或“佐”）。苏木是旗衙门设在基层的政治、经济、军事组织，负责管理基层行政工作。中公旗下设六个苏木。每个苏木分别委任一名苏木章京，按指令负责纳税、纳贡、建立兵丁注册、选派传递信函差役和处理民事纠纷等事宜。苏木章京手下派一名理都（也称骁骑校），协助章京工作。每个苏木委任一名达木勒，负责管理苏木经济工作。还任一名差役，负责传递信息、征赋等工作。

苏木下面将每五十户组织成一个贴宾，任一名贴宾长（五十户长）。乌拉特中公旗六个苏木共有二十一个贴宾：

米尔苏木章京宝音巴达拉胡。有六个贴宾：米尔贴宾、乌布尔贴宾、阿鲁贴宾、准贴宾、阿

巴嘎贴宾、呼和楚勒贴宾。

玛拉吐尔苏木章京图布吉尔格拉。有三个贴宾：乌布尔贴宾、东达贴宾、阿鲁贴宾。

准苏木章京旦苏荣扎布。有三个贴宾：巴荣贴宾、东达贴宾、阿鲁贴宾。

乌布尔科尔沁苏木章京松迪扎布。有三个贴宾：准贴宾、巴荣贴宾、毛那贴宾。

高勒苏木章京巴特尔。有三个贴宾：扎鲁特贴宾、巴尔虎贴宾、浩日古贴宾。

阿鲁科尔沁苏木章京明太。有三个贴宾：伊和贴宾、巴嘎贴宾、呼鲁贴宾。

高勒苏木的扎鲁特贴宾，是扎萨克诺颜的阿勒巴图（承担赋役的奴隶或属民），必须跟随诺彦，在其附近牧场定居，放牧诺颜仓畜群，并承担拾粪捡柴，运水挤奶，剪毛抓绒等日常杂活，扎鲁特贴宾只向扎萨克诺颜上贡，而对旗衙门和苏木没有交税上贡义务。

乌拉特中公旗地域辽阔，居住分散，以游牧生活为主要特点。旗下面虽有苏木、贴宾等基层组织机构，但其苏木章京、琿都、达木勒等没有处理公务的固定办公地点。所以，平时经营各自的畜群或做些日杂事务。若有公务办理，也分别在各自家里处理。公职人员集聚在一起，协商处理公务的机会很少，因此，乘旗衙门每年举行三

次的楚格拉（集会），集中处理各自苏木公事。

这三个楚格拉即“启印楚格拉”、“秋季楚格拉”、“冬季楚格拉”。楚格拉何时举行，旗衙门提前通知各苏木。苏木章京接到通告后立即交给苏木琿都、达木勒、差役，向属民征收骗马、驮运驼、食用畜、口粮、包帐等物，带领适当数量衙役和差夫，按指定日期到达旗衙门并要有秩序地以六个苏木的排列顺序安营扎寨。每年举行的三次楚格拉各有其特点，所要协商解决的事宜和任务也不相同。

“启印楚格拉”，要选择每年正月中旬后的吉日举行。这个楚格拉要启封上年腊月所封的旗扎萨克大印，并举行隆重的启印仪式，向文武官员拜年祝贺，任命晋升一部分旗苏木官员，授职衙封称号。除此之外，还要协商解决全旗重大事件，并举行喜庆新年的盛宴。

“秋季楚格拉”处理解决的事情要比其他两次楚格拉多一些。而且要选择阴历七月的一个良辰吉日开始，历时半个月至二十天。主要内容有：一方面要审理解决急需处理的全旗性重大事情和案件，宣判违法犯罪分子，任免部分官员。另一方面还有一项固定的例行内容，必须在这个楚格拉上具体兑现并加以实施。具体地说，就是从上年秋季集会以来，对全旗财政收支情况进行

年度決算，確定賦稅金額和上貢實物，將征收任務具體落實到每個蘇木。蘇木再根據自己財物開支總額，一併推派到所屬庶民人頭上，加以實施。

“冬季楚格拉”，每年陰曆十月份開始舉行。主要是兌現秋季集會上確定的承包任務，諸如財政開支、上貢的款項、肉畜、糧食和其他實物（包括毡包餅幪、幪毡拉繩、圍毡包毛繩、毡子、毡墊）等，如數交給諾顏倉和旗管事。

從滿清政府到國民黨統治時期，烏拉特中公旗都依據當時朝廷法律，採取治罪懲罰的手段，世代統治着貧苦勞動人民，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一般民事案件，蘇木章京可以自行處理。但大型案件判決，必須由旗衙門召開群眾大會，公開審理。審理判決的形式，主要有以下三種：一是懲罰，對於犯有輕罪或一般違法者，罰款或罰牲畜。對有些違法犯罪分子，從重懲罰。二是懲罰與用刑相結合。三是对重罪犯和屢教不改者從重發落。諸如根據犯罪性質和情節，對其進行鞭打、套脖枷游蘇木示眾、裝進皮口袋等施刑懲罰。三公旗扎薩克諾顏對違法犯罪分子，儘管採取如此酷刑，但他們沒有直接殺人的權力。然而，他們以審訊的名義將人致死後，以“未能承受審訊而身亡”上報，掩人耳目，混淆視聽。

三、经济概况

乌拉特中公旗地处祖国北部边疆，位于蒙古高原西北部的内大陆深处。地势北高南低，海拔1280—1920米之间。北部为高原山梁，中部为丘陵盆地交错，南部为阿拉旦哈日古那山和乌拉山巍峨耸立，山前有肥沃的平原良田，西部为沙碱交织的茫茫沙海。由于受蒙古高原气候影响，具有温带干旱气候特点，日照充足，降雨量少，风沙多，温差大，气候变化异常。乌拉特中公旗地域辽阔，自然资源丰富。是水草丰美的天然牧场，为牛马驼羊和野生动物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每当春夏之际，乌拉特草原绿草如茵，百花争妍，蓝天白云下，五畜成群，骏马奔驰，呈现出独特的自然景色。五、六百只（头）至一、两千只（头）牲畜的牧户，比比皆是。据说，有的人家牲畜多得无法数清究竟有多少，索性赶进凹地，用眼睛大体估量一下是否有短缺。

乌拉特中公旗，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方式，是由流动大的游牧经济所决定的。畜牧业经济一直是他们生息繁衍的生活主要来源。他们世代住蒙古包，寻觅清澈的水源，查看鲜嫩的青草，是为了走敖特放牧，发展畜牧业服务的。

旦冬季来临，为保牲畜膘情，就迁居高山阳坡和扎干林、芨芨草丛生的冬营地。和煦的春天到来，搬到水草丰美而背风的春营地，以度春天。夏初时期移到平矮山丘、山梁等凉爽的夏营盘，让牲畜抓好基础膘。秋季回牧到秋高气爽的秋营地，巩固膘情，抓好油膘。牧民们安全度过了冬春关，在夏秋两季让牲畜抓好水膘、油膘，其实每季度不只是一次走敖特尔，而是视水草情况，多次小倒场走敖特尔游牧。

乌拉特蒙古族食物主要是奶、肉食和粮食。可是夏秋季以奶食为主，冬春季以肉食（主要是牛羊肉）为主。粮食，冬初赶远路到包头或杭哈巴荣高勒（套内）买回来。

乌拉特中公旗牧民的畜产品、货物交换最初阶段，主要在归绥进行。十九世纪末，包头镇也发展起来。1923年通火车后归绥、包头就成为北方贸易交换的中心。后来，乌拉特草原旅蒙商也逐渐多了起来，有些商人给旗、苏木章京等官员送礼行贿，进而定居下来，诸如同义隆、四义堂、万国昌、义和久、傅国四、万和昌、乌兰道布等贸易交换商号相继出现。这些商号的大商人随意抬高物价，盘剥牧民乃至榨穷了他们。商人们却倒买倒卖牲畜、绒毛、皮张等，发了大财。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归绥、包头后，国民党对沦陷区进行了经济封锁。可是与日本商人建立了某种默契联盟的私商乘机窜入牧区，将他们的货物高价卖给牧民，低价买回牧民的牲畜、皮毛，使牧民穷到无法维持生活的程度。如用十六尺布料换取二十斤羊绒，一斤东生烟换回一只大绵羊，五至十斗原粮或者炒米骗走牧民一匹好马。

1940年春天，扎萨克诺颜林沁僧格将他的两千斤驼绒运到归绥，想卖个好价钱，反而碰了钉子。然后通过韩宝才卖出手的。同年冬季，伪蒙疆政府发出指示：“蒙旗都要成立合作买卖机构要自己作主搞生意。”

民国30年（1941）扎萨克诺颜林沁僧格、协理巴图毕力格、管旗章京策布格扎布与其他章京们商量决定，在旗衙门所在地川井成立“乌拉特中公旗群众生活豪勒希亚（合作社）”。合作社主要由巴图毕力格协理主持。策布格扎布任理事会理事，韩葆、根登朝克任副理事。苏德那木、巴图苏和任总记帐先生。合作社资金来源：诺颜鲁、旗衙门各出一万元；官员和富裕户分别出五百元至一千元；其他每户出五十元至五百元。总共筹集资金五万多元，成立了“乌拉特中公旗群众生活豪勒希亚（合作社）”，并开始做生意。

从民国31年（1942）开始，在乌力吉图、阿

日呼都格庙、巴音宝日庙、乌拉山前的昆都仑庙和山后的海勒斯太等地，分别设了分销店，扩大了营业规模。

建社当年收购并推销绒毛八万多斤。民国31年（1942）收购绒毛20万斤，牲畜几千头（只）；第二年收购并销售绒毛25万斤，大小牲畜四、五千头（只）。然后，从内地组织群众生活急需的大量货源。如各种布匹、绸缎、蒙古靴子、粮食、红白糖、茶、酒、烟等，出售给全旗二千多户牧民，为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提供极大的方便。

为增加合作社资金投入，于民国31年（1942）至32年（1943）间，对合作总帐进行了查对核实，应付清的利息未付，连本带利作为入股者的股份继续留在帐面上，为扩大经营再生产打下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民国33年（1944）7月，国民党傅作义部队围歼驻守在杭盖诺其、斯尔本朝黑雅、乌力吉吐、川井等地日本特务机关和伪军政驻地的战斗中，川井合作总社和乌力吉吐分店遭到严重破坏，3万斤驼绒，2万斤羊毛折合伪蒙疆币3万多元的物资全部被抢劫一空。

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旗协理巴图毕力格、合作总社副理事韩葆、总记帐先生苏德那木、巴

吐苏和等人协商，提出了改革经营方法，扩大销售网点的意见。紧接着新增设了六个分销店，生意有了新的的发展。

1950年，乌拉特中旗人民政府成立时，将原来川井的旧合作社，改建为乌拉特中旗供销合作总社，旧合作社移交的物资总金额达57万元（其中包括群众合作社初建时个人股份11万元），为建立真正人民当家作主的供销社，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清朝末期，满清政府对蒙古地区王公采取诱逼和恩威并济的办法，使其让出牧场，进行开垦。有些王公也贪图钱财，出卖旗地，把大片水草丰美的牧场让出来，任其开垦。

到民国时期，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与蒙旗王公同流合污，大规模放垦。将乌拉特中公旗乌拉山以南，黄河北岸之间的丰美牧场以及大小余太、石那干山、鹳鹤图等辽阔牧场被开垦。广大牧民失去牧场，只好迁居干旱缺水的戈壁沙漠或高山地区游牧罢了。

乌拉特中公旗蒙古族中木匠、银匠、铁匠、铜匠等。他们都分散定居，制作蒙古包用具，牧民日常生活和生产工具、装饰品等。制作毡包饼蒙、毡子、毡垫时，为提高质量，以乌素或几户人家联合起来，用驼马拉着做出来的毡子质

量很好。民国31年（1942）由巴图毕力格协理提议，从归绥买回来两台织机，在旗衙门所在地川井建起了有16名工人的毛织厂，生产毛毡、毛毯和毛布等，然后售给衙府官员、公职人员、学校老师和学生。民国33年（1944）7月25日，傅作义军队袭击川井日本特务机关战斗中，国民党部队将该厂生产的一千多件毛衣毛裤、大量的毛毯和两千余块毡子抢劫一空，只留下一座空厂房。

四、武装力量的演变过程

清朝时期，旗和苏木机构本身就是军事组织，也是行政组织。

当时，旗内十八岁以上和六十岁以下男性公民（喇嘛和庙丁除外）都要登记注册，以便履行义务。每150名兵丁组成一个苏木，而每个旗有若干个苏木。乌拉特中公旗有六个苏木，旗扎萨克就是全旗武装部队的总指挥。凡在兵丁册中注册登记者，都要自备战马和武器等。当时作战用的武器主要有弓箭、长矛、马刀等。战时，兵丁们在苏木章京和旗扎萨克率领下征战杀敌；平时，除留下少数人保卫旗苏木安全，多数人回家从事生产劳动。十七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初，清朝执政250多年间，蒙古地区因没有发生较大

的战争，蒙古诸旗苏木兵丁制度和军事机构，自然松散了下来。

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孙中山建立了中华民国。但北洋军阀袁世凯夺取了其政权，便是各军阀之间争权夺利，内部混战的开始。

正在这个时候，喀尔喀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活佛的一种封号）为头子的一批世俗封建上层人物，在沙皇俄国的阴谋策动下，企图内外蒙合并，建立一个独立的蒙古大帝国。从各旗招集兵马，用俄国新式武器装备起来。首先将驻守在喀尔喀大库伦的满州官吏和驻军官兵，从喀尔喀蒙古赶了出来。然后，从1913年开始，便挑起了从北洋军阀手中收复内蒙古诸旗的战争。

在这一战争中，叛军虽然占领了乌拉特中公旗乌拉山以北土地，但1914年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欧国家之间互相残杀，无暇东顾。哲布尊丹巴也被民国军队打败而撤退了。

喀尔喀叛军撤走后，全部用俄国武器装备起来的以芦占魁为首的巴雅尔公、喀喇沁贺喜格图、嘎海苏龙等三千多叛军，重新打出“独立”旗号，留在中公旗和河套区，成为货真价实的独立土匪，到处抢劫，奸污妇女，制造事端，给人民

群众造成了极大的灾难。

在如此严峻的紧要关头，乌拉特中公旗扎萨克巴布道尔吉携带家眷、财物，隐居在险要的巴日哈山和阿拉坦好日格山鸟嘎拉计乌兰哈达。

旗扎萨克巴布道尔吉全家在深山隐居，而牧民百姓却在水深火热之中煎熬。民国八年（1919）春节，管旗章京那顺贺希格，和曾经任过旗达木勒的斯仁嘎安本、山丹庙东博格多（活佛中之最高者）喇嘛商量决定：从中公旗西部选拔二十名用火枪打猎的好猎手，管旗章京那顺贺希格捐赠了两支别旦式枪和二百发子弹，再招两名士兵，成立了由二十二个人组成的“乌拉特中公旗部队”。

新成立的旗军没有辜负父老乡亲们的嘱托。建军不久，和“独立”队匪徒连续几战全胜，不仅保卫了人民生命和财产，而且缴获了新式武器弹药，把军队扩编为二十五人。

旗军胜利的喜讯象春风传遍了乌拉特草原，消息也很快传到了扎萨克诺颜巴布道尔吉的胞弟朱日梅德道尔吉耳朵里。这位武官出身的维京（封号）诺颜十分感动，和那顺贺希格管旗章京商量，决定亲自到喀尔喀购买枪支弹药，扩充武装力量。

维京诺颜拿出自己所有的金钱，还向富户借

了款，装扮成商人模样，领了五名好枪手，于当年三月中旬出发，直奔大库伦（指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到大库伦后，通过那里的俄国商人，以买猎枪的名义购买回50支别旦式枪和7200发子弹，外加两支手枪。

回旗之后，和管旗章京那顺贺希格商量，按枪数招新兵五十二人，全副武装，组成一个队，驻守在乌盖口。对首批组建起来的二十二名火枪兵，进行了表彰，全部遣散回了家。

为了扩大旗军势力，维京诺颜与旗其他官员商量，当年9月二进蒙古大库伦，购来100支连珠枪（“7·62”），3000发子弹，5支手枪，1000发子弹。

维京诺颜朱日梅德道尔吉招集旗官员们商量，又招收100名新兵，全副武装，组成两个队，分别驻守在雅玛吐、宝日特格。将三个队根据其驻守的地理位置，分别称为“西队”、“中队”、“东队”。每路军分别配备33支连珠枪，每支枪配100发子弹；19支别旦式枪，每支配100发子弹；2支手枪，每支配100发子弹。西、中、东三队，都分编了五个班，所需战马、蒙古包、粮食，均由六个苏木供给。

此后，大约民国10年（1921），驻在乌拉山南部的宝尼亚班和乌拉山北的宝音贺喜格班（名

义上称为两个班，实际上有与六个班相等的兵员），均增加了新兵员。所以又编为一个队，称为第四队，驻守在乌拉山。第四队的给养从好林吉勒山（二十年地山）、前明安滩、石纳干山等地的地租和水草费中解决。

归绥和包头通火车后，这两个城市就成了运输和商业的集结地。西北地区的商人，也开始通过黄河水路或茂明安旗和乌拉特三公旗陆路，到包头、归绥做生意了。

当时，由于局势混乱，匪徒四起，拦路抢劫，给过往商队的安全造成极大威胁。

民国18年（1929），甘肃、归绥、包头商会两次派人邀请中公旗扎萨克巴布道尔吉派兵护送其商驮。但部分协理章京等仕官们却不同意，并设法阻止。他们说：“在护送商驮时如遭土匪抢窃，则会产生还不完的债。无论如何也不能同意”。因此，扎萨克巴布道尔吉没有亲自前去商谈。最后只好委派住在包头的绥远省垦务局劝垦员力德格尔桑和原衙门管家额尔和木巴雅尔（也叫特木尔）二人去商谈。他们到归绥后，手持商会求文向绥远省政府作了汇报，经研究批准，决定建立“乌拉特中公旗西北护路保商团”，全部费用均由商会负担。他们在归绥住了半个月，与归绥、包头的商会代表进行了协商，在包头建立乌

拉特中公旗护路保商团办事处，购买房屋，增购枪支弹药、收取驼队过路费、护送商驮报酬等方面都签了协议书。当德力格尔桑、额尔和木巴雅尔返旗时，恰遇昆都仑6月19日的庙会，扎萨克巴布道尔吉和管旗章京那仁在庙里敬神拜佛，观看喇嘛跳鬼（喇嘛庙的一种文艺活动形式）。他俩作了详细的汇报后，扎萨克诺颜巴布道尔吉同管旗章京那仁商量决定，委任额尔和本巴雅尔为乌拉特中公旗山北护路保商团团长，德力格尔桑为乌拉特中公旗西北护路保商团驻包办事处处长。驻包办事处设在由包头商会出资购买的包头市（现东河区）口袋房巷2号院的里外院内。将旗军的中、西、东三队仍留在原地，保卫旗内安全，任宝音贺希格为卫队将军，将其部队全部调给护路保商团，又招收了部分士兵，增加了枪支弹药，组建了五个队。分别任命额尔和木巴雅尔为一队队长（兼），孙三为副队长，图门乌力吉为二队队长，宝尼亚为三队队长，色单巴为四队队长，那木斯赖为五队队长。一至四队驻包头郊区哈业脑包乡宋家壕村，五队驻乌拉山北海拉斯太沟口。为了保证军队经费，增加收入，还在海拉斯太沟口（即南官井）、西水道、柳树泉、黑沙图德力森淖尔等地建立了税卡子。任命韩宝为黑沙德力森淖尔税卡卡长，二和尚为柳树泉税卡

卡长，苏贵为南官井税卡卡长，开展工作，征收商队运输过路税和大烟商品过境税。几年来共征收税款26万元。除给乌兰察布盟盟长云登旺楚克和蒙政会德穆楚克栋鲁普上贡一部分现洋，军费开支6万元外，其余现款购买七辆汽车。搞运输为诺颜仓收入8万元，并为本旗官员出远门提供了交通上的方便。

民国26年（1937）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芦沟桥事变，疯狂进犯我华北地区，相继占领了北平至包头铁路沿线的城市。至此，甘肃、新疆、宁夏的商人也停止了前往归绥、包头做生意的活动，故乌拉特中公旗的护路保商团也不复存在了。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乌拉特中公旗后，将旗部队改编为边境警察，控制在日本人手中。

民国33年（1944），德穆楚克栋鲁普把伪乌兰察布盟边境警察，改为蒙古师，任命中公旗扎萨克诺颜林沁僧格为师长。在各旗建立蒙古军团级建制时，在中公旗任命林沁僧格之子雄诺东鲁布为团长、巴图毕力格和巴图二人为副团长。

民国34年（1945），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绥远省保安司令部将中公旗伪蒙古军改为保安司令部，任命雄诺东鲁布为少将司令，巴图毕力格为大校参谋长，苏德那木道布杰为中校副官长。

司令部下设两个团，韩葆、朝鲁分别任团长，下属六个连。

1949年，“九·一九”和平起义后，将韩葆团整编为公安部队；朝鲁团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乌兰察布盟军分区乌拉特中旗支队。

五、文化教育

在谈乌拉特中公旗解放前教育之前，略提一笔该旗历史上有名的两位文人。

十八世纪，黄教传入乌拉特地区很快盛行。乌拉特中公旗毕力贡达来（藏名叫西日巴扎木苏）从小聪慧伶俐，学习刻苦认真。所以，青年时就精通藏经和蒙文，大量翻译了藏文佛经，曾获得古西（学位名称之一，专门从事佛经翻译工作）称号。

乌拉特古西毕力贡达来，奉清朝皇帝圣旨，应邀在参加《甘珠尔》（蒙、藏文大藏经的两个组成部分之一。意为佛语部）、《丹珠尔》（蒙、藏文大藏经的两个组成部分之一。意为论部）的翻译、审定工作和主持再版印刷中起了重要作用。他还著有《大蒙古信号字母类推论述学妙诀》一书，系统地排列了蒙文字母，为统一和规范蒙文书面语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是乌拉特中公旗最早的翻译和文人。

十九世纪，乌拉特中公旗又出了一名叫做金巴道尔吉的大文人，小时当了旗庙昆都仑庙（脑门巴彦速楞图召）沙毕喇嘛。他从小聪颖好学，对蒙藏两种文字深有造诣，坐了本旗查干高勒庙（推列哈木噶拉齐召）首席喇嘛拉布占巴（喇嘛教神学或哲学的最高学位）格隆（受过戒）乌拉特中公旗扎萨克辅国公拉旺林沁的提议，金巴道尔吉用四年时间，于1849年写出《水晶辞书》这一著名历史著作，为研究蒙古简史特别是研究蒙古地区黄教盛行的历史，提供了有据可循的丰富资料，进一步促进了乌拉特中公旗文化事业的发展。

近代建造起来的乌拉特寺庙中的塑像、壁画、彩画等都非常精美别致，丰富多采地反映了蒙古族风俗习惯和精神风貌。从蒙古族用具和服饰上精致的雕刻和图案中，也可以了解到乌拉特蒙古族具有多么非凡的智慧和创造力。

林沁僧格的《运气兴盛》字样和《香炉》图案的画轴，格外生动、别致。从这里也能看出扎萨克诺颜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欣赏能力。

那时候，乌拉特地区没有一所由国家或者旗、苏木办的学校。王公贵族诺颜和富裕人家子弟，学文习字主要靠聘请文人秀才办家庭学校，或者把子女送到有蒙经的寺庙中去，接受一般的

教育。然而，广大庶民百姓的子女，连受这点教育的条件和权力都没有。怎么办呢？为了下一代的前途，只好寄人篱下，或去寺庙当班弟喇嘛，或为求师，给足报酬，带够口粮，到老师家拣粪拾柴，放羔羊牛犊，利用早晚工余时间认字母，学几个字罢了。然而，在当时只学一门所谓的“语文”课，根本没有一本象样的语文课本。

宣统三年（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满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1917年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推翻了俄国沙皇统治，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此后，1919年5月4日我国青年运动的革命浪潮和新文化运动，席卷了全中国。

民国13年（1924），乌拉特西公旗开明人士兰柜桑杰（因他家住在兰柜窰子而得名）提议，三公旗在包头合办一所学校。与三公旗扎萨克诺颜商量后，经绥远省都统批准同意后，在包头成立了公办的乌拉特三公旗小学。学校经费问题，从西公旗千里庙南同义隆拨出150顷水浇地，作为学田地。中公旗决定，从乌拉山前选送八名学生赴乌拉特三公旗小学就读。但是，扎萨克诺颜巴布道尔吉因协理宝音巴达尔胡的一句话，就阻挡赴包头就读的学生，没有去成。宝音巴达尔胡协理

对扎萨克诺颜巴布道尔吉说：“听说扎萨克诺颜准备让少年儿童进学堂读书，是吗？过去清朝皇帝曾让儿童进学堂，而后丢掉了皇帝宝座；如今诺颜您也要让儿童们进学堂，是否准备弃政丢乌纱帽呀？”从此以后的十年间，乌拉特中公旗没有建过学校。王公贵族和富足人家仍然聘请家庭教师，培养自己的子女，而普通牧民的极少数子弟也依旧到老师家，利用工余时间认几个字而已。

1、民国23年（1934）5月15日，乌拉特中公旗扎萨克诺颜林沁僧格的阿哥雄诺东鲁布已经到了13岁读书年令（扎萨克诺颜的公子阿哥们到了13岁，必须上学念书，这是历史上传下来的传统习惯，也是他们高贵身份所赋予的特权）。扎萨克诺颜林沁僧格从归绥聘请一位蒙汉满三语兼通的老师，他叫发疮来。诺颜将他请到自己在宝尔宰吐色音胡都格的寓所，又从六个苏木招来45名子弟，和雄诺东鲁布阿哥一起就读，名为乌拉特中公旗小学。校长由扎萨克诺颜林沁僧格担任，发疮来、巴图毕力格、巴拉登、斯日古楞等协助教书。从六个苏木征收了蒙古包，作为孩子们授课或住宿的教室和宿舍。伙食由旗衙门支供。到民国25年（1936）雄诺东鲁布结束了学业，发疮来也自然回家去了。从此，这个小学校由

旗衙门直接管理，衙门府搬到哪里，学校就迁到哪儿办。

1938年，旗衙门迁到杭盖诺其，小学也搬到那里去了。1940年至1943年，旗衙门迁居乌力吉吐，学校也在这里办。有学生47名，右扎兰章京达瓦敖德斯尔任校长，巴达荣贵、敖特根、阿布杰等任教师。

民国32年（1943），旗里在川井盖了不少房屋，旗衙门和学校又搬到川井来。民国33年（1944）之夏，不少学生患病，又死了四、五名学生，学校因此而放了假。

民国35年（1946）初，扎萨克诺颜林沁僧格和协理巴图毕力格商量，决定在本巴吐庙重建学校。巴图毕力格协理亲自住在本巴吐庙上，在原有学生的基础上又招收了部分新生开了学。博黑敖其尔任校长，奇旦苏德那木、齐那尔巴吐、诺力布东迪布、桑杰托布、佟文任老师。民国37年（1948）3月，将川井学校与本巴吐学校合并为蒙古完小。然而，由于当时时局动荡，土匪骚乱，很难坚持正常授课。解放后，迁到海流图命名为海流图完全小学。

2、德穆楚克栋鲁普在苏尼特右旗成立了女子学校，名声影响甚大。民国31年（1942）夏季，根据林沁僧格的建议，从准苏木、高勒苏木、米尔

苏木、乌布尔科尔沁苏木招收了近50名女孩子，集中在川井乌布尔顺都勒，命名为“昌盛女子学校”。校长由协理博彦巴达尔胡担任，老师有色音诺木图、敖特根等人。学校伙食与其他开支均由合作社准备，合作社负责人韩宝具体负责管理。民国33年，旗衙门为了安排好学生生活，给学校拨了带羔母驼30峰、带犊奶牛15头、带羔母绵羊150只。可是当年秋天，在国民党部队袭击川井的战斗中，学校遭破坏而休假了。

3、民国31年（1942），家住乌拉山前的旗官员图门乌力吉，听说扎萨克诺颜林沁僧格在旗里聘请老师办学的消息，他也聘请了蒙汉两位老师，将10多名孩子集中在都伦庙，创办了私人学校。太保任蒙文教师，梅百搜任汉文教师，老师没有薪水，只供其伙食和零花钱。学生伙食费由昆都伦庙牌地的税收中解决。

1944年，毕业于德穆楚克栋鲁普“兴蒙学校”师资班的诺尔布东迪布、巴吐扎布两位老师，来到该校，和图门乌力吉商量决定成立新型的小学。在原有十名学生基础上又招20名新生，授课内容由单课语文增加到数学、地理、常识、体育、音乐、美术等。协理巴图毕力格来该校观看后，决定老师薪水每月30元由群众生活合作社供给，学校伙食及其他开支由昆都伦庙牌

地税收中解决。民国34年（1945）由于日本和国民党军战乱，学校暂时休学。

民国35年（1946）秋天，乌拉特中公旗保安部队二大队队长朝鲁，从乌拉山前宝尔罕吐军营中，腾出12间房子，学校开始复课了。

民国36年（1947）改名为“绥远省立乌拉特中公旗边疆实验小学”。

1949年9月绥远省和平解放，宝尔罕吐小学也获得了新生。为建设繁荣乌拉特草原，培养出了许许多多新生力量和文人能手。

六、宗教与寺庙

清朝时期，满清政府统治者对蒙古各部落，采取了政治高压手段，以盟旗建制的管理方式将其控制在自己手里。与此同时，在蒙古地区广建寺庙，传播喇嘛教，公开宣扬什么“贵族台吉，之所以有享不完的荣华富贵和权势地位，是他们前世行善积德的结果；而阿勒巴图（奴仆），之所以受苦受难，处在无权无势的地位，也是他们前生作孽造成的报应。因此，只有听从天意，放弃斗争，忍受一切苦难，才能洗清前世罪过，后世才会有享不尽的人间荣华富贵。”清政府和蒙古族封建统治者，利用宗教信仰麻醉蒙古族人民的斗争意志，把宗教作为一种巩固其统治地位的

措施和工具。清政府还公开宣称：“在蒙古地区传播发展喇嘛教，是征服蒙古人之大事，非同小可，不可不保护也。”清政府如此明白无误地道出了大兴喇嘛教的政治目的，不言而喻，在于征服蒙古族人民。清政府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还公开宣布：当喇嘛者不纳贡交税，不出兵丁，不承担官差，“一户有两名男孩者，其中一名必须当喇嘛”。乌拉特中公旗建庙传教，信奉佛教教义教规的历史，还不到三百年时间，然而，它对中公旗社会历史的发展和蒙古族人民的生产、生活，造成的影响是相当严重的。乌拉特中公旗有三个儿子的人家必有两个当喇嘛的规矩，由庶民百姓到扎萨克诺颜都必须严格执行，任何人不得违犯。扎萨克诺颜林沁僧格将三个儿子中的两个送去当喇嘛，因而喇嘛人数迅速增加。由于喇嘛终身不娶，也不许参加生产劳动。所以，中公旗的社会生产为急速下降，牧民负担日益加重，造成了严重后果。

下面简要叙述一下中公旗大小寺庙与呼拉尔概况：

昆都伦庙——称号为脑门巴彦速楞图召（法喜寺），系中公旗旗庙。在乌拉特草原享有盛名，曾是建筑雄伟的大寺。现在包头市境内，始建于雍正七年（1729），在鼎盛时期曾有喇嘛一

千多人，但常住喇嘛只不过百余人。然而该庙是培养训练全旗大小寺庙首席喇嘛，并经考试答辩合格者才准授予称号、进爵，这是历代传下来的特权。荣获该庙授予的称号或爵位的喇嘛，才能赢得人们尊敬和羡慕。该庙有东西两位沙卜隆喇嘛，系班禅博格德之勘卜爵位。解放前的东沙卜隆喇嘛扎木雅现住乌拉特中旗巴音苏木，任乌拉特中旗政协委员，巴盟政协委员，巴盟佛教协会副会长等职。

杜嘎尔庙——称号为挨利得莫塔勒哈齐召，系中公旗扎萨克诺颜家庙，位于现中旗巴音哈大苏木。

巴彦山丹庙——称号为沙金尼德勒尔古勒克齐召（广宗寺），系阿鲁科尔沁苏木寺，曾有过400多名喇嘛，有名的大富寺，呼毕勒罕喇嘛叫艾博杰。位于现乌拉特后旗巴音温都尔苏木。

查干高勒庙——称号为推列哈木噶拉克齐召（护繁寺），系玛拉图尔苏木寺，曾有过60多名喇嘛。乌拉特大文人、历史学家金巴道尔吉就是该庙的首席喇嘛。位于现乌拉特后旗朝格温都尔苏木。

琿杜斯查干阿古拉庙——称号为布哥得勒乌力基图召，系阿鲁科尔沁苏木庙，位于现阿拉善左旗交界处。

温根特格庙——称号为尼特贝勒乌勒吉图召（普吉寺），有一位沙卜隆（活佛中地位最低者），曾有过100多名喇嘛，位于现乌拉特中旗桑根达来苏木。

乌兰陶勒盖庙——称号为萨音尼厥拉古勒克齐召（吉福寺），位于现乌拉特后旗巴音宝力格镇境内。

伊很查干庙——有两位沙卜隆，近30名喇嘛，位于现乌拉特中旗巴音杭盖苏木。

萨芒丹庙——系米日苏木主庙，始建于1863年，有一位沙卜隆和近30名喇嘛。解放当初的沙卜隆是旦金扎木苏喇嘛。位于现乌拉特中旗乌兰苏木。

绉秋德奇勒庙——称号为特哥木勒阿木腾楞图召，系准苏木寺，有一位沙卜隆和100多名喇嘛，五世呼毕勒罕（转世活佛）是宁僧扎布。位于现乌拉特中旗温根苏木。

阿日呼都格庙——系准苏木寺，有三位沙卜隆和70多名喇嘛。位于现乌拉特中旗桑根达来苏木。

塔本包古台庙——有一位沙卜隆和近10名喇嘛。位于中旗桑根达来苏木。

沙巴格庙——系东苏木寺，有一位沙卜隆和50多名喇嘛。位于中旗巴音苏木。

巴音宝日庙——有一位沙卜隆和近30名喇嘛。位于乌兰苏木巴音宝日嘎查。

恩格尔呼拉尔（诵经会）——有一位沙卜隆，位于温根苏木。

哈尔嘎那呼拉尔——位于乌兰苏木。

扎格呼拉尔——有一位沙卜隆。位于川井苏木。

道力奇庙——有一位沙卜隆，哈尔夫沙卜隆现在还在世。位于乌兰苏木。

呼和陶勒盖乌如格（没有什么庙，只利用蒙古包和房子集会念经，类似呼拉尔形式）——有一位沙卜隆。位于乌兰苏木。

宝日嘎苏台庙——有一位沙卜隆，位于乌兰苏木。

哈太庙——有近30名喇嘛和一位沙卜隆，曾有过千匹黑花马群的富庙，位于巴音哈太苏木。

东达宝力格庙——有一位沙卜隆，位于乌兰苏木。

扎嘎热格庙——有一位沙卜隆，位于乌兰苏木。

巴音查干呼拉尔——有一位沙卜隆，位于巴音杭盖苏木。

呼如木吐庙——有一位沙卜隆，位于温根苏

木。

乌力吉图庙——系高勒苏木庙。民国31年（1942）由于当时时局紧张，交通不便，旗扎萨克诺颜林沁僧格以自己杜嘎尔私庙为主体，合并13座寺庙与呼拉尔，在乌力吉吐兴建了寺庙群。根据地名命名为“乌力吉吐庙（也称作阿日昆都仑庙）”，有150名喇嘛，13个庙仓（喇嘛教内专管庶务的机构），是一座牲畜多富有的庙。

哈那图庙——系玛拉吐尔苏木庙，仅有六、七名喇嘛，位于乌拉特后旗宝音图苏木。

哈尔朝鲁庙——位于乌拉特后旗朝格温都尔苏木。

巴格毛都庙——位于乌拉特后旗宝音图苏木。

西拉呼拉尔庙——有一位沙卜隆，位于乌拉特后旗前德门苏木。

呼鲁斯太庙——有一位沙卜隆，位于中旗巴音杭盖苏木。

东升庙——位于后旗巴音宝力格镇所在地。

毛盖吐庙——有一位沙卜隆，位于包头市郊阿嘎如太苏木。

阿日伊博格勒庙——有十来名喇嘛和一位沙卜隆，位于温根苏木。

阿拉旦布苏庙——有十余名喇嘛和一位沙卜隆，位于温根苏木。

本巴吐庙——系乌布尔科尔沁苏木庙，有30来名喇嘛和一位沙卜隆，位于中旗呼鲁斯太苏木。

西巴尔太庙——系高勒苏木庙，有20来名喇嘛和一位沙卜隆，位于包头市郊阿嘎如太苏木。

宝日罕吐庙——位于新忽热苏木。

本巴查干高勒庙——位于后旗戈壁苏木。

扎嘎勒庙——有一位沙卜隆，位于后旗朝格温都尔苏木。

乌嘎拉吉庙——有一位沙卜隆，位于后旗巴音宝力格镇。

太阳庙——有一位沙卜隆，后旗那仁宝力格苏木。

查干和硕庙——系查干高勒庙附属庙，位于后旗朝格温都尔苏木。

达日哈庙——有一位沙卜隆，位于后旗巴音宝力格镇。

博克梯呼拉尔——位于后旗戈壁苏木。

格吉格呼拉尔——有一位沙卜隆，位于乌兰苏木。

博日和呼拉尔——位于后旗前德门苏木。

索伦恩格尔庙（呼拉尔）——有一位沙卜

隆，位于巴音苏木。

乌尔吐高勒庙——有一位沙卜隆和近三十名喇嘛，建于1804年，是阿鲁科尔沁苏木庙，位于现乌拉特前旗白彦花镇境内。

七、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

医学理论与医术传入乌拉特草原，治病的历史不过三百年。然而，随着喇嘛教的盛行和寺庙的兴建，一些大寺庙相继建起哲理寺、历法寺和藏医寺或学部。有了藏医学部之后，蒙古地区才开始有了关于医学理论学说，这便是医药事业的开始。当时，传授医学和从医人员基本上是寺庙中的喇嘛医生，而且不出庙宇。所以，牧区缺医少药，牧民群众有病想治疗也非常困难。旧社会，牧区蒙古族中性病蔓延，高达80%以上，天花也年复一年，严重威胁着人民群众的生命与健康，使蒙古族人口急剧下降。

那顺巴雅尔是乌拉特中公旗，蒙西医结合创建民办诊所，为牧民看病治病最早的一个医生。光绪33年（1907）阴历5月23日，那顺巴雅尔降生在乌拉特中公旗阿鲁科尔沁苏木布仁巴雅尔家，排行老三。那顺巴雅尔降生在人间不久，便被该苏木贫苦牧民阿木嘎萨德抱养过去。

民国8年（1919），那顺巴雅尔到乌拉特中

公旗阿鲁科尔沁苏木寺——乌尔吐高勒庙，拜吉仁太喇嘛为师，当了沙比（喇嘛徒弟）。该庙是由莫日根庙分支而建的有蒙经呼拉尔的庙。

民国23年（1934）拜乌尔吐高勒庙道尔吉门巴（藏语，医生）为师，当沙比。次年拜吉尔嘎郎吐庙著名蒙医僧格扎布为师，三年苦读四部医典，掌握了医学基础理论知识和治疗医术本领，从1938年开始了行医生涯。

1939年正月，那顺巴雅尔奉乌拉特中旗衙门之命，赴归绥蒙西医学校，寒窗苦读一年半，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学业。于民国29年（1940）他又被旗衙门招到川井，晋谒巴图必力格协理。协理说：“现在我们中公旗性病蔓延，出生率大幅度下降。与此同时，天花年年流行，严重威胁着儿童生命健康。今日招你来，让你以医生的身份在群众合作社工作，目的是为了治好这两种病魔。”接着，合作社负责人韩葆接待他说：“你是我旗唯一学过蒙西医的医生。我们把治好这两种疾病的希望寄托在你身上。关于购买药物和医疗器械的款项，全部由合作社承担支付。现给你一万元（伪蒙疆政府币），你跟送绒毛的骆驼队去包头，买什么药物和医疗用具，由你自己作主处理就是啦。”

随后，那顺巴雅尔与驼运队一起出发，从包

头买回来所需药物和医疗器械，独自一人在川井办起了民办医疗站。由于他对医道精益求精，行医严谨，刻苦学习和实践，在短短的时间内，医治了四、五百病人，其中多数病人得到痊愈或者有了明显的好转。

然而，乌拉特中公旗地域辽阔，居住又十分分散，且交通闭塞，分布在广袤草原上的病人，不可能短时间都得到治疗，有些病人虽然有幸得到一两次治疗，但也有反复的可能性。因此，一些外来江湖医生乘虚而入，打着为牧民治病的幌子，榨取牧民的钱财。他们用一瓶“606”（六零六）药，换取一匹马或一头牛。给儿童打一针天花疫苗就要一只羊。更可恶的是，有些江湖医生用假药骗取民财，草菅人命的事也时有发生。有些牧民请来喇嘛吉日特穆（喇嘛教跳大神的一种宗教活动），念古里穆（喇嘛教驱魔降灾等的一种宗教活动），除灾去邪，耗去大量钱财不说，又白白搭了自己宝贵的生命。面对这可恶的现实，那顺巴雅尔医生整天团团转，还是忙不过来，为了乡亲们的健康和幸福，他争得了巴图毕力格和韩葆等人的同意，于民国31年（1942年），从达拉特旗请来同窗好友太平宝，到川井民办医疗站坐堂看病，而他自己却云游草原，走家串户，送医到蒙古包为乡亲们治病。经过两年的努力，于民国33

年（1944年）遍及全旗的性病和天花，基本上得到了控制。同年秋天，傅作义部队突然袭击驻守在杭盖诺其、斯日奔朝合雅、乌力吉图等地的日本特务机关。因为当时兵荒马乱，太平宝也只好告别老同学返回达拉特旗了。那顺巴雅尔医生里外一人孤军作战，为家乡的父老兄弟去魔治病，奔波于以川井为轴心的远近浩特和乌苏之间。

1950年7月，乌拉特中旗人民政府在本巴吐乌兰敖包成立，那顺巴雅尔挑起了旗卫生科科长的重要重任，将川井医疗站迁到本巴吐庙。然后，他招集并邀请宁日格扎木苏、却扎木苏、嘎拉僧旦金等老蒙医，每个努图克（苏木）建立了一个医疗站。

1952年在海流图镇新盖了十二间主房，并成立了有四名医务人员的旗卫生院。1953年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绥远省政府派来了根治梅毒病的抗梅医疗队。那顺巴雅尔医生全力配合医疗队，彻底消灭了梅毒、性病和天花，为广大牧民的健康与幸福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八、迎接和平解放

民国37年（1948）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解放东北、华北之后，继续向西推进，包头和乌拉

特西公旗部分地区也得到了解放。曾在日伪时期任过乌兰察布盟副盟长、盟长、伪蒙古军第六师师长等要职的乌拉特中公旗扎萨克诺颜林沁僧格于1948年冬携带家眷和财产，以去塔尔寺朝拜为名西行，暂居阿拉善旗边界，次年春到达定远营，参与德穆楚克栋鲁普策划建立的西蒙自治政府的活动，并被任命为教育署署长。

林沁僧格次子乌拉特中公旗保安司令部少将司令雄诺东鲁布于1949年9月底伙同德穆楚克栋鲁普的爪牙阿拉坦敖其尔，照日格图王等人，说服其父林沁僧格一起投靠喀尔喀蒙古。然而林沁僧格说：“我不离开生我养我的故土——乌拉特草原”，拒绝儿子劝说。但是雄诺东鲁布却说：

“我宁愿去蒙古死，也不死在八路和汉人手中”，他遗弃了父老家乡，投奔喀尔喀去了。

扎萨克诺颜林沁僧格去阿拉善期间，乌拉特中公旗衙门的全部工作，由留在旗里的协理巴图毕力格、大队长兼群众生活合作社负责人韩宝二人负责，处理日常旗务。

民国38年（1949）1月，北平和平解放，内蒙古西部地区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3月，毛泽东主席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绥远和平解放的方式。人民解放军内蒙古骑兵第四师师长毕力格巴特尔、乌兰察布盟工作委

员委员会主任萨木腾等首长，分别给乌拉特三公旗衙门派人送来和平解放乌拉特三公旗有关事宜的亲笔手信。

民国38年阴历六月下旬，茂明安旗一位差夫给住在朱勒格台查干敖包的旗协理巴图毕力格家送来一封信函。巴协理打开信封一看，原来是驻乌兰察布盟四子王旗蒙四师毕力格巴特尔师长、盟工委主任萨木腾和副主任辛玉的来信。信的主要内容是：“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国民党八百万军队被人民解放军打得落花流水，不可抵挡，南京反动政府的灭亡也指日可待。实现全国解放，一个和平、民主、独立自由的新中国将要到来！这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必然趋势。现在，你们面临着两条道路：一条是起义投诚，迎接和平解放的道路，这是一条有利于你们个人和全旗的光明之路。选择这条路，我们表示热烈欢迎。另一条是继续追随德穆楚克栋鲁普一伙，坚持顽固的反动立场，与人民为敌的道路，这是一条黑暗而走向灭亡的路。何去何从，尽快抉择……你们如若愿意彻底摆脱国民党统治，迎接和平解放，就请速派要员进行谈判，共同协商有关成立新政府的事宜。”

巴图毕力格协理阅完信，认为这是关系到全

旗前途命运之大事。究竟作何决断，他绞尽脑汁，权衡利弊，得出走迎接和平解放之路，是上策的结论。然而，他苦于如此重大的事情，怎能一个人独断？！他冷静下来，便请来旗部队大队长、合作社负责人韩葆（当时同住在朱勒格台查干敖包）交换意见。韩葆看完来信便认真思考了一番。然后两人敞开心扉，进行讨论，决定按照来信的指导思想，迎接和平解放。巴图毕力格助理布置工作时说道：首先，不能耽误给解放军回信，迎接和平解放之大事。此事仅我们俩人决定欠妥，尽快召集全旗主要官员，在伊很查干召开会议，安排部署迎接和平解放的准备工作。派要员回信等事宜，由我本人具体负责实施。其二，同扎萨克诺颜林沁僧格协商并说服他尽早摆脱德穆楚克栋鲁普一伙，返回家园，同人民群众一起迎接和平解放。此事也由我亲自西行去完成。其三，你（指韩葆）的任务是，高度警惕匪徒之破坏和捣乱，为了保卫全旗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要特别加强治安保卫工作。同时还要搞好群众合作社工作，在安排好群众生活的同时，尽量多储备些粮食，为人民解放军的到来，做好一切准备。

阴历7月初，韩葆按已商定的原则和要求，到套内着手征购粮食。巴图毕力格助理动身到伊很查干庙，召集旗助理明安满达、梅林章京根登朝

克、扎兰章京查格德尔苏荣、那木吉勒斯仁、笔贴式巴德玛斯仁等公职官员，举行秘密会议。会上，巴图毕力格协理向大家介绍了国内革命战争的形势，讲清迎接和平解放与否的利弊关系，然后，大家在迎接和平解放这个问题上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巴图毕力格协理因为还要西行，在完成说服和邀请扎萨克诺颜林沁僧格回旗的任务后。就把给四子王旗回信的任务委托于明安满达协理去办。明安满达接受任务后，带上信顾不得回家，直接去找巴吐苏和、巴德玛斯仁，可是他们二人都一一谢绝，不愿东行送信。

当月中旬，巴图毕力格协理、孟格图斯日古楞等西行至巴勒阿古拉山，拜会了扎萨克诺颜林沁僧格。巴图毕力格协理和扎萨克诺颜林沁僧格俩人漫步到野外，协理向诺颜详细汇报了家乡的情况，也分析汇报了蒙四师、乌兰察布工委来信后的前后详细情况，并说服他早日回去。扎萨克诺颜表示完全赞同巴图毕力格协理的分析 and 忠告，在野外起草了复信，并指示苏德那木道布杰缮写后，抓紧时间送到驻在四子王旗衙门的萨木腾和辛玉首长手中。至于回旗的问题，林沁僧格诺颜还顾虑重重心有余悸，准备再观察一段时局的发展，并将旗军政事务全委托给巴图毕力格。苏德那木道布杰送信途中心生一计，到扎兰章京那木

吉拉斯仁家。告诉他说：扎萨克诺颜让你把这封信送到驻于四子王旗王府的蒙四师，说罢把信递到他手中。那木吉拉斯仁也对送这封信感到有些胆怯，遂找到巴图毕力格协理要求让别人送去。巴协理给他讲清这封信的重要意义，要求他为全旗人民的利益，不要错过机会去履行一个公职人员应尽的义务，说罢派差夫米楞和他同往。然而，那木吉拉斯仁知道不去不行，那么只好把一天的路程分作两天走，应付度日。

阴历八月初七，巴图毕力格协理叫来乌力吉吐庙旗衙门府上的色·陶格陶夫说：“让你去完成一件非常重要的任务，行吗？”可他并不清楚什么重要任务，便随口答应“可以”。于是，巴协理把详情如实告诉了他，又将蒙四师第三封来信给他看，并详细嘱咐他，如何送第三封回信，如何向蒙四师汇报，还给他介绍了全旗总情况。色·陶格陶夫拿好第三封回信，同苏木琿都敏珠尔和差夫达瓦东行，直奔四子王旗。

色·陶格陶夫一行三人，遵照巴图毕力格协理的嘱托，路经达尔罕贝勒旗朝德布仁梅林的家，问清去四子王旗王府的路，于8月11日安全到达目的地，受到了蒙四师师长毕力格巴特尔首长的热情接待。然后，他向首长递交信件，详细认真地汇报了全旗情况。这时，那木吉拉斯仁和米楞二

人也已经来了。

那木吉拉斯仁、色·陶格陶夫、敏珠尔、米楞、达瓦等到四子王旗王府不久，传来了绥远省和平解放的消息。他们同蒙四师师长毕力格巴特尔，乌兰察布工委萨木腾、辛玉，以及乌兰察布各旗代表和乌拉特西公旗起义投诚而去的贺太保、道尔吉色楞、陶格腾格日勒等一起，参加了庆祝绥远省和平解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会。接着，以乌拉特中公旗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乌兰察布盟人民政府成立筹备大会。

在这次会议上，协商确定了乌兰察布盟筹委会领导成员名单：蒙四师师长毕力格巴特尔任筹委会主任；萨木腾、林沁僧格任副主任，图布信任秘书长。

阴历十月中旬，各旗代表陆续返旗，蒙四师给每个人发了一套冬装，毕力格巴特尔师长还同30名官兵一起，将达尔罕贝勒和三公旗代表欢送到四子王旗乌兰额日格河，才同大家一一告别。回旗后，敏珠尔、米楞、达瓦三人各自回家，那木吉拉斯仁、色·陶格陶夫二人拜见巴图毕力格协理，向他汇报到达四子王旗的情况，并递交了会议文件和任命巴图毕力格协理为乌兰察布盟筹委会常务委员的委任书。

巴图毕力格协理听完那木吉拉斯仁、色·陶

格陶夫的汇报后，作了这样安排：为了热烈庆祝绥远省和平解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全面宣传贯彻四子王旗会议精神，提高群众的思想认识，坚决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做好全旗的治安保卫工作，发动群众，做好建立民主新政权的准备工作，决定于阴历11月中旬，在旗衙门所在地乌力吉图庙召开全旗冬季楚格拉(集会)，与会者有旗政军界官员、合作社负责人以及各寺庙大喇嘛、德木奇(喇嘛职位，负监督管理之责)、格斯贵(即掌堂师，是寺院的执法喇嘛，俗称铁棒喇嘛)。

与此同时，巴图毕力格协理委派那木吉拉斯仁、色·陶格陶夫二人西行，去拜会扎萨克诺颜林沁僧格，详细汇报东去四子王旗的所见所闻，将会议文件面交扎萨克诺颜本人，并尽最大努力说服动员他尽早返回旗衙门。当时，中公旗西部边陲德穆楚克栋鲁普匪徒经常骚扰，那木吉拉斯仁等人不愿在这种动乱情况下再去冒险。但在巴图毕力格协理的再三劝导下，终于接受了西行的任务。那木吉拉斯仁、色·陶格陶夫各带一支步枪，与四名神枪手一行六人，从西乌盖口出发，西行去拜会扎萨克诺颜。路途中他们回避匪徒，小心谨慎地打听诺颜的下落，后来听说诺颜在梅格吉木敖包西南大沙窝中扎营，于是他们等夜幕降临后，连夜去拜会诺颜大人。他们向诺颜详细

汇报了他们去四子王旗会见解放军和盟工委领导以及参加几个庆祝大会的盛况，并面交委任他为乌兰察布盟筹委会副主任的任命书和会议文件，转达了毕力格巴特尔师长对他的良好祝愿和问候，希望他能尽快到职工作。转达了巴图毕力格协理希望扎萨克诺颜能早日赶回来，亲自主持将要召开的全旗冬季楚格拉，部署旗务。林沁僧格扎萨克诺颜对那木吉拉斯仁、色·陶格陶夫等人表示感谢之后，说“当前我们居住的附近地区德穆楚克栋鲁普匪徒经常骚扰，加之正值冬季，我想明年开春以后回乌力吉图庙去。希望你们能宣传贯彻好会议精神，批驳各种谣言，保卫人民的安全，要认真开好冬季楚格拉。这些都拜托于你们各位和巴图毕力格协理了”。

扎萨克诺颜林沁僧格虽未回旗衙门，但清楚的表明了自己坚决拥护共产党的政策和家乡的和平解放，并把全部旗务托付于巴图毕力格协理。所以，巴图毕力格协理如期于阴历11月中旬，亲自主持召开了全旗冬季楚格拉。

出席这次楚格拉的有：管旗章京巴特尔，协理巴图毕力格，梅林章京根登朝克，扎兰章京那木吉拉斯仁、查格德尔斯楞，旗部队大队长韩宝，西队队长孟格图斯日古楞，中队队长塔苏斯日古楞，东队队长扎拉桑，旗群众生活合作社秘

书苏德那木，六个苏木章京、琿都，旗部分寺庙首席大喇嘛，以及旗衙门秘书、衙役、差役和部分牧民。

这次楚格拉完成和实现了如下几件大事：

1、向大家通报和传达了9月19日绥远省起义和平解放，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盛况，并举行了隆重庆祝大会。

2、正式传达并宣布了巴图毕力格、韩宝二人收到人民解放军蒙四师、乌兰察布盟工委的来信，与旗府诸官员多次商量，先后委派那木吉拉斯仁、色·陶格陶夫、敏珠尔、米楞、达瓦五人赴四子王旗王府，与蒙四师取得联系，并出席会议讨论协商，迎接和平解放等事宜。

3、向与会各界人士通报了乌兰察布盟各旗代表欢聚四子王府，商定和平起义协议，成立了乌兰察布盟筹委会情况，传达了会议文件和宣传提纲。

4、在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支持人民解放军蒙四师，批驳敌人的谣言，围歼土匪，保卫家乡安全，保证牧民安全生产等方面，作了具体的部署。

5、扎萨克诺颜虽然至今未归，目前暂住旗西部边境，明年春暖花开之时就要返回旗衙门。因此，广泛宣传、动员隐居偏僻边境地区的牧

户，争取早日迁回家园，以安定民心。

6、广泛深入地宣传了从扎萨克诺颜至大小官员，任何人不得再利用职权搜刮民脂民膏。人民获解放，人人都平等。各级官员不得戴翎顶帽子。寺庙不许举行大型行善积德活动，接收献物。

7、旗衙门、苏木、部队及学校的公共财物均不得破坏，必须认真加以保护。群众生活合作社负责人一如既往，做好生意，搞好服务，清帐点库，不得有误。

这次楚格拉，在乌拉特中公旗历史上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转折性集会，它标志着草原人民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获得新生，当家做主人，走向繁荣昌盛的幸福之路的开始。

是年12月，绥远省人民政府、绥远省军区和乌兰察布盟工作委员会发出联合通知，邀请乌兰察布各旗政、军界主要负责人、赴归绥市参观学习。乌拉特中公旗协理巴图毕力格、团长朝鲁二人赴省府，向毕力格巴特尔、萨木腾、图布信等首长，汇报了中公旗工作，同来自兄弟旗的代表们一起出席会议，共同协商如何和平解放旗乡的有关事宜。

1950年阴历4月，人民解放军骑兵蒙四师两个团奉命，开赴中公旗部北、石哈河、余太、

苏哈古勒、乌兰道布等地，围歼土匪特务，打击一切反革命破坏活动，有力地保卫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和生产建设事业。

1950年7月，乌兰察布盟派来了以图布信同志为首的李克森布、策仁敖道、孟和、莫力特、马双喜、白顺、大宝、铁旦九人组成的工作队。工作队首先接管了中公旗旧衙门的军、政、经济、文化、宗教等部门的权力，接着广泛动员、组织群众，提高其觉悟，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拥护新政权的宣传教育活动。

7月18日，人们盼望已久的人民新政府在本巴吐乌兰敖包正式宣告成立。为了使人民政府成立大会开得隆重而热烈，全旗人民代表大会和那达慕大会同时进行。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旗、苏木两级人民政府主要成员。

旗长：明安满达

副旗长：图布信（盟里任命的干部）

旗政府下设四科一室，均在蒙古包或帐篷内办公。

财政科长：韩葆

卫生科长：那顺巴雅尔（医生）

教育科长：齐木格道尔吉

建设科长：巴拉登

秘书室主任：那木吉拉斯仁

旗公安部队设两个支队

第一支队队长：塔苏斯日古楞

政治指导员：策仁敖道

第二支队队长：朝鲁。该队系蒙四师建制。

旗政府下有四个努图克（苏木、区）

第一（巴音温都尔）努图克长：查格都尔斯

楞

副努图克长：达宝（盟里任命干部）

第二（德尔森淖尔）努图克长：那顺巴图

副努图克长：孟和（盟里任命干部）

第三（沙巴格）努图克长：宝音贺希格

副努图克长：莫力特（盟里任命干部）

第四（台梁）努图克长：李克森布（盟里任命干部）

副努图克长：宗格来、阎文凯

努图克下设若干个嘎查，在努图克领导下开展工作。

这次人代会和那达慕大会有一千多人参加。新生的人民政府利用这一大好时机，广泛宣传了党在牧区的“不分、不斗、不划阶级”、“牧工牧主”两利政策，组织动员群众开展围歼匪徒，维护社会治安，以及群众性打狼，发展畜牧业，宗教信仰自由，喇嘛可以还俗娶家室，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党的方针、政策。从此，乌拉特

中公旗彻底结束了三百年封建统治的历史，走向了人民当家作主，安居乐业，建设新生活的社会主义的光明之路。

1951年夏，财政科长韩葆负责在海流图河畔开始了土木工程，盖起了31间土木结构的办公室。9月，旗政府迁居海流图至今，如今的海流图已经发展成为欣欣向荣的草原新镇。

乌拉特西公旗的兴衰和变迁

恩克巴雅尔

笔者过去曾有机会翻阅旧旗衙门所藏《旗府档案》、《官吏档案》和《贵族家谱》（也称红格子档案）等历史资料。现根据自己的记忆，并对照乌拉特民间传说、风俗习惯、谚语民歌等作为引证，分段概述乌拉特西公旗的起源及其兴衰演变过程。有不妥之处，恳请指正。

一、乌拉特西公旗的起源

1、历史上的乌拉特三公旗，是指乌拉特西公旗、乌拉特中公旗、乌拉特东公旗等三个旗。其中之一乌拉特西公旗（即现在的乌拉特前旗）是清朝赏赐给乌拉特鄂班部的领地。顺治年间，乌拉特部首领鄂班三兄弟奉命率其部族，从原籍呼伦贝尔出发，协助朝廷西征，屡建战功，朝廷为奖励他们的功绩，特封三兄弟为公爵，赐牧地于河套。从此乌拉特人世世代代在此居住下来。

三公旗按所处地理位置分东西中三个旗，均隶属乌兰察布盟会管辖。俗称乌兰察布为三公

六旗盟会。其中除乌拉特三公旗外，还包括四子王旗、达尔罕贝勒旗和茂明安旗。

三公旗领地大体上东至达尔罕、茂明安和土默特三旗的查干敖宝；南与鄂尔多斯的达拉特、杭锦二旗隔河相望，西同阿拉善（现阿左旗）毗连；北与喀尔喀（外蒙古）相接壤。

三公旗首领系本家兄弟，故东西中三旗之间历来没有明确划分旗界，世代和睦相处。西公旗始由鄂班掌管，受封镇国公，世袭扎萨克，其统治延续十四、五代，三百余年。

究乌拉特部原籍和祖先，笔者过去所看到的本旗贵族家谱都是从成吉思汗铁木真二弟哈萨尔开始记载，习惯上凡是太吉出身的人年满十八岁都记入家谱。另外，也可以从乌拉特民间历来每逢喜庆佳节必唱的古老民歌歌词中找到佐证。如广泛流传的《三福之歌》中有这样一段歌词：

“要说我们的祖籍哟，就是呼伦贝尔；要说我们的祖先哟，就是宝尔海扎萨克；我们的家乡啊，就在脚下。我们都是哈布图哈萨尔后代。”因此可以断定，乌拉特人的原籍是呼伦贝尔，他们是哈萨尔的后代。

2、自然经济概貌

乌拉特西公旗的经济自然条件，不仅在三公旗中，而且在全盟会里也是得天独厚，非常优

越。境内逶迤起伏的阴山山脉象一道天然屏障向东西延伸。山前的黄河、三湖河、乌加河和乌梁素海等河流水域，是水草丰美的天然草场。自古以来就有“以垛量草，以坡量畜”的赞誉。在乌拉特草原居住的牧民，很早就改变了逐水草而游牧的习俗，逐步定居放牧，并兼农田耕作。旗内水陆交通方便，利于发展农牧副业，牧民多养白山羊，兼搞手工艺品制作。他们多数沿黄河北岸，依阴山南麓居住，不少手艺人就地取材大量制作蒙古包哈那、顶子、马鞍、套马杆等民族用品，除了自给自足外还向邻地出售，以贴补生计。所以这里的牧民生活较为富裕。

3、旗政体系

清朝规定旗里设世袭镇国公扎萨克一人，他是本旗最高执政者。

设图斯拉其即左右协理二人，协理一般从贵族太吉中选任。协理平时主要协助扎萨克理政。如遇扎萨克空缺，即代掌扎萨克大印，总理全旗政务。

设旗扎赫日其即总管一人。选任总管不分贵族贫民，主要视其能力选派。他们主要职责是掌管全旗财政。

设梅林章京二人。每个梅林章京分管六个苏木。

设甲喇章京（参领）三人，各管四个苏木。

设将军扎赫日其一人，掌管刑法武装。

设公中达木勒一人，专管垦务农作。

设旗府达木勒一人，执掌旗衙门公职人员的管理和物资供给。

设苏木章京（佐领）十二人，各掌管一个苏木。每个苏木还配一名坤都（骁骑校）和一名布什各（领催）。

各苏木都设一名族长，专管本苏木贵族太吉家谱（即红格子档案）。

此外镇国公扎萨克及其直系亲属居住的公爷府还另派宝依达、达木勒、德木其、尼日卜等大小管家若干人，专管公府日常衣食住行。这部分人虽不插手旗政，但在社会上也有其一定地位。

官吏服饰顶戴

镇国公扎萨克贝子，身着公爵蟒袍补服，胸挂朝珠，头戴紫红色顶戴和三眼花翎。平时进出都有大小官员、使臣、侍役分左右两翼成双成对地前呼后拥。

扎萨克福晋及其子女每遇官场均着各色绸缎长袍短褂，头戴各种贵重首饰和红色顶戴及花翎。

协理身着长袍，头戴红色顶戴及花翎。其他章京、梅林、甲喇等均着短服，头戴红色顶戴。

贵族太吉头戴世袭相传的蓝色顶戴（三等台吉浅蓝色顶戴，四等台吉深蓝色顶戴）。台吉一般年满十八岁即可戴顶戴，但必须经向扎萨克诺颜跪拜认可。

苏木坤都（骁骑校），头戴铜顶戴，宝什各（领催）戴无顶戴尖顶帽。

此外扎萨克诺颜还对其随身侍从和年迈老臣授封各种名誉职务和谥号。一般对年轻人授予赫雅（侍卫）职，赏白色顶戴黑色翎，对壮年人授予哈旺（官爵）位，赏蓝顶戴黑色翎。赫雅和哈旺一般都在御前侍应。对老臣们通常分别授甲喇，赏白色顶戴；梅林，浅蓝色顶戴；扎赫日其，红珊瑚顶戴。对已离职老臣们则授封诸如庆昭日格特巴秃儿等，意即忠义节士等谥号。

旗扎萨克每年春秋召开两次大会，春季大会，亦称启印大会。会上主要进行开启上一年封存旗政大印仪式。并总结上一年度工作，对有功者晋级封爵，有时还赦免罪犯等。秋季大会则主要研讨统计、征税等财政问题，同时审理案犯，所以秋季大会一般延续时间较长，有时需要四五十天。

旗扎萨克大印是权力的象征。故历来对扎萨克大印非常珍重，平时由旗衙门严加保管，香火不断。只有旗里向上奏册或邻旗间行文时才动

用，且须由扎萨克诺颜亲自加盖，而本旗范围内行文一般不动用。旗扎萨克大印清朝时颁发的有玉石刻制的，也有过银制大印，而明朝时颁发的则是铜制大印。

4、旗府衙门体制及其部分礼仪

旗衙门既是扎萨克诺颜办理公务之所，也是全旗最高学府。公职人员，包括笔贴其（秘书）们一年四季轮换执勤，每班有一名总管、一名侍役、一名笔贴其长和秘书，见习秘书若干名。这些公务人员不发薪水，且所使用的毛笔也要自备。笔贴其一般先由各苏木选送有一定文化基础的青年人到旗衙门见习三、五年后才升任秘书。见习期首先从顶礼膜拜、点蜡烧香祭祀佛堂等入手，一一学习公府礼仪。然后才着手学习裁纸、折纸、打格、洗砚、磨墨和清理卷档、处理公文等。整个侍班期间对他们要求非常严厉。如稍有差错，轻者训斥责骂、重则打耳光抽鞭子。这些虽属封建八股教育，但在当时条件下却是培养青年知识分子的唯一途径。

扎萨克衙门对各种罪犯的审理和治罪有一定的规矩。审判罪犯一般都在夜晚灯下进行。每遇审判案犯，公府当班的上至大小官吏、下至伙夫、侍役均整装侍班，审问时要动用各种刑具，诸如鞭打、压杠、跪碎石等，直至罪犯招供认

罪，然后视其所犯罪行分别判处。重者有的被判，带七、八十斤重的铁链或木刑架游浩特、畜群几个月乃至几年不等。

旗衙门有两件旗徽常年祭奠：一是用满文刻制的孔夫子木质牌位；一是鄂班率骑建功立业时所用过的黑色旗帜。

5、文化教育概况

封建时期西公旗亦同其他地区一样，以孔孟之道所宣扬的“忠孝节义”为各种文化教育的指导思想。文化教育主要以梅力根活佛著作和鄂班公时期传下来的各种戒律为教材，教学蒙、满、汉、藏等文字。当时有条件的人请私塾先生教授子弟，而一般人家都是将儿童先送寺庙当班丁，念经学文打基础，然后才有机会被选入旗衙门当见习服役。其中学业出众的少数人时有被保送到西藏、印度等地深造。故西公旗历史上曾涌现了一批文人墨客。如该旗梅力更庙的梅力更活佛就是突出的一例，他精通蒙、藏、印度语言文字，一生用蒙古语文编译了大量佛教经典。在他的影响下当时西公旗所有大小寺庙都用蒙古语文诵经做佛事。此外梅力更活佛所著各种诗歌、赞词至今在乌拉特地区广为流传，影响极广。除梅力更活佛外本旗平民中由于学业突出而官至管旗章京的人有道卜登、阿尤喜以及“红党”恩克巴雅尔

等。

旧时教学蒙文，对初学者以蒙文字母顺序编成押韵“三字经”教学。这样既方便了学童记忆，也传授了带有一定政治色彩的封建思想。进而直接以孔孟之道“四书”、“五经”为教材培养其所需人才。据笔者记忆，在西公旗接受这种封建文化教育成才；先后在旗衙门供过要职的人有：宝音陶克特、朝伦巴特尔、图布登、仁沁巴拉、斯仁朋斯克、瓦其尔巴图等；还有接受这种教育并从旧社会过渡到新社会参加革命工作，任过县团以上职务的人有：梅力更活佛、劳布僧丹必、扎拉僧、额日和道尔吉（曾任旗人民政府副主席）、焦太宝（曾任乌兰察布盟宾馆经理）。

乌拉特三公旗小学是二十年代开始筹建，后来发展成新式小学的。先后从该校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并任过县团以上职务的西公旗知名人士有：胡日沁毕力格（曾任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卫生厅厅长，已故）、笋布尔巴图（曾任乌盟文教局副局长）、郝米吉德（曾任阿拉善左旗政协副主席）、文格扎布（现任巴盟检察院检察长）、拉麻扎布（乌前旗政协副主席、区政协委员）、恩克巴依尔（阿盟文化局长、政协委员）、乌日娜（阿拉善右旗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巴图巴雅尔（乌前旗政协主席）、敖特根（自治区语委办公

室副主任)、道尔吉仁钦(乌前旗纪委书记)等。

解放后大学毕业并参加工作现任县团以上职务的青中年干部有:巴盟畜牧处处长额日和巴图,阿盟党校副校长图门乌力吉,内蒙师大教授那仁巴图,四子王旗党委副书记巴图特布新等人。

6、宗教信仰

乌拉特西公旗历史上曾有过24座佛教寺庙。其中八座是清朝时建造的旗庙——梅力更庙(广宋寺),是各寺庙中地位最高的宗教中心。该庙活佛劳布僧丹必扎拉僧被拥为全旗宗教界首领。其地位同旗扎萨克诺颜并驾齐驱。他具有任免全旗各寺庙上层喇嘛和处罚宗教界各种罪犯的权力。

当时梅力更庙内有七名沙佰楞(主持),每个沙佰楞都有自己一定规模的殿堂、吉沙(招待所)和众多施主。

历代梅力更活佛都潜心于蒙藏两种语言文字的深造,致力用蒙文蒙语诵经做佛事。从事了大量藏经的蒙译工作。当时西公旗所有寺庙的一切佛事普遍用蒙文蒙语进行。这无疑对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此外梅力更活佛还有许多诗歌、赞词等著作至今在民间广为流传。其中的《乌生宝力格》、《乌云图力呼日》

等短句诗词是当时学龄儿童学文化的基本教材。他创作的捻珠经——《玛尼·米格吉米》是信佛蒙民家家户户每日早晚捻珠供佛时必须颂之经典。还有他所著《八十一首诗词》中的《永恒之福》、《缔造之福》、《先辈之祝福》等三福之歌，尽管歌词寓意深奥，乌拉特蒙民男女老少皆会演唱，而且成为朝野上下每遇喜庆、宴乐必须首先演唱的主题歌。他的大量著作虽然竭力宣扬宗教迷信和封建思想，但也有启发诱导人们扶正压邪、奋发向上的一面。因此历代梅力更活佛在乌拉特蒙民中的思想渗透是很深的。特别是末代梅力更活佛劳布僧丹必扎拉僧本人思想比较开明。他曾支持过一些进步事业。如一九二四年筹建的乌拉特三公旗第一所全日制小学就设立在他的寺庙里。还有一九二八年“红党”恩克巴雅尔组建革命武装时，他主动输送了一批青年喇嘛应召入伍。到一九四九年乌拉特西公旗和平解放时，他也积极接受和平解放的主张，拥护我党各项方针政策，走上了革命道路。解放后他曾任自治区宗教协会主任之职，后来在“文革”中受“四人帮”迫害而去世。纵观他的一生，他不仅对传播和保留乌拉特历史上的文化遗产付出了毕生的精力，而且对本旗近代革命事业也有一定贡献。所以他应该是乌拉特西公旗一个应予肯定的历史人物。

7、几种传统风俗

乌拉特民间有很多独特的风俗习惯。其中值得记述的有以下几种：

①乌日斯因乃日——是每年秋季举行的全旗性秋收节。每逢这一传统节日，全旗上下都赶着牛羊马群聚集在一起，举行各种民族娱乐活动。节日期间最引人入胜的活动之一算是娱乐与生产相结合的骑士套马表演。这项活动一开始，各个骑手都手提用各种饮食调制而成的“圣水”，跨上心爱的骏马，争相向畜群泼洒“圣水”，祝愿五畜兴旺。然后进行紧张激烈的套马表演，同时进行各类牲畜的阉割、烙印、打鬃、分群等生产活动。

②制毡子——历来草原牧民聚众自制毡子。这实际是牧民群众以互助合作的形式进行的集体生产活动。也是一年一度牧民群众的隆重聚会。每到盛夏季节，各家牧民剪毛抓绒之后，都相约在一起，到广阔平坦的草地上铺好若大的旧毡子，众人动手在旧毡子上面一层又一层均匀地铺上事先梳好的羊毛，一遍又一遍洒水拍打压实，然后将旧毡子连同新铺好的羊毛一起卷紧，用多道绳索捆紧，两端各套上若干匹生格子马，众人使劲吆喝着，让两边的马匹向相反的方向一紧一松地拉拽。这样一整块一整块的围蒙古包的大毡子就

在欢乐的集体劳动中擀制出来了。这种集体生产活动在过去的草原牧民是一大盛事。

③妇女服饰——西公旗妇女首饰和服装在某种程度上与东中两旗还有所区别。西公旗女孩满八岁就穿耳垂带耳环，到十八岁就蓄左右两条辫子、套发网。新婚妇女要佩戴金银珠宝镶制的钗、簪、发网、耳环、耳坠等全套首饰，穿着用色彩鲜艳的绸缎缝制成的长袍短袄。已婚妇女一般年过三十后就逐步减去所佩戴首饰，到五、六十岁以后基本上不戴什么首饰，有的甚至削发受戒为尼姑。

④殡葬习俗——从鄂班时代起，西公旗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贫民百姓，都用立式木棺或卧式木棺进行土葬。用立式木棺安葬者尸体都以坐式入殓，用柏木枝叶填满空隙以支撑尸体不致倾倒，同时能起一定防腐作用。当然出葬规模的大小，随葬物品的多少，以及所用棺木的质地都视死者生前贫富贵贱而有所不同。

鄂班公墓地地位于阴山南坡，好业扎那套勒盖脚下。鄂班以后的所有本旗公爷扎萨克均葬于本垦布朗、敖楞道卜两地，并且都垒有石堆为记。

⑤婚礼——西公旗婚礼习惯上不分上下，凡遇嫁娶婚事，双方都出首席、代东、伴郎、伴娘、歌手、守佛喇嘛等若干人。其中男方的首席代东掌

管整个婚礼过程中的各种宴请活动；女方首席（一般均由长辈妇女担任）负责新郎新娘的着装打扮和各种司仪事项；代东必须是由能说会道善于辞令的人来担任。他的主要职责是在婚礼进行的各种场面致祝词、唱赞歌；歌手一般安排二人以上，他（她）们在婚礼中的每个大小宴请活动中自始至终献歌助兴，歌曲往往以《三福之歌》开头，连续演唱梅力根活佛所著八十一首歌曲。

婚宴上的主道菜是放乌查，也称放羊背子。放乌查时把宰杀的绵羊脖颈、胸脯和小排骨取下另煮外，其余头背尾必须整块煮熟。上席前先取其头尾祭奠佛龛，大家享用羊背子。至于另煮的胸脯是专供新娘吃的。除此而外在婚礼上还要用大量的砖茶、糕点以及哈达等礼品。

值得一提的是西公旗人历来喜爱骏马和马俱，因此娶亲新郎的坐骑及全套马俱是非常讲究的。

以上概述了乌拉特西公旗在历史上的政治经济体制和部分生活习俗。这些仅是笔者所忆述的历史遗迹。当然这些都有其自然发生、发展和消失的过程。

二、乌拉特西公旗封建制度的解体

自鄂班公起延续三百多年，世袭十四、五代

的西公旗公爵扎萨克，到本世纪初开始衰败，直至一九四九年随着全国的解放，其封建体制也彻底消亡。现简述其主要事件如下：

1、到本世纪初，随着满清封建王朝的衰败，各蒙旗王公体制也受到了猛烈的冲击。当时西公旗扎萨克公爷贺希格德力格尔同样在政治上腐败堕落，积怨甚多，特别是因自己一生无子，为后嗣继位之事非常苦恼。临终时留下遗嘱要从两名侄子（一是石拉布多尔吉、一是巴布多尔吉）中选一人继位。后来在选择谁来继位的问题上，贺王遗孀诺尔晋杭来伙同协理额日和道尔吉等反对石王叔父公庙大喇嘛依希达格敦立巴布多尔吉的主张，极力推崇石拉布多尔吉（喇嘛）还俗继位。这一争夺几经周折，最终诺尔晋杭来一派得势，由石拉布多尔吉继位。其结果家族内部矛盾加剧，同时也加速了这一统治体制的灭亡。当时有几件较突出的事：一是早在本世纪初贺王执政时期，为满足其腐化贪婪的生活，不顾平民百姓的反对，把本旗沿黄河北岸塘金毛都、塔本卜楞、达卜斯太、参布、苏木图、杭盖、毛林套勒盖等大批草场放租开垦，激起了牧民群众的强烈反抗，到处掀起了为维护牧场为目的的牧民联名上告抗垦——即独贵龙运动；二是贺王及其福晋对其下属的欺压引起了上下公愤，特别是王府对其

使女陶迪的百般欺辱，激起当时扎赫日其阿尤喜的义愤，为此事阿直接到盟会上告过扎萨克及其福晋，一度全旗上下舆论哗然；三是旗笔贴其长恩克巴雅尔所发动的“红党”——革命活动，从根本上动摇了这一统治阶层的基础。

贺希格德力格尔公爷正是在这种动荡不安的时期寿终正寝的。

2、石拉布多尔吉继位。对石拉布多尔吉的还俗继位问题，其叔父公庙大喇嘛依希达格敦率先发难，先后到盟会和省府告状，经过八年时间的内讧，最后才确定下来。

石继位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选美娶妻。他先后娶了四个福晋，原配孟根其其格（达拉特旗人），二福晋花儿（亦达拉特人），三福晋色普勒玛（即奇俊峰，阿拉善人），四福晋奈曼斤（本旗人）。其中只有色普勒玛福晋在石去世后生过一个儿子，活了十一个年头，母子二人遇害身亡。从此西公旗扎萨克公绝后。石王继位后搞的第二件事是大兴土木，重整公府，营建冬营夏盘等。此外他在位期间采纳辅佐官臣的建议，兴办了全旗第一座新式小学，培养了一批有文化知识的人。

石王在位时期的协理有额日和道尔吉、巴图巴雅尔，扎赫日其是芒海；梅林有宝音陶克套、

苏德那木；甲喇有色林宝、敖特根、仁钦巴拉等。

3、恩和巴雅尔领导的革命斗争。恩和巴雅尔从二十年代起就同外蒙革命党人有联系，因此人称“红党”恩和巴雅尔。到一九二八年恩又从蒙方弄来一批枪支弹药，在西公旗创建了革命武装队伍，这支队伍中有蒙汉族青年和年轻喇嘛。据我所知，当时参加这支队伍的人里有梅力更庙喇嘛嘎鲁、敖特很查干、曼头、芒汉等，还有乌日图高勒庙沙布楞喇嘛、劳布生丹、毕扎拉僧和保日、敖特很、恩克那生等人。这些人撤到外蒙后，在解放初期与家人经常通信，其中保日、敖特很查干等人五十年代末还曾回国探亲。

恩和巴雅尔系西公旗伊和阿拉塔沁苏木人。其父四等太吉巴拉道尔吉，生母宝迪苏瓦，继母莲花。恩弟兄姐妹七人。恩的发妻米德格玛生有一子，名叫斯仁敖日布。恩本人自小聪明好学，他是旗府衙门历史上最年轻的一名笔贴其长。他也是三公旗第一座全日制小学校创始人之一，并且亲自担任过蒙古语文教员。

恩和巴雅尔确系在西公旗乃至整个西部地区盟会封建上层人物中接受新思想新文化觉醒最早的革命者，他是组织几十人的武装队伍，同封建

统治阶级进行殊死斗争的革命先驱。遗憾的是他的英勇斗争在封建统治阶级的强大压力下，在一次战略撤退中，在英格林庙遭敌人袭击，壮烈牺牲。

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为真理为革命奋斗的壮志被充分肯定是理所当然的。他的革命活动有力地打击了西公旗封建统治阶级，唤醒了人民大众。

4、花儿福晋事件。三十年代中期石王继位后，王公贵族和宗教上层之间的内讧有所收敛，一度出现过二三年的平静局面。当时扎萨克石王和协理额日和道尔吉两大家族都把府邸建在东达高勒，两家夏盘也都在黄河北岸相隔不远。因此两家日常来往较多。其间二福晋花儿同协理额日和道尔吉的儿子曼头（当时任旗卫队长）在接触中产生暧昧关系，被上告到旗府衙门。旗府当班官梅林章京宝音陶克套得知此事，急忙向协理额日和道尔吉报告，并征求他对此事处理意见。额自恃位高权重和为石继位出过力，有意袒护其子，没有认真对待此事。石王回府，得知此事后怒气冲天，将花儿以及其他侍役家奴逐个鞭打罚跪。德高望重的梅林章京京宝也束手无策，无从调解。从此石王和额协理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起初额料到形势对他不利，逃离本旗，躲避到杭锦

旗都木其格家里后又投奔德穆楚格东日布部。其间石王又同其叔父依希达格丹大喇嘛产生矛盾，最后也分道扬镳。依投奔德穆楚格东日布，石投靠包头城防司令王靖国。双方从矛盾对立，争权夺利，发展到调兵遣将互相残杀的程度。最后石王依靠王靖国得胜，依希达格丹战败老少三代丧命。

5、花儿福晋自杀事件及其原因。由于花儿福晋一时的过失，引发了全旗上层内部早已潜伏的矛盾，以至挑起战争相互残杀，最后虽以石王的军马胜利而告终，但却使不少人家破人亡，花儿福晋对此陷入了无限的自责和内疚，而不能自拔。到37年夏花儿福晋在包头自杀身亡。因为石王几个福晋中最受宠的是花儿福晋，所以这一事件对石王来说也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花儿福晋自杀原因主要有三：一是由于她引起内讧全旗上下怨声载道，民间广泛流传的各种歌谣直接抨击她的过失；二是当时报刊舆论大量报道她的风流事件；三是由于她的过失，额协理全家包括曼头、巴雅尔图、敖特很查干弟兄三人和依希达格丹叔侄全家遇难。所有这些大大刺激了她的神经，最终只能一死了事。

6、石拉布多尔吉公爷去世。石王于37年秋在其三湖河畔夏盘上因病去世。他患病去世的

主要原因，首先是由于花儿福晋事件引起的内部互相残杀，使全旗各项事业受到了严重破坏，民不聊生，群众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并且外债累累，他殫精竭力也无法挽回这一混乱局面；其次他虽以武力镇压敌对势力取得胜局，但他最宠爱的花儿福晋也因之突然自杀，使他在精神上受到极大刺激；三是他虽然先后娶了四房福晋，但始终没有嗣子，这也是他的心病之一；四是惊吓所致，石王怀着重重心事刚从包头返回府上，就有巴特儿、巴图乌力言等两名参加攻打公庙战斗的军士将依希达格丹的头颅割下当面献给石王邀功，面对血淋淋的人头，石王惊恐万分，病情更加恶化。

在石王病重期间，其三福晋色普勒玛从娘家回到石王身边侍护，不断请医诊治，并请喇嘛念经做佛事，送“单鲁格”（替死鬼），均不见效，最终还是呜呼哀哉。

因大福晋蒙根其其格，早已去世，二福晋花儿自杀身亡，故石王后事的处理重任自然落到三福晋色普勒玛及当时的协理色德日扎布、色林宝、扎赫日其芒海、梅林斯日古楞、明珠、甲喇官其格巴斯尔、查格都日斯仁、朝格德力格尔等人身上。因此由色普勒玛为首的这些官吏按乌拉特风俗操办了石王的后事，并由色代理

旗政。

7、关于色普勒玛福晋身孕及其出走。石王去世后不久宣布色福晋已有身孕。临产前移住包头，由旗协理色林宝夫人满都日娃守护。但此事由于宫廷内部夺权斗争的影响，对色福晋身孕一事流言四起，有的说老福晋诺日晋杭来亲眼看见色福晋用棉花缠了腰伪装怀孕。有的说色福晋根本没有生孩子，是抚养了包头一个豆腐房姓田的幼子等等。

正当流言盛行，西公旗扎萨克继位问题悬而未决之际，1939年秋日寇进犯阴山地区，遣日伪蒙政会德穆楚格东日布部和绥西联军骑兵部队中滩和西山咀一带休整，致使阴山南北广大地区受到骚扰和涂炭。德王伪蒙政会派遣的一个骑兵团由团长白某率领进驻乌拉山以南的升恒号一带，其主要任务是监视和控制西公旗。白不仅以重兵压境，还以淫威要挟色福晋，引起色的警惕，毅然带领部分人马赴陕坝投奔傅作义将军，参加了抗日阵线。从此色得到国民党南京政府的重视，被蒋介石接见。使其幼子阿拉坦敖其尔继扎萨克之位，色被授予中将军衔，直到45年日寇投降后回旗执政。

8、伪西公旗的建立和阿木尔萨那执政。日寇入侵套区后，伪乌盟盟政会设于固阳县城。当

时乌兰察布盟政会工作由中公旗公爷仁钦僧格任盟长，达尔罕贝勒旗贝子沙拉布道尔吉任副盟长，日常工作由莫日根巴特尔（包道新）、布仁巴雅尔、管其格、乌恩、阿木拉等人任厅局长，并从各旗府抽调若干名工作人员，其中西公旗先后选送焦太宝、恩和巴雅尔、拉麻扎布、宝日朝鲁、大宝日朝鲁、陶德格日勒等人。

伪西公旗以额日和道尔吉代理扎萨克，旗府设于包头，将原旗协理色德日扎布、色林宝、梅林章京斯日古楞、甲喇章京贡其格巴斯尔等人放逐到锡林郭勒盟会阿巴嘎旗（色德日扎布、贡其格巴斯尔二人在放逐期间去世，其余二人后虽返乡，但不久亦都去世）。阿木尔萨那执政后，委额日和道尔吉、笋布尔巴图二人为左右协理，恩和巴雅尔为管旗章京，焦太宝、官其格色楞为梅林，额敦贺希格、仁钦东日布、那生巴特尔等人为甲喇，组成了流亡政府。起初所有受委政府官员均同难民一样靠日寇救济过日子。直到1940年秋伪旗府才迁到白彦花（即哈拉盖），通过日方同西北联军谈判，以包兰公路为界，仅划出原西公旗一半地区归伪旗府管辖。其中被称做旗政治经济活动中心的中滩地区又全被驻军占据，所以伪旗政府实际管辖地区所剩无几。但他们苟延残喘，为扎萨克大权继位问题又演出了一场丑剧。

当时伪职人员考虑到，一是要按旧制王公继位不能长期空缺；二是不承认色福晋所生儿子阿拉坦敖其尔是石王的亲子；三是在日寇的怂恿下有人曾图谋吞并西公旗。这些伪职人员煞费苦心从乌拉特王公贵族族谱中，找出了王室近亲三人，其中最近的一位是桑布诺颜，但因其年迈体弱没被选中。其次是额尔敦贺希格，也因年老且无嗣子被淘汰。最后选中年幼的阿木尔萨那，经上报批准后于1941年继任西公旗扎萨克。

阿木尔萨那继位后实际没什么作为，他一度除对伪旗府协理、梅林、章京、甲喇等旧体制予以保留外，准备改变供职人员轮班制，计划设立三个工作机构，实行固定供职制。但因这些供职人员的薪水无有出处最终没能实施。

9、色福晋扶助幼年阿拉坦敖其尔执政。1945年秋抗日战争胜利后，福晋司令色普勒玛携幼年扎萨克阿拉坦敖其尔回旗前夕，先派其手下任职的团、连长陶克特巴图（赫游龙）、贺希太平、额日和睦巴依尔等到白彦花接管伪政府，并负责迎接工作。色福晋携扎萨克胜利返旗，暂住白彦花，随即着手维修旧旗保安司令部所在地公庙房屋，然后将军政机关全部迁回公庙旧地。

色福晋摄政后，理政抚民方面大致做了以下几件事：首先在恢复旧体制方面花了很大力气。

如恢复公务人员轮换侍班制，在一切参政和喜庆活动中一律着过去服饰顶戴。下人必须献哈达，跪拜谢恩制。其次在用人方面，将伪政府扎萨克、协理、章京、梅林、甲喇等一千伪职人员，视每人为日伪效力情况逐个罚款、罚物谢罪后都罢官为民。一般伪职人员都不予追究一概留用。再者针对当时旗财政紧绌，群众生活困难的实际情况，废除大余太、苏都伦、车林额布尔、宿亥等农田契约，实行征税制，将乌拉山南坡退耕还牧，分到牧户划为草场。

翌年，即1946年夏，色福晋手下高参李隽卿（国民党党部主任），涉嫌被捕，关押于归绥。为保释李，色福晋赴呼向各方周旋一年之久，李虽得保获释，但旗政荒废，最终惹起了杀身之祸。

10、色福晋母子遇害。1947年夏色福晋携11岁扎萨克阿拉坦敖其尔乘马车赴包头途中，到陶克特巴图（郝游龙）家住一夜，次日起程时被陶事先埋伏的家丁收缴了所有武器，并被绑架到苏布嘎庙喇嘛巴图巴依尔家中监禁几日。当时陶因种种原因没有立即下手，而先放出“兵谏有要事相商”的谣言拖了些日子，然后将母子二人杀害。

陶为什么杀害色福晋母子二人？当时有多种说法，至今不好确认。据笔者后来向色福晋贴身

随从人员处打听，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抗日胜利返旗后伪旗政府官员中留下后患；二是为营救保释李隽卿花费时日，放松旗政，给敌对分子以可乘之机。

总之，色普勒玛是乌拉特西公旗历史上坚持抗日的女英雄。她的遇难早逝，与当时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和封建体制的解体流亡有着密切的关系。

三、乌拉特西公旗的和平解放和人民政府的诞生

1949年9月19日，在绥远省和平解放的同时，乌拉特西公旗也举起了接受和平解放的旗帜，得到了新生。全旗十二万各族人民群众彻底摆脱了三百多年封建统治的枷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人民政府，乌拉特西公旗从此转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就此笔者将自己的一些亲身经历回顾如下：

1、派员参加了乌兰察布盟和平解放大会。1949年初，全国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绥远省接受和平解放的谈判已经开始，以毕力格巴特尔为首的解放军第四师解放了四子王旗，成立乌兰察布盟的筹备工作也在满都林庙由解放军萨木腾、图布信等同志着手进行。在此期间，筹备组先后

给西公旗笋布尔巴图、焦太宝、陶德斯琴和恩克巴雅尔写信，催促派代表赴盟共商筹备成立盟会大会。当时西公旗统治阶级内部斗争激烈。旗保安队团长陶克特巴图（郝游龙）杀害色福晋母子二人夺取旗保安司令之职，旗政基本处于瘫痪状态，全国解放前夕，陶克特巴图等人的反动本性更加暴露。于1948年率其全部兵丁，在包头以东蹬口一带顽固抵抗过人民解放军的挺进。到1949年他们眼看全国解放在即，感到自己的末日来临，又采取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法，一方面派出梅林章京阿拉腾朝路等到阿拉善定远营（即巴彦浩特），参加蒙奸德穆楚克东日布策划的所谓西部蒙政会会议；另一方面迫于绥远省即将和平解放的形势，派出协理笋布尔巴图和我（是时本人任旗衙门笔贴其长）等前往四子王旗王爷府参加成立乌兰察布盟筹备大会。我们临出发前旗保安队内部也发生一起谋杀陶（郝游龙）未遂事件。此后陶更是变本加厉残害百姓，他亲自到后山一带，以报仇为名到处抢掠，当时还有各种土匪和流窜兵丁的骚扰，社会情况非常复杂。我们参加乌盟筹备大会的一行为了自身的安全，接受任务后，隐姓埋名绕道前往四子王旗，几经周折，最后安全到达了王爷府。出乎意料的是，在各地代表中我们还是最先到达的。因此受到了解放军毕

力格巴特尔、沙木腾、特布信等领导同志的热情接待。在等候各地代表期间，我们同解放军和共产党干部频繁接触彼此之间互相了解，解除了各种疑虑。大会开始以后，由笋布尔巴图同志向大会全面介绍了本旗军政概况，并代表全旗人民表达了完全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全面接受和平解放的意愿，受到了与会各地各界代表的一致赞赏。我们接受会议确定的任务，准备返旗时，天气渐冷，解放军给每人发一套冬装和一匹骑乘，并为我们的安全着想，要我们同东中公旗的代表一道绕达尔罕、茂明安返回，解放军还派一小分队护送我们一段路程。因此，我们安安全全地回到了旗里，由于我们绕道多走了些时日，当我们返回旗里时，盟里派出的工作组业已先期到达，并且已组织一批旗军政雇员赴归绥市参加学习了。

2、工作组进驻西公旗。盟里派出的第一批工作组由组长赵发瑞带领，组员有刘永龙、宝音扎布、郎头、吴明、黄旺、焦子荣、嘎鲁等十多人。工作组十月初抵旗后首先抓了鼓动宣传工作，向广大人民群众大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同时着手筹备建立新的旗人民政府工作。其次是物色挑选一批地方干部和民族干部参加培训，以备建立人民政府时安排使

用。向盟输送培训的第一批干部有拉麻扎布、白音斯楞、恩克巴雅尔、朋斯克巴斯尔、保尔朝路、花吉日嘎拉、旺楚克普日来等七人，他们在盟干部训练班学习党的政策和革命理论。每期学习三个月至半年不等，第一期由额尔敦陶克套任班主任，由图布信等同志任教，盟委副书记石生荣、副盟长特布信等领导还经常到学校作政治报告。

工作组进驻西公旗以后，在当时较复杂的社会环境中，经过艰苦卓著的群众工作，很快打开了局面，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为顺利筹建人民政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旗人民政府的成立。1950年4月1日，废除旧乌拉特西公旗和旗衙门，新的乌兰察布盟乌拉特前旗人民政府宣告正式成立。旗人民政府下设科局建制，委派了第一任旗长、副旗长和科局长；同时在基层废除了旧的苏木建制和保甲制，建立了区和嘎查。

乌拉特前旗人民政府第一任旗长是由工作组组长赵发瑞（中共党员、蒙古族）同志担任，副旗长由原旗协理额日和道尔吉出任。旗人民政府下设办公室、民政科、财政科、农牧科、财贸科、公安局、法院等机构。并分别委任各界各族干部担任了环节领导。具体有：

民政科科长：恩和巴雅尔（当地蒙古族，贫苦出身）

财政科科长：拉麻扎布，副科长旺楚克波日来（均系当地蒙古族，贫苦出身）

办公室主任：李志原（当地汉族）

其余各科局均委派外来各族老干部担任了领导。

改原12个苏木为4个区：

第一区（哈拉盖）区长：宝音扎布

第二区（策里）区长：吴明（蒙古族）

第三区（哈业胡同）区长：贾××（汉族）

第四区（阿拉本）区长：黄旺（汉族）

在建立新人民政府时，全旗的社会状况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旧的军警体制尚未整编，有的仍在成群结队地挑起事端；二是旧的土地所有制没来得及改革，地主富农的压榨还在继续；三是原绥西联军所占居的中滩地区仍未划归本旗，全旗农牧业建设和水利建设无法规划；四是反动会道门，特别是一贯道等活动仍很猖狂。

针对这种状况，旗人民政府一经建立，在绥远省和乌兰察布盟党委和政府领导下，立即着手抓了以下几项工作：

1、在发动各族干部群众组织生产，改善

人民群众生活的同时，积极配合人民解放军开展镇压反革命的斗争，将罪大恶极的郝游龙等绳之以法。

2、从1950年冬起，首先在乌兰汁、蓿亥等地开展减租减息、土地改革的试点工作，然后在全旗范围铺开土地改革运动，使世代代贫穷的农户有了自己的土地。

3、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指示，各地人民政府大力开展无偿医治少数民族群众中流行的各种地方病工作，取得显著的成效。

4、认真贯彻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首次明确划分了乌拉特三公旗的边界，使各邻旗发展农牧林业有了各自的规划区域，方便了人民群众生产和生活。

这些事情，几百年的封建统治者未能做到，只有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以后才得以实现。

西公旗在四十年代末获得新生以后，至五十年代末，这十来年中在党的领导下，新的人民政府一手抓阶级斗争，一手抓生产建设，使新生的人民政权空前发展和巩固。在这一时期，旗人民政府领导班子五次易人，旗行政区划发生过两次大的变动。具体情况如下：

旗人民政府1950年成立，首任旗长赵发瑞、副

旗长额日和道尔吉，1952年又补恩和巴雅尔为第二副旗长；

1953年召开乌拉特前旗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第二任旗长是李英彪（共产党员、蒙古族），第一副旗长为恩和巴雅尔、副旗长还有拉麻扎布、王俊标（汉族）、秦××（汉族）等；

1954年旗第一届人大第三次会议改选旗长，骆长胜出任旗长，副旗长未变动；

1958年，对各地行政区域再次进行较大变动，取消原安北县，所属建制划归乌拉特前旗，并归属巴彦淖尔盟管辖。后来又有一次较大变动是，将梅力更庙、哈业胡同以东所有地段统统划归包头市。

综上所述，乌拉特西公旗经过了二三百年的漫长的封建历史时期，到本世纪四十年代末才得到了新生，开始走上了真正由人民当家作主的康庄大道。

中公旗扎萨克诺颜林沁僧格

办学的历史事绩

达瓦桑布 朝克图

解放前归乌兰察布盟会管辖的乌拉特中公旗第十三代世袭扎萨克林沁僧格诺颜，是1933年其父巴布多尔济老公爷升任乌兰察布盟会主席职务之后继位的。是年林沁僧格年满36岁，是老王爷的长子。他自1933年起至1949年执政十多年间，为维护其统治、安抚下民做了不少值得忆述的事，如为发展本旗文化教育事业兴办学校；为防范土匪散兵的骚扰组建旗武装保安队；为打击旅蒙奸商的盘剥，维护牧民群众的经济利益，创办本旗群众生活合作社和发展自己的皮毛加工和纺织等手工业都深得当时倍受欺压的牧民群众的赞赏。

本文着重扎萨克诺颜百折不挠致力于兴学办校的事迹回顾于后，供后人评说。

一、创办了本旗历史上第一座公办小学

林沁僧格继位后，为发展本旗文化教育事业，于1935年，在当时旗衙门所在地阿尔宝日汉图（现在的川井苏木沙巴各嘎查）搭起几座蒙古

包作为校舍，招收包括自己次子雄奴东日布在内的50多名达官贵人子弟，创办了本旗历史上第一座公办小学。学校聘请土默特旗年过花甲的老秀才帕布来任教，主要教授蒙满汉三种语文。当时没有什么正规教材，所以主要以手抄蒙文字母、自己编写的问答式的简明教材以及40个部首字，汉文《三字经》、《百家姓》为教材进行教学。后来为进一步加强师资力量，扎萨克诺颜又聘请了前山蒙汉语文兼通的老巴拉登和年轻的巴图毕力格二人协助教学。

这座学校开办近两年时间。到1937年因旗府遭土匪袭击破坏而随之解散。

二、筹建第二座学校

旗办第一座学校虽在战乱中被冲散，但扎萨克诺颜林沁僧格办学兴旗的决心没有动摇。到1938年春季，在启印大会上他又与众章京们商议重建学校事宜，决定从全旗六个苏木和较富有的寺庙摊派抽调十几座蒙古包来解决校舍问题。是年旧历3月，在旗衙门所在地杭盖努其（现在的乌拉特中旗杭盖戈壁苏木达格图嘎查）建校，从全旗6个苏木招收12岁以上，24岁以下百十来名学生开办了第二座学校。教学内容和设施均照前座学校配齐，由扎萨克诺颜亲自担任校长，委派衙

门笔贴其长梅林章京达瓦敖斯尔为副校长，全权负责校务，并聘请蒙藏两种语文精通的阿必瑟和精通蒙古语文的巴达仍贵、敖特很等任教。

建校后为解决师生伙食等生活管理问题，旗里还派了若干名管理人员、伙夫等，并根据各苏木入学人数，所需米面和肉食均从各苏木筹集解决。

这座学校亦仅仅开办两年。1940年，日寇特务机关撞入本旗强占旗府衙门以后，扎萨克诺颜无可奈何，只好带上蒙古包同牧民群众一道游牧，学校也因之而解散。

三、重建杭盖努其学校

扎萨克诺颜躲寇游牧期间，1941年春，将自己府邸迁至乌力吉图庙（现在的巴音前达门苏木所在地）居住，同时把旗衙门也搬到乌力吉图庙附近花敖宝，并搭起十多个蒙古包，恢复开办了原杭盖努其学校，招收新旧80多名学龄男童复课教学。

学校重建以后，扎萨克诺颜林沁僧格仍兼校长，委派本旗前山蒙汉兼通的巴拉登老汉为具体管理校务的副校长，聘请本旗文人斯日古楞、东何日扎布、巴达仍贵和兴安学校毕业生其那日巴图为教师。

当时所用教材仍是原来几种，但比原来又增设了体育、音乐、美术等新课程。并且为改善师生生活，校方加强生活管理人员，还配备一名校医，名叫宁拉扎木苏，专门负责学生的保健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扎萨克诺颜还从自己府库中拿出相当一笔资金，为每位学生在归绥定做了一套黑色校服和剪绒羊皮毛短腰马靴。

这座学校持续办了近三年，这三年的教学在办学方面积累了一定经验。1943年学校随旗衙门迁至川井继续开办，同时进行了扩建。

四、创办了乌拉特草原第一座女子学校

1943年春，扎萨克诺颜同协理巴图毕力格等旗府官员协商，在川井苏木附近阿门乌苏扎起十多个蒙古包，从全旗各苏木招收12岁至20岁以下女孩50多人，办起了乌拉特地区首座女子学校。

为办好这座学校，旗里委派了老协理宝音巴达拉胡、管旗章京宝日夫等为正副校长，聘请老扎赫日其赛诺木图和受过专门教育的其那尔巴图等任教师。教材仍沿用过去几种，课程方面增设了一门适合当地生产生活需要的畜牧业生产基本知识课。为使学校教学与实践相结合，旗府拨给校方一群牛羊混合畜群。女子学校增设的畜牧业

生产知识课程就是利用这群牛羊对学生讲授接羔保育、剪毛抓绒等牧业生产基本知识。同时还按季节聘请老牧民和家庭主妇向女生们传授从挤奶到加工各种奶食品的技术。这样既能教学与生产实践相结合，又能解决学生们一部分伙食补贴，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建校初期，旗里为了管理好学校的生产，安排了若干名行政管理人員和伙夫、牧工，还无偿给每位学生配备一套被褥和本旗产的毛毯，保障了学校后勤供给和服务工作。

女子学校在川井开办一年多以后，由于经费开支紧绌，到1944年夏，扎萨克诺颜将学校迁至自己府邸所在地乌力吉图庙宝日胡硕继续维持了一个时期。

遗憾的是，到1944年秋，由于驻旗绥远省傅作义部队和日伪特务机关发生交战，冲散了川井学校和乌力吉图庙女子学校，致使两座学校的设施财产也都被战乱毁于一旦。结果扎萨克诺颜为之奋斗创建的几座学校先后都遭到夭折。但所有这些都未能动摇扎萨克诺颜办校兴学的初衷。

五、创办了本巴太小学

1947年春季启印大会上，扎萨克诺颜林沁僧格又提出建校兴学问题，同巴图毕力格协理等诸

官员共商建校事宜后决定，在科尔沁苏木本巴太庙建一座较大规模的小学。并委派协理巴图毕力格及伯海敖其尔、琪丹苏达那木（旗保安司令部供给部副官）等分别担任校长和副校长，招收了120多名本旗各苏木12岁至24岁青少年，聘请其那尔巴图、诺尔布东日布、斯日古楞巴雅尔等若干名新老教师任课，开办了本旗历史上第五座公办小学。

建校初期，旗里还派官其格那木森、麻木二人为学校生活管理员。一切费用开支均由旗里统一拨给，师生统一就餐，过集体生活。到1948年，为进一步改善学校生活，旗里向各大寺庙和富裕牧户发出捐款号召。因此有不少庙宇和牧户踊跃捐款捐物捐牲畜，支援旗办学校，使学校条件得到进一步改善。

本巴太小学建校后一改过去以手抄本为教材的简陋办法，采用当时伪蒙政府小学课本和国民党政府编印的小学教材，经过稍事修定后统一在包头用蒙文铅印成册，发给学生每人一册作为教材。并且改变过去只讲授单一的语文课的作法，同时开设算术课，还根据被聘师资的知识面由教师自己编写了历史、地理常识教材，增设了史地常识课；在教学方法上也改变过去对学生“一拉老兄弟，一律平推”的作法，根据学生年龄结

构、知识程度等不同情况，采取了分年级授课的办法。所有这些教学方面的改进，对学校教学质量的提高和对学校的进一步巩固发展都起到了推动作用。

这一时期，旗府为了进一步解决学龄青少年入学难的问题，在本旗山前昆都伦庙又创办了另一座小学。派老教师斯日古楞和巴图扎布等人全面负责管理，并请他们亲自任教。

这两座学校一直坚持开办到1950年7月乌拉特草原得到解放为止。其中的本巴太小学，于1953年全建制迁移到海流图，改称为乌拉特中后联合旗完全小学。当时该座学校已发展成一座设有一至六年级班次具有相当规模的学校。

六、应有的评价

过去的中公旗，在乌拉特三公旗中，面积虽然最大，但是人口最少、居住最偏僻、交通最不便、经济最落后的一个旗。在这种艰苦的自然经济条件和战乱四起、社会环境极不稳定的情况下，扎萨克诺颜林沁僧格为发展本旗文化教育事业，不畏艰难，不怕挫折，先后创建和重建五座学校，最终坚持到解放为止。这一实事本身显示着他在乌拉特中公旗历史上应被肯定的功绩。

事实上，林沁僧格执政期间，不仅坚持不懈

地办校兴学，做出了值得回顾评价的实绩，当时他还在日寇侵入、土匪骚乱、国民党和伪西蒙政府的威逼利诱等极恶劣环境下，周旋各方，维持旗政，最终接受和平解放，保全下民，也是他的历史功绩的另一面，也值得给予应有的评价。

当然，人们并不认为所有这些都是林沁僧格一人所为。但是，他作为一名封建历史时期，执掌全旗政务大权的人物，没有他的积极提倡和开明支持，一切事情是很难办到的。所以我们评价这一历史人物时，只能从当时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分析，才能得出较正确的结论。

原乌拉特东公旗协理

陶德吉日嘎拉

道尔吉斯楞

陶德吉日嘎拉（汉名吴庆山）于公元1905年，出生在原乌拉特东公旗中心苏木台吉笋布尔巴图家里。陶从1942年至1949年任乌拉特东公旗大协理之职。1949年9月19日原绥远省和平起义，乌拉特草原也随着解放，陶德吉日嘎拉担任乌拉特左旗人民政府旗长，直到1952年2月24日去世。

一、陶德吉日嘎拉的成长过程和生活环境

（一）陶德吉日嘎拉的童年生活

陶德吉日嘎拉的父亲笋布尔巴图生前是乌拉特东公旗协理，汉名叫二来宝。母亲叫阿木尔萨娜，是一位普通牧民。他们一家在旧社会虽属贵族台吉之列，但家境并不富裕。特别是陶德吉日嘎拉三岁时，父亲去世，七岁时母亲病故，孤苦伶仃，无人照料。后来他的叔父、当时的副管

旗章京蒙克巴雅尔出面抚养他。从此陶德吉日嘎拉就跟随他的婶子蒙根其其格放牛放羊。

陶的叔父蒙克巴雅尔，当时也仅是旗名誉管旗章京，并无实权。他们一家也只是出门有坐骑，在家有菜畜，生活并不富裕。同他们邻居的本旗大管旗章京伊喜格，家庭生活较富裕，本人有一定的文化，经常教家里的孩子念书识字。陶德吉日嘎拉从小聪明好学，他同邻居孩子们玩耍时请小伙伴教他蒙文字母，他放牧时常常在沙土上写写画画，自学蒙文。陶德吉日嘎拉的另一位叔父查干喇嘛管旗章京和伊喜仁钦、丹皮勒（即嘎布吉喇嘛）等发现陶天资聪颖好学向上，极力劝说蒙克巴雅尔将陶德吉日嘎拉送在伊喜格门下为徒学习文化。陶德吉日嘎拉在伊喜格的精心教育下，勤学苦练，埋头读书，经过短短几年的努力，他不仅精通蒙文，而且对汉藏两种语言文字也能初步掌握。所以不久他的启蒙老师伊喜格，将陶德吉日嘎拉推荐到旗衙门当了见习笔贴其（秘书）。陶德吉日嘎拉，在此期间，仍以超人的毅力刻苦学习，年仅十六、七岁就能写一手漂亮的蒙文书法，而且在数学和汉语文方面也有很大提高，引起了多方面人们的重视。

（二）陶德吉日嘎拉的婚姻生活

陶德吉日嘎拉担任旗衙门见习笔贴其，崭露

头角小有名气后，该旗中心苏木已故原协理道日雅拉遗孀陶高首先托人向陶德吉日嘎拉提亲。陶高老人只有个独生女儿名叫都热，因无子后嗣，极想招赘一理想女婿继承家业。她家里当时有500多只小畜，50多头牛和两群马，还有三座蒙古包生活相当富裕。这门亲事经过媒人说合，双方同意，陶德吉日嘎拉即被招赘为婿。当时陶年仅十七岁，因旗衙门公事繁忙，他婚后无暇顾及家眷，甚至和新娘也没有同居多时。时隔不久，陶高老人的使女其木格（系原中公旗扎毕拉老人若勒克德之女），未婚怀孕。陶高老人怕造成影响，不由分说竟将其木格嫁给陶德吉日嘎拉为二房妻子。成婚后不到六个月，他这位二房妻子其木格生了个儿子，取名为旺沁，但陶德吉日嘎拉一直不承认是自己的亲生骨肉。

1938年，一个曾在日伪军队中混事多年退役下来的原籍察哈尔人阿拉坦宝勾引陶德吉日嘎拉的结发妻子，俩人一起同居，并将其家产霸占，后来连都热的金银首饰也被阿吃喝嫖赌，浪荡殆尽。那时陶德吉日嘎拉同其二房妻子其木格一起生活。他慑于阿拉坦宝在日伪方面有相当势力，因此对阿与其妻都热的隐私关系未予理睬。

陶德吉日嘎拉的婚姻较为曲折和复杂，后来

他又被原东公旗协理全普勒、贵族乌仁娜老人招赘为女婿，同其爱女若勤吉斯仁成婚。婚后俩人在一起生活了几年，若勤吉斯仁没有生养儿女，陶德吉日嘎拉因没有子女继嗣，颇为忧虑。1945年在别人的介绍和说合下，又同包头办事处主任恩和乌力吉的女儿萨仁其其格成婚。当时陶德吉日嘎拉自己有百十来只小畜，30来头牛和20多匹马子，生活还过得去。婚后不久萨仁其其格生了一个儿子，不幸月中夭折，直到解放以后又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宝音达来。现任乌中旗新忽热苏木巴彦温都尔嘎查党支部书记，从事牧业生产。曾经抚养过陶德吉日嘎拉的一位姐姐巴图娃，也在同一浩特，以放牧为生。

（三）陶德吉日嘎拉的品性和为人

陶德吉日嘎拉幼年失去父母，孤苦伶仃，后来寄人篱下，靠其叔伯抚养成人，从未沾染纨绔子弟习气，一直保持勤劳节俭、朴实忠厚的牧民作风。在他专心学习文化知识的过程中，曾通读过《明镜》、《四十明鉴》、《圣经》、《四书五经》等历史典籍。他效法古人，独善其身，养成了谦虚、逊让、谨慎从事的作风。后来他虽身居旗府夫协理要职，仍与人为善，平等待人。特别是他处理公务之余，不分春夏秋冬、严寒酷暑，尽量和亲属家人一起参加家务劳动，亲自放牧养

畜，甚至打更守夜。夏季他总是布衣素食，冬季穿白羊皮袄，随身携带一架望远镜，背一支步枪，手握套马杆，只身一人牧羊放马。有时他独自出外寻找牲畜，每到牧户家，人们惊奇而又尊敬地说“协理大人驾到”，并拿出家里最好的食品招待，而他只是有啥吃啥，不让牧户格外照顾。他还主动解释说：“我仅是旗衙门协理而已，到你们这里就如同到了自己家里。我也是个普通牧民，你们可别见外。”他见到任何一个人尊称“您”，而且平易近人，不摆架子。他无论是私事公事外出，住宿别人家里时，自己的坐骑从不叫别人替他放牧和喂养，而是起早贪黑亲自牵马放牧、打水饮畜。不论平民百姓还是王公贵族，他都一视同仁，平等相待，毫无歧视偏见、谄媚屈膝的恶习。陶德吉日嘎拉的这些美德不仅表现在他个人的所作所为里，而且对其家眷也要求甚严。他的几房妇人和子女，都同普通牧民一样，亲自料理家务和参加牧业劳动。凡是到他家作客的，不分贵贱一律热情招待。尤其是他的四房妇人萨仁其其格，是个非常贤惠的好内助，处处以丈夫为榜样处事待人，她现在已是古稀之年，每每见到过去的熟人就高兴地说：“我在旧社会虽然是协理大人的夫人，由于陶德吉日嘎拉的教诲，我从来不以势压人，欺压百姓，既便是在文

化大革命时期，我们那里的牧民群众也没有歧视迫害过我，而且划阶级成分时，还给我定了个贫苦牧民的成分！”

陶德吉日嘎拉在旧社会虽身居旗府大协理高位，但家中从来未使用过奴仆，所以在“文革”中也没一个人“检举揭发”过他，更没人揪斗过他们一家。

二、陶德吉日嘎拉就任大协理时的社会背景和主要业绩

（一）当时的社会背景

1937年，东公旗扎萨克诺彦额日和斯钦占布拉手下的大协理闹海呼去世，由额王胞弟齐木德仁钦道尔吉接任大协理之职。当年年底额王去世，齐木德仁钦道尔吉继任扎萨克诺彦，并且亲自掌印，一直到1938年下半年才选任米钦呼（又名米其德道尔吉）为旗衙门大协理。1942年米钦呼年迈去世，齐王选定陶德吉日嘎拉为旗衙门大协理。

当时日本侵略者已经侵占乌拉特三公旗，并且成立了日伪旗政府，同时也承认东公旗齐木德仁钦道尔吉的王位。但是原额日和斯钦占布拉老王爷的遗孀、福晋巴云英（蒙名德力格尔）正当中年，膝下有一个幼年儿子，名叫贡嘎苏荣。当

时，她一方面对日伪不满，另一方面极想使年幼的儿子继承王位。所以她毅然选择了抗日救国、收复失地和权力的道路。领上自己的儿子离旗入套，投奔了傅作义部。到陕坝以后受到了国民党军政方面的热情欢迎。继而她又带上她的幼子贡嘎苏荣亲赴重庆，拜见了蒋介石，面陈了自己的想法和要求。深得蒋介石的赞赏。蒋当即委任她儿子贡嘎苏荣为东公旗扎萨克诺彦兼旗保安总队司令，并拨给了部分武器弹药和军需。巴云英回到陕坝后，立即同原东公旗保安总队队长史庆芳（音）合作，开始招兵买马，组建了一支自己的部队。当时她的儿子尚未长大成人，所以经过一番周旋，经国民党政府的批准，巴云英亲自担任这支抗日保安部队的司令，同时任命史庆芳为副司令。

巴云英当时很想率部打回东公旗，但是由于她的这支部队刚刚组建，人数不多，而且日伪有一个团的兵力驻防在旗府所在地哈布其拉，另外还分别在图来呼勒庙、巴音温都尔等地也驻扎着相当数量的日伪警察部队和特务机关。再加上当时还有一股所谓“独立队”的土匪作虐。她不得不改变初衷，将自己的部队拉到乌梁素海以东的后山地区，配合国民党游击部队，侦察日本鬼子在三公旗的动静，并且组织发动了几次袭击日伪

在三公旗所设的警特机关的活动。

当时的乌拉特东公旗，旗衙门仍设在哈布其拉。全旗管辖有中心苏木、赫雅苏木、巴图苏木、苏海图苏木、阿如包尔吉赫德苏木、乌布尔包尔吉赫德苏木、扎鲁特苏木等七个苏木，并各派有苏木章京管理。

旗衙门，除扎萨克诺颜齐木德仁钦道尔吉、大协理陶德吉日嘎拉二人为主，执掌旗政事务，与日寇派驻旗府的所谓顾问周旋外，还设有副协理、管旗章京、左右梅林、扎楞章京、掌印五吏等一批大小官员。

(二) 同日本人周旋、竭力维护牧民群众的利益

面对日本侵略者对旗政插手干涉，增加种种苛捐杂税，到处欺压抢掠牧民百姓的现实，扎萨克诺颜齐木德仁钦道尔吉和大协理陶德吉日嘎拉二人非常不满。起初他们一方面设法应付日本人，另一方面秘密派人（其中有伊喜敖其尔、宝劳雷等人）到套内同巴云英等人建立联系、互通情报，做了不少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事。不久扎萨克诺颜齐木德仁钦道尔吉去世。陶德吉日嘎拉代管旗府大印，执掌了全部旗政大权。他积极主动地与副协理宝音扎日嘎拉等旗府大小官员配合，齐心协力，为维护本旗牧民安定和正常生产生

活，竭尽了全部精力。

1、过去乌拉特三公旗相互之间只区分所属人口和户籍，而从未划定边界。所以东公旗所属牧户居住非常分散。有的牧民住在离旗府很遥远的巴达格尔深山老林，有的甚至居住在昆都伦召等地。所以驻旗日本顾问根本无法了解实情。利用这一有利情况，陶德吉日嘎拉大协理执掌旗政后，每次同日本顾问商谈工作、反映问题时，对本旗经济状况及各项重要数据，都隐瞒真情，留有余地。一再以“旗小财疏、基础薄弱”为借口，尽量争取日本鬼子减免强加给牧民群众的各种苛捐杂税。有时还能争取到日方一些补贴，以换来布匹、食品等解决牧民群众急需。

2、日伪军、警、特务机关进驻东公旗以后，所到之处为非作歹，欺压百姓，索贿行窃，甚至公开敲诈勒索，无所不为。每遇这种事情，陶德吉日嘎拉大协理义愤填膺，亲自出面，想方设法营救遇难受害的平民百姓。例如，有一次日伪警察路遇一名旗衙门当差的，不怀好意地询问道：“你最近都去了哪些地方？”这位当差的毫无提防，随口说了一声：“我这个人该去的地方都去了。”那个日伪警察当即传讯这位当差的，审问其“是否到过套内，是不是同国民党方面进行了联络？”并被拘禁了好几天，还不放人。陶协

理得知这一情况后，亲自面见那位日伪警察，据理力争，严词驳斥他的无理行为，迫使他放了人。还有一次，有个叫哈尔唐古德的日伪警察路遇中公旗东北戈壁牧民尼玛，企图抢劫他的坐骑，尼玛未从。他就掏出随身携带的手枪，瞄准尼玛连扣几次扳机，只因子弹卡壳才未能击伤尼玛。尼玛看到这种霸道行为，非常气愤地说：

“你那日本老子不可能发给你好枪，你拿那个破玩艺儿杀不了我！”听了这话，那家伙恼羞成怒，反咬一口说：“看来你这个人肯定是从外蒙派进来的间谍，今天我非把你逮捕归案不可！”说完，他就跑到警察署，领来两三个伪警要捉拿尼玛。见此状况，尼玛赶紧上马加鞭，逃到陶德吉日嘎拉大协理家，向他诉说了刚才路上所发生的事情。陶协理听后，立即给他改装打扮，换乘别的马子，让他隐姓埋名，在本旗逗留了一个时期，使尼玛躲过了这次灾难。

3、日伪占领时期，曾颁布通告，搞过一次查毒禁烟、禁止民间使用金银器具等活动。日伪警特人员，趁此机会到处敲诈勒索，使众多无辜牧民遭受了很多不白之冤。为此事大协理陶德吉日嘎拉专门召见日本顾问，严词指出：“我旗住户分散，任何指示、通告，不可能迅速做到家喻户晓，所以我们决不允许任何人发布通告后立即

叫各家各户一律遵从。”由于大协理如此果断与日伪据理力争，使许多无辜牧户免遭抢掠。

4、1943年乌拉特东公旗遭受了一次罕见的干旱灾害。农业区全部颗粒无收，出现了严重的饥荒年景。当时，少数地主富户，虽有存粮，他们却趁火打劫，无限抬高粮价，逼着在饥饿线上挣扎的农牧户，用一只绵羊换取他们的二升米，用一匹马换取他们的三桶（三十斤）粮食。对这种欺行霸市趁火打劫行为，多数牧户敢怒而不敢言。在这关键时刻，大协理陶德吉日嘎拉秘密派人到套内，同巴司令（巴云英）取得联系，给旗里偷运400担（14万斤）粮食，分给全旗饥民，渡过了难关。后来，旗里暗中送给套内200来头（匹）牛马，以作粮食抵价。

5、日伪时期，东公旗没有自己的商业供销部门，只有行号叫“嘎民麻子”和“张甘林”等少数几家旅蒙奸商。他们贩运货物，竭尽所能，欺诈和盘剥牧民百姓。看到这种情况，陶德吉日嘎拉大协理愤愤不平。他思谋良久，最后决定，同广大牧民群众商议，以集资入股的方式，筹建自己的供销合作社。他亲自选调哈日呼、喇麻呼、宝日呼三人具体筹办。为时不长，终于建起了东公旗自办的第一家供销合作社。而且所有货物都通过当时的乌兰察布盟会所辖“实业局”购

进。这样既遏制了当时少数几家旅蒙商的盘剥，也缓解了本旗牧民群众的生产、生活用品的急需。对此，广大牧民群众拍手称赞，他们当时把自己集资入股筹办的这个供销合作社，亲昵地叫作“我们的三个呼（意为三个儿子）供销合作社。”深得牧民群众的欢迎。

6、陶德吉日嘎拉虽身居旗大协理要职，并且执掌旗政全部大权。但他为政清廉，从不向下索贿受贿，并且知人善任，不唯亲疏、量才用人。例如，当时旗保安队里的骨干贡苏、拉布哈、劳布曾达瓦等人，既不是他的亲属，也不是本旗人，但他大胆放手起用，安排在重要岗位，委以重任。这些人在保旗剿匪的斗争中，个个胆大心细，威震一时，不仅把旗保安队组建成一支精明强悍的队伍，而且每次驱逐和消灭土匪散兵时，连连得胜。使当时大大小小各路土匪闻风丧胆。当时旗保安队在册兵丁不到一百人，其中有丹巴道尔吉、图布信、贺喜格巴图、敖其尔、伦敦呢玛、丹曾巴拉珠尔、朝勒蒙等十八名干将。对这十八人，各路土匪强盗都惧怕三分。称之为“东公旗十八大金刚”。有一次以范四为首的二百多名土匪窜入东公旗南部抢掠民众。这十八名干将奉命前去围剿，同这股土匪展开激战，拼搏中杀伤土匪多人，终于将这股大批土匪击溃并驱逐出境，

而他们十八人无一伤亡。又有一次，旗保安队的劳布曾达瓦一人，因私事到本旗南部农区，听说一户农民家里有十来名土匪打尖，已经吃完午饭正在睡午觉。他就单枪匹马独自一人，隐蔽接近那一户农民家，将房顶上站岗放哨的土匪一枪击倒，随即堵住屋门，用枪逼住十来名土匪，缴获了所有武器装备。从此以后，各路小股土匪，一听说劳布曾达瓦的名字就闻风而逃，不敢肆虐。

正因为陶德吉日嘎拉大协理知人善任，东公旗保安队威名大振，各路大小土匪，不敢在东公旗范围骚扰。

7、陶协理除指挥旗保安队，维护家乡安全外，还对国民党所属游击部队袭击日伪警特机关的行动，暗中给予支持。移居在套内的巴云英（巴司令），1940年以后，把所属保安队一部分兵力派出去，同驻防乌梁素海以东、后山地区的国民党游击队协同作战。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侦察三公旗范围日特活动，袭击日伪警特机关。这些情况陶协理早已知晓。但他在日本人面前从未露声色。有一次巴云英司令手下的笋布尔率领连队，对盘踞在东公旗图来呼勒庙上的日本特务机关搞了一次偷袭。当时，陶协理正路过此地，他立马高处，看得清清楚楚，他却假装不知，没有

采取任何举动。事后，日本顾问专门找他质问：“你明明看见国民党游击队袭击我们，为什么不把你们保安队集合起来支援？”陶协理说：“最近一个时期，我旗境内，土匪散兵骚扰少了，旗保安队多数人都请假回去参加家里生产，一时无法集结，所以未能支援你们”。这样一说，日本顾问也就无话可说了。后来，国民党游击队先后多次袭击过日伪驻东公旗警特机关。对此，陶协理每每以“不知道”或“没来得及”等为托词，搪塞了事。

事实上，那位屡屡率部袭击日伪驻东公旗警特机关的连长笋布尔，本身就是东公旗保安队队员。是后来随巴云英入套，在她手下任连长的。此事，陶协理非常清楚，可是他从未向日本人透露。

游击队多次袭击日伪驻旗机关，而旗府一次也未出面支援的事，最终还是引起了日本鬼子的怀疑。有一天，一位驻旗日寇顾问招见陶协理，狡黠地问道：“游击队连连偷袭我们警特机关，而你们旗衙门为什么一直安然无恙？”听到此话，陶协理立刻明白了日本人的用意。他很快召集保安队的心腹密商对策。指派可靠肯干的保安队员，神不知鬼不觉地，将驻防旗衙门保安队的炮台和几间营房放火烧掉，故意制造假象后又大

肆宣扬：“国民党游击队偷袭我们旗衙门，还放火烧毁了保安队兵营”。以这种策略排除了日本鬼子对旗府官员的疑心。

时隔不久，又发生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情。陶协理二房妻子所生儿子旺沁的夫人，她暗中同一个叫米喜格的男子勾搭成奸，俩人突然离家出走，躲避到套内长期不归。为此事旺沁专门去套内一次，终于找见妻子并将其领回家来。日寇方面得知陶的儿子入套回来的消息后，不分青红皂白，硬说旺沁夫妇二人是国民党的特务间谍，进而怀疑陶协理本人也与国民党方面有联系。并有消息说，日伪警署准备立即拘审旺沁夫妇二人。眼看事情已经闹大，陶协理当机立断，决心先下手亲自处理这件事。他立刻下令枪决旺沁夫妇二人。当时接受执行枪决任务的旗保安队少尉排长丹巴道尔吉，知道陶协理唯恐牵连自己，所以断决不公，便极力劝说陶协理，为旺沁求情说：“如果宝尼亚（旺的妻子）没有私通离家出走，旺沁怎能入套受这般怨屈？只有给旺沁留一条活命，才能说明您大人的公断，上下臣民才能佩服您！”经过再三说情，陶协理才接受他的说情，免于旺沁死命，只枪决了宝尼亚一人，再次摆脱了日寇的诡计。

对此，后人评说，如果陶德吉日嘎拉大协理

当时不明察果断，坐等日寇插手，此案结果，不仅旺沁性命难保，陶协理本人也将涉嫌受害。

8、1945年春夏，日寇眼看其侵略扩张美梦已成泡影，但他们同任何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势力一样，仍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困兽犹斗，作垂死挣扎。他们临撤退之前，还要手腕，对旗大协理陶德吉日嘎拉等人谎称什么：“我们准备给你们旗保安队增拨武器装备，以防国民党军队反攻时使用。请你们限期把所有旗保安队兵丁集结。”对这一阴谋，所有旗府大小官吏谁也没有防备。他们想的是，只要从日寇手里弄到一批武器装备，怎么都好办。所以旗里即时发出通知，要求全体保安队队员限期到旗里集结待命。其结果，等到全旗保安队队员集结完毕后，驻扎在旗衙门所在地北边沙木腾庙上的日寇，全副武装分乘几辆大卡车，赶到旗保安队集结地点，不由分说把保安队的武器装备全部缴去。当时只有旗大协理陶德吉日嘎拉和旗保安队主要负责人贡苏、拉巴哈、劳布曾达瓦等几人据理力争，没有交出自己所持手枪。日寇缴获保安队全部武器装备后，立即向东逃窜而去。

9、乌拉特东公旗保安队上当受骗，武器装备全部被日寇缴走以后，本旗安全保卫工作出现

前所未有的困难局面。对此，陶德吉日嘎拉非常焦虑。他经过周密思考，决心去找巴云英司令。他立即带领官其格、贡苏、拉布哈、劳布曾达瓦、阿拉坦敖其尔等人，奔赴套区询访到金先生屹旦，找见巴司令，把前段事变和旗内事务一一作了汇报。

巴司令见到他们一行当即热情款待，并根据所反映情况，进一步分析当时国内国际形势，安慰大家说：“日寇已经战败，对此大家可以放心。请你们一定要为保家卫旗携手共事。这是我们当前面临的最迫切问题。我们先拨给你们一定数量的枪支弹药，随后根据你们现有保安队员人数，补给所需武器装备。”说完巴司令即拨给五只步枪和千余发子弹。陶协理一行很受感动。他们回旗不久，巴云英司令又拨给他们80只步枪、两挺机枪和一万余发子弹，并且专门派兵丁把这些武器弹药护送到东公旗西南部桑根胡同，旗保安队立即派人接应领取，武装自己，恢复了元气。

10、1945年8月日寇无条件投降，巴云英率领全家及其所属部队返回东公旗。旗衙门为此召集全旗大小官吏、开明绅士和牧民群众，在图来呼勒庙举行了隆重的那达慕集会，专门庆贺巴司令返旗和她的儿子贡嘎苏荣继任王位。

这次集会以后不久，巴云英司令立即着手整编旗属部队，让年老体弱的士兵全部退伍，返回家园安度晚年。对原旗保安队和保安总队两部分人员进行整编，将所有军政大权移交给其子贡嘎苏荣，明确宣布了她儿子的扎萨克诺颜兼旗保安总队司令职务。

巴云英母子二人在旗里居住时间不长，就一起到设在包头市东河区园子巷街的东公旗办事处和司令部居住，遥控指挥本旗所有军政要事。

对于这种安排和做法，陶德吉日嘎拉大协理，并不介意。他主动向巴云英和新任扎萨克诺颜兼保安司令贡嘎苏荣汇报旗里全面情况，并提出自己卸任养老的要求。巴云英听完他的汇报和要求，诚恳地说：“你的大协理职务，我从来未打算撤掉，况且也没有别的合适人选。你是否对我们回旗掌权执政有意见？”她接着还劝解说：

“日寇侵占乌兰察布以后，盟会虽然提名你为旗府大协理，但事实充分证明，你是同日伪竭力周旋，为维护故土旗民做了不少好事，这一点我是清楚的。所以我劝你继续担任旗府大协理之职，跟我们同心协力，搞好全旗安抚稳定工作。”陶协理接受了巴云英的劝导，继续留任大协理，同原先一样勤奋地工作。经过一段实际工作，他觉得掌实权的巴云英和她的儿子长期居住在包头，

旗里大小事，都需要向他（她）们请示汇报才能办理。日久天长，不仅不方便，而且花费甚多。为此陶德吉日嘎拉大协理，亲自带领旗太宝参领及梅林章京通拉嘎、扎楞章京恩克巴雅尔及管旗章京丹毕日勒等亲赴包头，拜见巴司令及其儿子扎萨克诺颜贡嘎苏荣，提出两条建议：一是精减汉族兵丁人数；二是恳请巴司令和扎萨克诺颜回旗亲自执政。听了这些建议，巴云英当即表示：“这类事情不宜在此商谈，应换个合适地方详议。”她随即只带领手下吉兰太一人，把陶等一行领到当时家居包头的太宝参领家里，继续商议说：“我意汉族兵丁人数只能增加，不能缩减，因为各友邻旗给我们的压力很大，别的不用说，我们为建旗府从阴山砍伐了一些树木，就被当地军警没收了，这明明是欺压我们。所以我们保安队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再说，在日伪时期，我能在河套地区站住脚，有了今天，也是同汉族兵丁相助有很大关系。没有他们的支持，哪有今天的胜利？而且真把现有汉族保安队员全部精减了，我旗真正能服兵役的蒙古族青壮年也没那么多。至于我的儿子回旗执政与否，只要你们精心代理，我就放心了。我们在此居住的花销费用，仅就我名下的地租、税金就完全可以解决，请大家不必费心。”听了巴云英这番议论，大家都觉

得不好再坚持劝说什么，翌日就起程返回旗里。

11、1947年，国民党政府召开所谓“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巴云英作为东公旗代表将出席会议。在她起程前，陶协理亲自起草三项议案交给巴云英，请她向会议递交，以促请国民政府予以批准。他所起草的三项议案：一是关于外来人在东公旗开垦土地的全部租金和税收权要归本旗；二是旗内筹建学校争取国家教育部门纳入计划；三是从国家财政中争取部分补贴。

陶协理提出并草拟这三项议案原由有二：首先，当时乌拉特东公旗南郊边沿地区，经常遭受土匪散兵的抢掠，使好多牧民不能安生，不得不成群结队迁居他乡。原安北县和固阳县等地大批农户却趁虚而入，把原属本旗牧民的大量草场开垦种地。这两个县把农户所开草场荒地都据为该县所用。对这种行为陶协理一直愤愤不平。其次，陶协理不仅对本旗牧民群众的休养生息处处着想，他还对广大牧民子弟的文化教育十分关心和重视。在日伪占领时期，本旗范围没有一座蒙古族学校。所以他极力主张办一座正规学校。他本人虽是一旗夫协理，日常政务千头万绪，但他还是抽出时间亲自举办走读学校（按现时说法就是马背学校），身体力行。开始时，他只是对自

己的子孙亲自教书识字，后来干脆把邻近居住的各家孩子们定期集中到自己家里，亲自教授蒙文字母。他一有空闲时间，就挨门串户对牧民子女进行辅导。没有教科书，他亲自编写字母表和识字本，解决学生娃娃们的急需。因为他生性温和、平易近人，所有孩子都愿意接近和请教他。由于他的不懈努力，前后培养出二十多名具有相当文化程度的人才。这些人在新中国成立后，都参加了革命工作。

三、和平解放前后的陶德吉日嘎拉

(一) 极力稳定本旗局势，为迎接和平解放做了一定贡献。

解放战争发展到1948年，走投无路的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伪蒙政府和追随他的苏尼特、布利亚特等蒙旗部队以及国民党的散兵败将，经过东公旗往西逃窜时，所到之处骚扰百姓、造谣惑众，使全旗上下人心浮动。针对这一局面，陶德吉日嘎拉协同巴云英等，一方面抓紧充实和加强旗保安总队的力量，密切注视国内形势的变化和德木楚克东白布残部的举动，以防不测；另一方面做了不少稳定本旗牧民群众的情绪，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的工作。正在此时，又发生了一起意外事情，令陶协理非常担忧。事情是

这样的，一个日伪时期隐蔽下来做事的东部蒙族叫扎木苏的人因涉嫌偷盗而被旗衙门拘禁，扎木苏在拘禁期间，一时想不开自缢身亡。这一事件发生后，陶协理担心东部蒙族中有人出来追究这个人的死因，难以交待。陶的挚友那木海若喜（系准格尔旗人）得知他的忧虑后，直言劝慰说：“扎木苏本人过去同日本人搞得火热，也当过伪军，各方面表现也不好。这次又有偷盗嫌疑，我们拘禁他没什么不对，而且拘禁期间也没有逼供等情况发生，是他自己一时想不开自缢身亡的。所以既使有人找上门来，也怪不得我们什么。”听了这番劝说，陶协理才放下心来，继续致力于稳定全旗大局的事情。向陶协理进言的那位那木海若喜，原是留学日本、毕业于高等学府、懂蒙、汉、日三种语言文字、而且思想作风也比较开明的有识之士。但是他在日寇投降后，一直没有固定职业。陶德吉日嘎拉与他相识后认为他是个人才，把他全家从包头迁到旗里来。任用他为旗衙门助理笔贴其，后提升为梅林章京。从此二人私交甚密，陶很是器重他。特别是通过对扎木苏事件的处理，二人关系更加密切。陶协理事事与他磋商，两人对当时国际国内风云变幻的时局，审时度势、共商对策、为稳定全旗上下情绪做了许多工作。其中值得追述的事

情有二：

一是，他们主动同居住在套内的巴云英司令保持经常联系，通过这个渠道他们了解到傅作义将军正在北平举行和平起义，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加入革命行列的消息。消除了思想上的许多顾虑，坚定了共产党必胜、国民党必败的信念。他们经过商议，决定立即向全旗发布通告，以安抚民众。那次所发布通告主要内容是，号召广大牧民群众“不要轻信各种谣传，更不要背井离乡逃往它处，要安心搞好生产生活。”并且指出：“只有追随德穆楚克栋鲁普流亡伪蒙政府的苏呢特、布利亚特人是与共产党作对，作恶多端。而我们从未与共产党人结仇对抗。所以即便共产党部队进来，也不会歧视迫害我们。大家都要谨防上当受骗。”这一通告发布以后基本稳定了群众情绪，甚至把本旗西北部偏远地区，部分躲避到达来库布一带的牧民也召唤回来。

二是，1949年间，即解放前夕，乌拉特西公旗原保安总队郝游龙为首的反动分子，设圈套把本旗女司令齐俊峰和她的儿子杀害以后，他们内部发生矛盾。首先该旗保安总队贺希格太平为首的十八人，对郝游龙的这种举动非常不满，举事起义。他们设计刺杀郝游龙而未遂。暂时躲避到东公旗阿尔其山一带。后来决定绕道东去投奔解

放军。但苦于手中没有通行证，不能起程。贺希格太平就大着胆子来找他的旧友——即原巴云英手下当连长打游击、后晋升为团长的笋布尔求援。笋布尔团长当即拜见旗梅林章京那木海若喜说明原由，请他出面帮忙。那得知他们的处境后很是同情，立即为他们用汉文起草了一个通行证，然后向陶协理说明原委，陶听后丝毫没有责怪他们，而且亲自将汉文通行证译成蒙文，盖上旗府大印交给贺希格太平。他们十八人凭着东公旗这张通行证，一路无阻，顺利通过多尔白特、达尔汗等旗，逃脱了郝游龙手下的追捕，安全投奔了人民解放军部队。事后不久，郝游龙亲自带领西公旗一个团的保安队，来东公旗要人。对此，陶协理亲自出面，会见郝本人后严厉指责说：“贺希格太平等人明明已朝东逃走了，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兴师动众来我旗要人，你居心何在？我们决不允许这么多人来我旗境内骚扰百姓、寻衅闹事！”郝游龙本来没有真凭实据，听了这番话，无言以对，只好悻悻然带兵马返回，途中还发泄私愤，把东公旗阿布盖图庙抢劫一空。后来贺西格太平手下一起起事的查干班迪等人的家属，慑于郝游龙的淫威，偷偷迁到东公旗西部山区隐居起来。旗里明知底细，但装作不知，有意保护了她们。

（二）积极参加了和平起义，旧社会的协理

大人得到新生。

1949年深秋，旗府接到中共乌兰察布盟工作委员会邀请东公旗派人到乌兰花参加各蒙旗代表会议的信件。陶德吉日嘎拉同旗府大小官员商议后，决定立即派那木海若喜梅林章京和旗衙门师爷陶德斯钦二人代表东公旗前往参加会议。他们二人到达乌兰花时，受到了中共乌兰察布盟工作委员会领导辛玉、沙木腾、图布信等人的热情欢迎。代表们也向这些领导详细汇报了本旗全面情况。通过这次会议，代表们对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有了进一步认识和理解，消除了他们过去的种种猜测和疑虑，坚定了跟共产党走的决心。这次会议向各旗代表具体部署了三项工作任务：其一，各旗保安部队要继续维护本旗政权机关和人民群众的安定；其二，旗府各级官员要坚守岗位，履行各自的职责不得懈怠；其三，加强社会治安，围剿土匪散兵。会议结束时中共乌兰察布盟盟委还通过代表分别给巴司令和陶协理专门带了一封公函。

陶协理听了会议精神的汇报和阅看了给他本人的信函后，精神大振，立即与旗府各级大小官员，着手落实会议所部署的各项工作。他一边组织传达会议精神，一边还和大小官吏磋商，使旗府大小官员对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有了一定的了

解，消除了顾虑，使他们安心工作。

后来，乌兰察布盟会党的工作委员会，又一次召开所属各蒙旗各族人士座谈会，东公旗又派出宝音吉日嘎拉、宗教界代表嘎拉曾、青年界代表阿拉坦敖其尔等人出席了会议。

（三）绥远省人民政府、绥远省军区和中共乌兰察布盟会工作委员会，于1949年12月又联合召开了一次各旗军政负责人会议。这次会议，东公旗主要负责人巴云英、贡嘎苏荣、吉仁太、陶德吉日嘎拉等人都前往参加。在这次会上又一次听取了各旗全面汇报，还请各地代表进一步表示了态度。同时，这次会议围绕筹建各旗民主政府一事进行了协商。会议决定陶德吉日嘎拉为乌拉特东公旗民主政府筹委会主任委员。

1950年7月，乌拉特东公旗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并任命陶德吉日嘎拉为人民政府旗长，辛玉同志为中共乌拉特东公旗委员会书记兼人民政府副旗长。

当年11月，陶德吉日嘎拉和那木海若喜二人作为本旗代表，参加了由绥远省人民政府统一组织的各蒙旗少数民族参观团。他们到北京、上海等地参观学习后回到归绥市，乌兰夫、哈丰阿、王再天等领导接见了所有参观团成员，并发表了重要讲话。

通过这次参观访问，陶德吉日嘎拉开阔了眼界，从思想作风、工作态度上都有一次飞跃，特别是受到省党政领导接见，并聆听他们重要讲话以后，他的政治立场更加坚定，对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有了更深刻的体会。记得，他到外地参观访问回旗以后，在所组织的汇报会、座谈会上，都深有体会地说：“共产党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各民族各阶层的利益的党。是为解放全人类、全心全意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党。我们大家从今以后，一定要听从共产党的领导，按照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任务，更加努力工作。”从此以后，陶德吉日嘎拉更加勤奋地坚守在自己工作岗位上，带领全旗人民积极参加镇压反革命和生产建设运动，做了不少有益于人民群众的工作。

遗憾的是，在1952年开展的“三反”运动中，他被个别不怀好意的人所陷害，一时想不通，自缢身亡。

当时在盟里参加会议的旗党委书记辛玉同志得知这一不幸消息后立即从会议中途返回到旗里，亲自到陶旗长家里表示慰问，并且非常懊悔地说：“如果我本人要是在旗里，决不让出现这种令人遗憾的事。”并且他还代表党组织和全旗人民，对陶德吉日嘎拉一生做了较公平的评价。他说：“陶德吉日嘎拉同志，虽然在运动中遭受

不公正的批判斗争，一时想不开上吊身亡。但他决不是反革命分子，他是一位为党和人民做了很多工作的好同志。”

写到这里，笔者认为，陶德吉日嘎拉虽然出身于旧社会名门贵族，但他的成长过程和他的为人以及他从日伪时期开始身居要职，以至他在解放初期担任新中国一旗之长期间，基本保持了朴实忠厚、清政廉明、秉公为民的好作风；他也是一个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亲自领导东公旗人民、诚心接受和平解放的人；而且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人民政府以后，为党为人民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的人。

现在追述其一生主要事迹的目的，仅是对后人研究考证历史人物提供一点具有参考价值的资料而已。但人故时迁，年长日久，难免有谬误之处，在此竭诚欢迎当事者和知情人，予以修正和补充。

忆乌拉特中公旗协

理——巴图毕力格

孟克松布尔

巴图毕力格于1914年出生在乌兰察布集会乌拉特中公旗东苏木第四太吉、名誉管旗章京、官仓大余太土地管事——乌兰格日勒的家中。

1922年，巴图毕力格八岁时，他父亲从乌拉特西公旗为他请了家庭教师，教师的名字叫希日布。巴图毕力格从师学习六年蒙文，由元音字母开始，系统学习了“神经”、“开巧的锁”、“故事的海。”

1928年巴图毕力格十四岁时，又聘请乌拉特中公旗官仓经管农业税的官吏侯小武为老师，学习了三年汉语文，通读四书五经，被培养成为蒙汉兼通的、年轻的知识分子。

1931年，巴图毕力格17岁时，任本旗旗衙门轮流执事的秘书，对于抄写、起草公文和呈报书札等笔墨工作比较精通，经常接触旗里的章京等

大小官吏，直接参予处理旗衙门有关事宜。耳闻目睹了当时乌拉特中公旗封建王公贵族的腐化堕落，人民群众的贫困生活及上下层之间存在的尖锐复杂的矛盾和各种社会弊端。这些情况，对刚刚步入社会的巴图毕力格的思想触动很大。

巴图毕力格任旗衙门秘书期间，旗王爷林沁僧格接到上级让其二儿子到省府学校学习的通知。林沁僧格不愿让儿子离开自己的身边去省府上学，而是从土默特旗请来懂蒙汉满文的，名叫法付利的人，给儿子教书。这对于巴图毕力格来说又是个好机会，他帮助这位老师整理书籍、批改作业的同时，还跟老师学习满文，蒙汉满文翻译，诗歌、写作知识和法律、哲学知识等，巴图毕力格孜孜好学的精神，使他在很短的时间内成了一名正派的有知识的人。

巴图毕力格任中公旗秘书工作共七年，这期间也是中公旗赋税加重，战事频繁的混乱时期。他生活在如此环境之中，他经常考虑的是如何正确处理旗扎萨克遇到的各种麻烦事情及在官吏章京和人民群众产生尖锐矛盾的时候他应该站在哪一边。

巴图毕力格性格温和、平易近人，尊重长辈，无论官吏、富人与平民，他都友好相处。所

以得到上级和下级的好评，人们的尊重。1934年他二十岁的时候，德穆楚克栋鲁普在百灵庙召开“远东绥靖省集会旗委员会”时，巴图毕力格被本会选为干事，在百灵庙工作，1937年他被选拔为乌兰察布集会衙门财政处会计。

1939年夏，中公旗旗协理那顺敖其尔在绥远省因病去世后，1940年初旗衙门报请乌兰察布集会首领达日罕贝拉旗东贝沙希日布道尔吉批准任命巴图毕力格为乌拉特中公旗协理。是年旧历正月二十日乌拉特中公旗召开启印集会，管旗章京策布格扎布当众宣布了旗协理的任命公文。这样，只有二十五岁的巴图毕力格戴上珊瑚红顶戴接受了旗协理的职务。

旗协理上有扎萨克王爷、下有苏木章京，是当时旗衙门处理政务的重要官员，他负责管理官仓管家及部队、警察、工商、税收工作，处理刑事案件，还要同其它旗衙门、乌兰察布集会衙门，绥远省政府，及国民党中央有关单位联系洽商有关事务。

巴图毕力格任协理期间，乌拉特中公旗的社会状况十分复杂，当时日本关东军已入侵到中公旗的灰苏陶勒盖、达拉额贺河，日本军政顾问掌握了旗衙门章京的权，直接插手军政要事，管理大小一切事情。旗衙门被迫接受德穆楚克栋鲁普仿

蒙政府百灵庙的领导。国民党政府还派收各种纳贡和税款。与此同时，土匪猖獗社会混乱，旗扎萨克王爷、章京们无法进行正常的政务工作。由于国民党和日本人的残酷掠夺，奸商的无情剥削，加之自然灾害的不断侵袭，美丽富饶的乌拉特草原失去了原来的面貌，广大牧民群众情绪低落，在自己的故乡无法生存，只好经常搬家走敖特尔，有的到阴暗山沟或杳无人烟的地区隐居生活。即使如此也逃脱不了抓丁当兵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境地。因此，全旗牲畜头数日益减少，人民群众生活极度贫困。过去那种五畜兴旺发达，人民安居乐业的美好向往已全部化为泡影。

年轻的协理巴图毕力格面对这些情况，除了感到痛心外，也激发了他拯救家乡的热情，他同其他章京们一起商议，拟定了一整套施政方案，并在困境中做了一些值得忆述的事情。

一、周旋各方，维持旗政

1940年4月，巴图毕力格赴陕坝，亲自拜见傅作义驻陕坝警备司令部的秘书长，汇报了乌拉特中公旗两派互相争斗残杀和牧民群众生活日益贫困等问题，部队白首长说：“我们是在傅作义将军率领下，保护你们旗的官吏富户、牧民群众，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夺回失去的地

盘。再不能扩大日本占领地区，更不允许他们横行霸道。我们在必要的时候要增加部队，坚决给予打击。你们旗的部队、警察必须积极配合进行作战”。

巴图毕力格协理为了阻止日本兵、伪军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烧杀抢掠，采取了周旋应付和明谈暗斗等方法，减少了各种势力对中公旗人民群众的骚扰，缓和了某些矛盾，如对各方面指派的税收、骑乘、肉食，采取了由旗衙门统一征收，分期分批交纳的决定，使人民群众减少了损失。

二、改基础征赋为头只征赋

1940年秋季集会上，巴图毕力格协理，决定对全旗人口和牲畜头只挨家挨户进行一次全面统计。他认为，几百年来遗留下来的基础征赋方法脱离现实，弊病太多，必须改变。人口和牲畜数由于各种原因处于经常的变动之中，有些户人畜双增，有些户人虽在牲畜却减少了，还有些户，人还在牲畜已经没有了。个别户，帐册上有名，人却早已搬迁。寺庙的牲畜头数也混乱不清。根据以上情况，巴协理决定，向各苏木章京发出在冬季集会时以全旗六个苏木为单位，挨家挨户统计人口、牲畜的通知。到冬季集会时，据报上来的数字汇总，全旗共有八千多人口，几万头大小

畜。据此把寺庙的牲畜和富户放苏鲁克的牲畜单独分开，然后根据每户的牲畜实有数，制定出向旗交赋的新的头只制度。对于特穷户，无论是太吉、贵族，还是平民百姓，需要免除征赋者，都必须让扎萨克王爷林沁僧格批准。执行头只征赋制度后，减轻了人民群众的负担，得到了人民的拥护。

三、统计官仓牲畜，改变诺颜的肉食常规

协理巴图毕力格带领官吏，亲自统计官仓的大小牲畜后，知道了官仓畜群里有不少老弱病残牲畜，应及时处理。

过去，乌拉特中公旗每年从六个苏木征赋360只小畜，6头牛入旗官仓。巴图毕力格报请扎萨克王爷林沁僧格批准后，减少为从六个苏木每年只征赋150只小畜，3头牛。

当时，扎萨克王爷有每天不吃过夜羊肉的习惯。这个惯例在巴图毕力格的劝说下从一天杀一只改为七天杀一只，如有特殊情况需要增加时，从官仓羊群中补充肉食。当时就让管家们执行了这一决定。

四、统一税收，减轻群众负担

当时，乌拉特中公旗以苏木为单位向国民党

方面和日本方面都要纳税。纳税中有粮食、肉食、军骑、羊毛、役畜。经过多方协商，巴图毕力格改变了以苏木为单位无限度地交纳赋税的制度，执行由旗衙门统一收税，有手续地交给双方的制度，防止了日伪双方以征税为名无限度的敲诈勒索和各级官吏借机盘剥人民的事情发生。

五、改善交通运输条件

自古以来乌拉特中公旗的长途运输，主要靠骆驼。为了改变这一落后状况，巴协理报请扎萨克王爷批准，从旗衙门和供销社收入中筹措了部分资金，给扎萨克王爷购回一辆“百吉惠”汽车，同时还购回了“都节业卡”、“斯特发卡”、“秀分林”、“陶谣拉”、“福二”等十来辆货车，培训了若干名青年司机，驾驶着汽车走南闯北，把畜产品运输到呼和浩特、百灵庙、包头、陕坝、五原等地，又从这些地方运回粮食、货物，卖给当地牧民群众，保障了人民群众生产和生活的需要。

六、军队整编为“苏木军”

1940年5月，巴图毕力格协理把三路军整顿为一个连，任命宝音巴达拉呼为连长，由旗衙门直接指挥。其中三路军每支队伍安排30名

士兵，西路军队长由敖日布担任，中路军队长由塔什斯日古楞担任，任命孟克图斯日古楞为东路军队长。把三路军分别安排在依玛吐、川井、旗东部地区，每个队配备两顶蒙古包，军队着墨绿色服装，配备手枪、骑马。士兵佩带一线一星，士兵长佩带一线二星，队长佩带一线三星，连长佩带二线一星。

军队改制后加强了纪律，规定没有指示不准参加战斗，不准冤枉误杀好人，不准调戏和奸淫妇女，不准有偷盗行为等等。对于那些年老体弱，家中无劳动力的军官士兵给了长期假，并规定官兵均可轮流探家。采取这些措施后，不仅受到广大官兵的热烈拥护，而且震慑了远近各股盗贼的抢掠害民行为。

七、掌握伪蒙骑兵部队的指挥权

1940年8月，驻乌兰察布集会的日本军事顾问，把伪蒙第六骑兵部队分别调往乌拉特中公旗杭盖诺其的日本特务机关和温根特格边防地区。

这些兵在中公旗范围内举着集会衙门的旗帜，横行霸道，抢夺财物，奸淫妇女，乱派骑乘，乱杀牲畜，并且同旗苏木军经常发生冲突。巴图毕力格协理为此亲自到乌兰察布集会，会见

日本军事顾问，向他反映了第六骑兵队的恶劣行径，要求他们撤回军队。日本军事顾问害怕引起更多的矛盾，除向巴图毕力格说明向中公旗两个地区派兵是上级军事部门的指示外，并宣布第六骑兵部队接受乌拉特中公旗指挥，完成各自的任务。这样才使第六骑兵的官兵们老实了一个阶段，一直到日本投降为止。

八、让边境地区牧民的子女上学读书

1940年的启印集会上，巴图毕力格协理，宣布了扎萨克王爷林沁僧格的“关于建立儿童、女子学校”的决定，并具体组织落实。将儿童学校建立在川井，女子学校建立在乌布尔苏达拉，派旗官吏宝日为学校校长，选聘了教师及有关人员。

两个学校分别招收四十名学生，旗衙门拨给8顶蒙古包、24头奶牛、240只小畜、骆驼8峰。并且统一制做了学生们的冬夏服装，学生帽上统一缀上“乌拉特学校”的字样。儿童、女子学校夏、秋两季上课，冬、春两季放假，教师、学生的伙食及办学经费由旗衙门统一供应。

1941年，为了躲避战争危险，将两校搬迁到本巴太上课。搬迁不久该地突然发生传染病，有些学生不幸死亡。巴图毕力格协理亲自到包头请

医来校治疗，控制了疫情，把大多数儿童从死亡线上拯救出来。

1942年儿童学校搬回川井，女子学校设在扎嘎沟。1944年由于形势恶化学校被迫停课，直到1947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又在本巴太重新开学。1950年时该校日益兴旺，发展成一所完全小学，后搬迁到乌拉特中后联合旗首府海流图。

这所学校多年来培养了大批学生，有的升入中学，有的还上了大学，其中不少人成为社会各方面的有用人才。

九、限制奸商剥削，成立供销社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乌拉特中公旗以前，全旗共有一百六十多个商业字号和门点。旗府每年向大一点的商号收税60元，小商人每年收税30元。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公旗以后，许多商号纷纷向关内迁走。因此群众生活用品短缺，一双马靴值一匹马的价钱，一匹马只换一石五斗粮食。根据这种情况，为了使牧民的畜产品能卖得出去，群众需要的生活必需品，又能买得回来。巴图毕力格协理，同齐布格扎布等人商议，决定成立供销社，经报请绥远省财政厅和伪蒙古乌兰察布集会批准，在川井建立了供销社。

建立供销社的资金是通过以下渠道筹集的：从牲畜较多的富裕户中收集500元，每个牧民收交5元，各大寺庙也都收取了适当的现金，另外旗衙门自己也拿出3000元。以上资金除购买各种商品外，还购买了一辆货车，从呼和浩特、百灵庙、包头等地区组织货源运往中公旗。

旗里委任参事齐布格扎布为供销社主任，韩葆为供销社副主任，根顿朝格、阿迪亚、敖门朝格，图布吉日嘎拉、朝鲁、恩和特古斯等人为秘书，巴图苏和、苏德那木二人担负会计工作。

供销社的成立，方便了牧民群众销售畜牧产品和购买生活用品，同时也有效地抑制了奸商对牧民群众的剥削。

十、兴办手工业

一九四二年由巴图毕力格协理提议，在川井建立了草原自古以来第一个纺织厂。有纺织经验的陶布其、道巴吉、乌兰等三人为师傅，招收六名技工，十名徒工，巴图毕力格协理兼任工厂主任。

厂里，从呼和浩特买回来两台机器，可进行弹羊毛，纺羊毛，织毛毯，织粗布等生产项目。织的粗布和毛毯堆满了厂房。

1944年国民党所属袁才部队趁打日本特务机

关的机会把纺织厂生产的粗布和毛毯全部夺走，这个工厂就倒闭了。

十一、处理王贵事件

王贵是个国民党的特务。1944年，他带着董其武的手令声称要在乌拉特中公旗东升沟建立国民党保安司令部，雄努栋日布任司令，王贵任排长，接受傅作义指挥，并要求从乌拉特中公旗征购600匹马、8000只小畜、一万张羊皮，上交国民党政府，再从国民党政府那里换回大米、白面。

巴图毕力格协理接此手令后，经研究后向王贵说：“我们旗衙门召开集会商议这些东西要分批才能交上去，上级拨来的粮食运来时，在东升地区正式交换”。

巴图毕力格协理当时对“手令”没有产生怀疑，所以按期交了第一批牲畜、羊毛、羊皮，王贵却借各种各样的理由，没有交付应换的粮食，让骆驼空返回来。

原来王贵给旗衙门的“手令”是伪造的。王贵借这个名义，在东升建立伪保安司令部，企图把司令部变为制酒和做生意的基地，大量经营粮食，从中牟利。

巴图毕力格协理得知上述情况后，派旺扎

布、鲁峰二人带着衙门公文去王贵的所谓“司令部”追查此事，王贵信口雌黄，蛮横无理地乱说一通，二人只好返回。几天后，孟和图斯日古楞得知，王贵带领30多个骆驼到山北做买卖的消息后，立即派兵前往抓住王贵，并将骆驼全部送往旗衙门。巴图毕力格协理从王贵的30个骆驼所运货物中扣除了拖欠的粮食，然后将王贵及其骆驼放走。中公旗军队对此搞不通，想把王贵重新抓回，但被巴图毕力格制止了，他说“军人的事情还是由军方处理为好。”

随后，巴图毕力格协理亲自拟写公文让孟和图斯日古楞赴陕坝向傅作义的“警备司令部”揭发了王贵的诈骗行为。“警备司令部”查明情况后，依法逮捕了王贵，解散了伪保安司令部。乌拉特中公旗也收回了向他们交送的牲畜和羊皮。

十二、旗衙门计划迁移川井

1942年在启印集会上，巴图毕力格协理提出旗衙门搬迁川井的提议被通过后，由齐布格扎布负责实施。

原计划旗衙门建三排共33间的大瓦房，其中包括旗衙门、学校、供销社、手工业社、驻军房屋等。形式模仿城市的建筑刚刚施工，由于

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上了乌拉特中公旗，抗日战争的烽火燃烧到边塞草原，施工被迫停止，以后再也没有重建。

十三、巴图毕力格成为国民党立法委员

1948年3月份，绥远省政府向乌兰察布集会衙门下达通知，在重庆召开国民代表大会，代表必须带去选举蒋介石为总统的万人选票。乌拉特中公旗决定让巴图毕力格协理参加。

当时，乌拉特中公旗全旗不到万人，为了凑够万人选票，只好伪造了些“锅、碗、铲”等名字。选票呈报绥远省政府后受到省高级官员的表扬和热情招待，并有专人陪同乘飞机飞往重庆。在这次会议上，巴图毕力格协理被选为伪国大“立法委员”。“立法委员”是个有名望无权力的空头职位，巴图毕力格利用这个地位，极力维护乌拉特中公旗的地方利益，加强了社会治安工作，使土匪和盗贼不敢轻易骚扰社会，同时国民党政府方面也减少了一些苛捐杂税，这对家乡人民是有好处的。

十四、妥善处理商人李民德事件

李民德是个包头商人。1945年夏天，他由中公旗返回包头，途中路经杭盖努其时被日本特务

机关发现。日本特务派当地牧民丹巴拉布吉和拉卡拉克吉二人领路，在阿拉坦布斯庙北拦截李民德，互相之间发生搏斗，李民德等六人被打死，只有一个秘书逃回包头。李民德的家人知道李被害的消息后，因怕日本人而没有追查这一人命案。

1945年日本投降退出中公旗，1946年夏国民党军队重新占领中公旗。这时李民德的家属纠集了几个人，到现在温根苏木哈日朝鲁嘎查的塔兰胡都格，找到丹巴拉布吉之哥布恩布日根家，抓住布恩布日根整夜严刑烤打。后经商人陶日苏格从中说情才放了布恩布日根，但李民德家属要把布恩布日根的全部家产抄走。

巴图毕力格协理知道此事后，为妥善解决这一纠纷，特在旗衙门宴请李的家属，并且请来当地几位有名望的人士，共同讨论解决李民德等人命案件。讨论中双方各执己见，发言偏激。李的家属说：“这个案件，关系到六条人命，几峰骆驼物资财产的事，一定要让顶命赔钱。”巴图毕力格协理从中调解说：“人命案虽然发生在我们地区，但日本特务杀的人，这个事件应由日本人负责才对，日本人在时你们不来追查，日本人走了你们却来追查人命案，这是为什么呢？”

李的家属抓住丹巴拉布吉和拉卡拉克吉曾经

为日本特务带过路不放，要求二人顶命。巴图毕力格协理最后代表旗衙门作出决定，丹巴拉布吉当时被迫为日本特务领路牵连到人命案，所以布恩布日根代替他弟弟赔偿两个头饰用具和两千块银元。双方同意后共同签字了结此案。布恩布日根当时没有那么多钱，后来由他在包头结交的苏联商人然苏替他归还了欠款。巴协理在任期间，还比较妥善地处理了商人罗贵珍诬陷收税人员和喇嘛巴拉登宁布随意动手打军人等事件，受到群众的称赞。

十五、主持公道，直言批评格斯贵

1944年冬，巴图毕力格协理因事到中公旗旗寺庙昆都伦庙巡视，恰逢庙里晚上的古里穆（一种宗教活动）集会。

当天夜晚，寒风刺骨，古里穆在庙外召开，小喇嘛衣着单薄，冻得难以忍受，巴图毕力格在现场看到这种情况后，让立即停止古里穆活动。并找来格斯贵（掌堂师）严肃的劝导说：“昆都伦庙有许多大殿，还有各地施主们捐献的许多罩裙（喇嘛穿的），为什么不许徒弟们在大殿里集会，十冬腊月，冰天雪地，衣着又那样单薄，在庙外念经冻病了怎么办？今后要减少集会，尽量不要在庙外开会，不能打骂徒弟，掌握宗教大权

的格斯贵要特别注意这些事情。”从此之后，昆都伦庙减少了寺庙的古里穆，冬天也不在庙外集会了，喇嘛都穿上了罩裙，巴协理的这些作法，受到下层喇嘛的称赞。

十六、改变昆都伦庙靶地的出租办法

1944年春，巴图毕力格协理去昆都伦寺庙，把经营寺庙靶地的韩贵、四贵、高贵、喇嘛贵等四户（类似于农村的二地主，包下寺庙靶地再出租给别人）同本庙管家喇嘛一起叫到衙门仓里，严肃地向他们说：为了增加寺庙收入，各经营户必须按时交租，新的出租制度规定，收入按三七分成，即每年收入的70%交给寺庙，30%归经营主所有。新的出租制度引起了个别经营主的不满。经营主韩贵，带领其家属和佃户及左邻右舍的人，手拿铁锹、木棒，跑到昆都伦庙，扬言要打死巴图毕力格恢复原来的出租制度。巴图毕力格出于无奈下令逮捕了韩贵，并把韩贵经营的土地全部收回，另行租给他人种植。

新的出租制度结束了二十多年昆都伦庙从靶地吃不上粮食的情况，那些土地经营主接受韩贵的教训比较老实起来，能按时按量及时交租了。

十七、重新制定山旱地区土地、煤矿、砖瓦厂的租用制度

1944年夏，巴图毕力格协理同旗衙门土地经营主、煤矿主、砖瓦厂主和手工业主商议，废除了沿袭20多年的山地租用制度。根据新的情况，在照顾多方利益的基础上制定了新的租用制度。当时因为有了韩贵事件的教训，双方毫无争议地在新建制度书上签了字，一直执行到解放。新租用制度的主要内容如下：

1、经营土地的年收入按三七开的比例分配，三成归经营主，七成上交旗衙门。此项工作由旗军队团长朝鲁代表旗衙门督促双方立约签字上交衙门。

2、煤矿收入和砖瓦厂的收入按对半分成。此事仍由团长朝鲁负责，办好双方手续，送到指定的地点。

3、什兰计、策格利、刘苏渠、敖兰宝力格等地的土地全部收回，执行新的制度。

4、出租土地收缴回的粮食，做为军队和学校用粮之需，其余部分供给牧民。

十八、举行和平起义

1949年7月4日，巴图毕力格协理接到

乌兰察布集会工作委员会的沙木腾大喇嘛、玉新给他的关于举行和平起义，欢迎解放自己故乡的信。他同送信人员谈了好长时间，才让他返回去。

巴图毕力格协理拥护和平起义的有关事项。他同旗衙门的韩葆等人商议了具体办法，让韩葆负责筹集粮食，巴自己负责召开旗集会的筹备工作。派那木吉拉策仁、米兰赴乌兰察布集会送去欢迎和平解放的信件。

乌兰察布集会工作委员会留下那木吉拉策仁和米兰二人，让他们参加庆祝“九·一九”和平起义的准备工作。7月22日再次写密信请巴图毕力格协理亲自赴盟。当时巴图毕力格、韩葆正忙于准备迎接和平解放的筹备工作而没有去，派了陶格陶胡、明珠尔、达瓦三人前往。他们三人同以前去的两位见面交换了情况，于是五人均留下参加和平起义庆祝大会。

巴图毕力格协理亲自参加了国庆典礼，并被任命为乌兰察布盟建设委员会主任。

巴图毕力格协理的一生是从黑暗的社会里寻找光明，追求公正，同各种邪恶势力作斗争的一生……

忆原伊克昭盟达拉特

旗杭锦办事处

黄继民忆述 查干莲花整理

一、那顺德力格尔其人和杭锦三区办事处的建立

日本侵略者占领包头以后，美丽富饶的达拉特草原，在日寇铁蹄的蹂躏下，狼烟四起，人畜遭殃，各族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当时达旗王爷根登道尔吉及其管旗章京那顺德力格尔，慑于日伪军的淫威，只好依附于日伪政府，周旋应付，维持旗政。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鬼子投降，追随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的王公贵族纷纷回旗，继续维持他们的封建统治。那顺德力格尔也返回旗里继续担任管旗章京之职。不久老王爷根登道尔吉病逝，其同父异母兄弟王鹏程（音译满族福晋所生）继位。王集军政财大权于一身。随之，那顺德力格尔管旗章京之职亦被免去，他无所事事，只好在家闲居。

当时的那顺德力格尔年已半百，中等个子，面黄肌瘦。他生于柴达木区一家普通牧户，生性随和，是一个稳重踏实兼通蒙汉两种语言文字的人，并且自幼入王府，先后任见习笔贴其（秘书）、笔贴其、管旗章京之职。由于有一定的办事能力，深得同事们的赞许。王鹏程继任王位后，随心所欲，专横跋扈，但对那顺德力格尔这些老臣长期闲置很不放心，于是决定将那顺德力格尔派往多年无人管理的杭锦三区任办事处主任。这样既能置这位老臣于远处，避免在其身旁碍手碍脚，又可使长期无人管理的杭锦三区，置于自己的管辖之下，达到一箭双雕之目的。

那顺德力格尔即刻奉命赴任，随身只带了丹薄仁、白三喜、杜占三等几人，从树林召出发到了杭锦三区。

杭锦三区分为左中右三区。这块肥沃富饶的草地，早在清朝道光二十九年，达拉特旗图门巴雅尔王在位时，朝廷就逼迫达旗王公贵族分别以《永久租用》的名义，割去两千多顷土地；以《四成征地》为名割去一千二百二十八顷土地；以《四成保地》为名又丈出一千四百二十顷土地开垦种田。致使祖祖辈辈在黄河两岸这块富饶而美丽的草原上辛勤耕作务牧、休养生息的杭锦三区的牧民，背井离乡，迁徙他处。其中不少牧户

为了生存，迁到阿拉善、额济纳、乌拉特中后旗、乌兰察布和达茂旗等地。在这种官逼民迁，流离失所的困境中，牧民有理无处说，有冤无处诉，官逼民反，伊克昭盟地区以那木斯来为首，组织牧民群众，掀起了一场以抵制乱屯滥垦的独贵龙运动，其声势愈来愈大。那顺德力格尔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奉旗王府之命，仓促赴任，他到达顿金美林旧居（佟家圪梁）后，即搭起蒙古包，招收当地有识之士，着手开展河套杭锦地区办事处的筹建事宜。首先设置了杭锦办事处政务室和保安队。那顺德力格尔自任主任，委任张英枫为秘书长，同时委任黄继民为政务室主任，达力巴拉为保安队长，唐世宗为后勤总管，随即开始了管辖之内的行政事务工作。

二、缓解土地纠纷和农牧矛盾，征收土地租金和农牧业税款

那顺德力格尔筹建河套两岸办事处一事，开始当地三区从开明人士到贵族平民抵触情绪甚大，纷纷起来反对，因此工作进展非常缓慢。但是，由于那顺德力格尔多年为官，深明大义，经验丰富，尽管外来压力甚大，冷嘲热讽很多，他却表现得胸有成竹，顶着各种阻力，努力去完成自己的使命。他亲自带领办事处员工，深入三区各

地，走访牧户，同德高望重的老者座谈，争取他们的理解。接着对杭锦三区所属各家各户的草牧场、各庙宇的属地等均一一登记，详细造册。与此同时专门发出布告，呼吁那些因屯垦而离乡背井的老住户返乡建设家园，宣布废除原来强行制定的不合理的土地牧场条约。重新签发了以每家每户的人口为依据的草牧场使用证。

当时，杭锦三区所有土地，几乎全都控制在汉族中上层地主手中。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与国民党军政上层人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个个背后有靠山。因此这些人起初根本不理睬办事处所发布的通令，各霸一方，我行我素，甚至到办事处挑衅滋事。如杭锦左区白音查干苏木的地主白××，亲自出马到办事处滋事起哄，声称要收回他的土地。紧接着台吉四斤半、恩和布仁等人亦先后到办事处纠缠不休，执意索回所谓归他们所有的土地。事实上是因原达旗平民巴音查干的祖先曾在达拉特旗王爷府供过职，待他卸任回乡时，王爷念他多年为王府尽忠，责成管家领他用“跑马里”的办法，驰马挥鞭为据，拨给他近万亩水草丰盛的一片牧场。到了清末民初，有位姓白的旅蒙奸商同巴音查干祖辈结盟拜弟兄，向巴音查干祖辈连求带骗索取到了一大片土地。那位奸商骗得土地后自己根本没有种植，而是从内地招来

一批农户经营，他坐吃地租，从中渔利。所以办事处筹建以后，巴音查干就到该处诉状，要求索回祖先留给他的土地。在他的启示下，有很多的牧户纷纷响应，到办事处上诉，要求解决土地纠纷。

据此，杭锦办事处派出专员到当时的五原县公署为民请愿。然而五原县公署不但不接受诉状，连杭锦办事处都不予承认，将办事处派去的专员赶出公署。这事发生后更加激起了杭锦办事处所有人员誓将土地索回的决心。他们想方设法查阅了白风悟所持土地使用契约，发现白所持土地使用契约上赫然写着：“蒙人租出土地后不得随意收回，如果租方不愿种植可退回原租主。但每顷地必须以七十亩计算收租，租金二两五钱白银。丈量所种土地每百亩以七十亩计算，每丈量一亩，出租土地者（蒙人）必须向租方交纳丈量费15元。”显然，按照此契约出租土地的蒙方，连年向租用土地的汉族地主所收回的为数不多的粮食、土豆、萝卜等，加起来利滚利，最终出租土地的牧户，反倒成为一个还不完帐的负债户。

当时住五原县当铺地任国民党党部书记之职的白××，此人在好尼其（地名）租有大片土地，雇农民种植。他越是暴发越是利欲熏心。一九四七年开耕种地时，公然提高土地租金，提出谁租种他的地，春耕前必须先交纳100块银

元，否则，不管租种多少年，也不管熟地生地，一律收回转租他人。

在此农牧矛盾和地主与雇农的矛盾日益激化的关头，杭锦三区办事处以政务室主任黄继民为首的人员，深入到那些挣扎在生死线上的贫苦农户中了解情况，说明原由，发动他们团结牧户百姓一道展开收回土地、减租减息的斗争，并取得了初步的胜利。到一九四七年春耕季节，白××得此消息后，不甘心把嘴边肥肉让人拿走，他亲自带领全副武装的伪军和四十杖犁、耩，来到他所租的地盘，威胁那些手无寸铁的雇农户：“谁如果阻碍他种地，就把谁抓起来。”看到他那种嚣张气焰，全村男女老少无不义愤填膺，不约而同地赶到田头，其中一些年迈长者，人人手提绳索，面对白××的淫威毫不妥协，针锋相对地说：“我们人老了，活不了多少年了，即使想多活几年，你白××也不让我们好活。要把我们多少年用血汗浇灌务艺起来的土地霸占收回去，我们就在你白大官人面前，一同到阎王爷那里去告你！”他们边叫骂边用自带的绳索缠住脖子，以示决心。另一方面，全村所有妇女儿童一齐出动，横躺在田间，挡住白××所带来的四十杖犁耩，不让他们耕种。青壮年们则动手与白××的兵卒及种地人打了起来。这样双方继续对待下

去，必然发生流血事件。面对这一切，白××心虚了，怕事情闹大担当责任，不好收场，无可奈何之下，他带着人马，灰溜溜地撤了回去。白××看见硬干不行，又采取软磨的办法，跑到杭锦办事处，找黄继民，求他出面调停解决土地纠纷，这样正是杭锦办事处所求之不得的。

黄继民等人亲自着手处理这一问题，向白××指出：“你所出租的土地，实属我们蒙旗土地，理应全部收回，如果你想继续租借，必须交原租户种植，而每种一顷地以70亩计，其中25亩土地的收成交蒙旗牧户。”白接受了这一条件。所以杭锦办事处直接出面，将他租占的土地以租户人口为据，一一丈量，重新签约租给了贫苦农户。这样既平息了地主与雇农之间的纠纷，又解决了失去土地、多年游牧而生的当地蒙民的生路问题。

经过这一斗争的初步胜利，杭锦三区办事处在工作上，不但站住了脚，而且还打开了局面，顺利地颁布了本地区农牧业土地、草牧场的使用权及租金、税收等许多规定，并得到有效地贯彻执行。

这些规定的主要内容有：

农户每租种一顷地，每年必须向办事处交纳三十桶（斗）粮食以抵租金；牧民每年每百头

(只)牲畜交纳二头(只)以抵税金。

蒙民年年向旗里交纳税金，早已成为规矩，可汉人在这儿种地，他们往往以已向傅作义将军交了税为由，拒不向旗里交税，这一规定颁布后，汉人抗税情况得到了改变。

三、办校兴学

杭锦三区办事处成立之后，在它所辖区逐渐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和支持。由于办事处的工作和努力，农牧矛盾初步得到缓解，社会开始安定。特别是发放土地、草牧场使用证以后，人民群众更是安居乐业。就连那些多少年来以租种借口抗税、偷税的人也开始按期交纳税金和租金了。因此办事处开始兴旺起来。

他们用所收缴的租金、税金和粮畜，除解决本身员工费用外，先后建起了三座小学，使祖祖辈辈目不识丁的贫苦农牧民子弟，也有了读书识字、学习文化的机会。

杭锦办事处在所辖三区各筹建了一所小学。其中右区学校建在沙拉德布庙上，共收蒙汉族学生40多名；中区学校建在杭锦办事处所在地，即佟金美林旧址，招收学生七八十名；左区学校建在杭锦左区左侧，招收了四五十名学生。学生的学费、伙食费均从当地税收中支付。前后共培

养出几百名学生，为本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造就了一批人才。

在中区除美林庙、拉僧庙、宝力格庙（圣庙）以外，还有三个庙宇都有自己的养生地（即自留地），有的庙宇还有草牧场和向外出租的土地，但这些庙宇不仅不按照杭锦办事处的规定缴纳税金，往往还要刁难办事人员。办事处随即又设立了班禅召土地管理所，派四老虎负责税收等管理工作。四老虎手下有十几名兵丁和几杆枪支，由于他胆大心细，肯动脑筋，勤于办事，妥善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到1949年办事处建起三十多间土房，拿出几间房子，聘请了六七名教师，办起了学校，招收了百十多名学生，从这所学校毕业的学生大多数成为建国初期基层干部。

解放前夕，筹建办事处的元老那顺德力格尔已经病故。但他在三区办事处的政绩，却在历史上留下了值得记述的一笔。

解放以后，将杭锦旗“三百”改为杭锦三区，归属达旗后分别为十一、十二、十三区。原杭锦三区办事处和晏江县合并为达拉特后旗，旗府所在地设在塔尔湖木头，即现在的五原县塔尔湖镇。从此以后杭锦三区又开始了新的里程。

阿贵庙史略

白生华

阿贵庙，即宗乘寺。位于阴山山脉西部，额勒斯太沟和格日敖包两山口中，有阿贵山口，山沟正中有座蒙古包形状的宝心石，向里弯弯曲曲行程八公里处有占地一千亩左右的雄伟壮丽而结构紧凑的藏式建筑群，这就是享有盛名的阿贵庙。据载，公元774年就开始有了藏传密教的活动，截至现在已有1200多年的历史。殿堂庙宇始建于清朝嘉庆年间，即公元1798年。后由清庭理藩院改名为宗乘寺，并给过“满、蒙、藏、汉”四种文字雕刻的“宗乘寺”字样的大匾一块（匾到阿贵庙是黑鼠年即1912年）。从此被列为阿拉善旗八大寺庙之一。最盛时期喇嘛有400多人，解放初有喇嘛240多人。阿贵庙以自然形成的五个奇观山洞驰名中外，其中最壮观的还数阿贵洞（阿贵即山洞）。

1798年也就是阿贵庙第五代活佛韩钦·班地达在位时，由外蒙古莫日更王旗的查汗乌拉庙的第五代诺颜呼图克图（活佛），名叫阿格旺·洛布生丹津·拉布生，他乘给阿拉善旗第四代王

爷王钦班巴日念经之机向他索地建庙，王爷说：我旗东北边界有个叫“哈如纳阿贵”，此地可让你建庙。当时诺颜呼图克图来到山洞查看地形，并决定在此建庙。此人领导建庙事宜很认真，住了两年后才回外蒙，过两年后又来观看建庙情况，并带来“甘珠日”经，即藏文大藏经，此经包含1108种，101部；还有跳鬼面具10付，5尺高佛塔一尊，塑5尺高“莲花生”神像一尊，将神像安放在阿贵洞中央。从这以后施主大增，山沟里建筑群四起，一步步繁华起来了。

阿贵诸洞在莲花生来此时叫“杭瑞玛”阿贵（吉祥天女密），后来由于人们口音的关系，演变成“哈如纳”阿贵。公元1798年始建庙时定藏名叫“拉西仁布·嘎定林”阿贵。清庭改为“宗乘寺”。

阿贵庙五大石密

一、阿贵洞：顺大殿后面宽大的台阶往上约三百米处有一洞门，上写：大阿闍梨密。阿闍梨即轨范师。洞内约200平米，正中供主神“莲花生”塑像。红教派喇嘛们设坛、供养、诵咒、灌顶（传法仪式）就在这里举行。蒙古人叫洛本钦布阿贵。

二、扎嘎日生布密：生神“上乐金刚”。藏传佛教密宗本尊神，其像为双尊，上乐金刚有三

面脸，每脸3目，12臂，主臂拥抱明妃金刚亥母，余臂持物，裸体，下持骷髅珞婴，双足踏人，塑像为上乐金刚与明妃金刚亥母相抱形。

三、达日额柯密：主神双尊，藏传佛教女神，是观音化身的救苦救难本尊。该洞有白救渡佛母和绿救渡佛母塑像，以上两尊为藏王松赞干布所取的两位公主。白救渡佛母是尼泊尔国王的犀尊公主，绿救渡佛母是唐太宗的文成公主。渡母以颜色区分，现为21相，以白、绿渡母最为常见。

四、额尔登珠密：主神，迦楼罗神，即吉祥天女密：是天龙八部之一，是守护佛教的第六天神迦楼罗（金翅鸟），藏传佛教以其为财神，印度教的命运、财富、美丽女神，有“大功德”于众，也叫“功德天”。

五、桑布嘎日布密：主神为护法神，即伽蓝神，守护寺院神的通称，共有18神。

阿贵庙林茂山险，百鸟和鸣、洞密奇特、巧夺天工，环境十分幽静。五大密中阿贵洞最为出名，因莲花生曾在这里讲法，做过法场。如前文所说，此地有妖魔伤害生灵，闹得民不聊生，后来由莲花生使用佛法，神灵把妖魔赶回来镇压在深洞里，为了使妖魔永世不得显出，洞口上塑了莲花生神像，由于莲花生用法降妖，诸神也频繁地活

动于各洞。渡母洞前光滑岩石上有一女人脚印，洪羊洞下有一男人左脚踏下的脚印。相传是仙女及莲花生神在此隐居、修练、降妖时行走的圣迹。

阿贵庙念经供养祭祀时必须要有四个以上经过口授“真言”密戒的喇嘛才能诵法，否则都不得念此经文。祭品中必有酒、肉、葱之类，诵经结束时酒可以当堂分喝，而黄教则不允许在殿堂中喝酒和用酒肉祭品的，所以阿贵庙是内蒙红教派喇嘛保留下来的唯一活动场所。现已被自治区列为12个重点寺庙之一，本庙的史料曾被偷去部分，剩余部分在文革中烧毁一空。

社会上对洪羊洞传说种种，高山洞穴，闻名中外，洞深莫测常常引人入胜。确实，当你上洪羊洞以后自然会感到另是一种境界。顺大沟下行500米左右处的东山腰间有条崎岖盘山小道，从羊肠小道盘旋而上，真如登“天梯”，行约400多米处在陡峭的壁间有一山洞口，便是洪羊洞。即迦楼罗天神的供养处。据传这里有杨业存尸、孟良盗骨，等等许多传说。一进洞口几米处分上下两层，上进下出，进里面下个台阶，据传，阶下有深洞，有大石板盖着，可是没有人考证过究竟有多深，“通藏”是对深洞的夸大。人从石盖上过去再行20多米才能走到大洞的顶端，但里边漆黑，人不掌灯引路是走不成的，洞

里有“红土”，也叫玉光土。信徒们往往取而治病，是蒙医常用的药材之一。

阿贵庙是有独特景色的山林寺庙。从北向南走向的两条弯曲山沟，将这座名山分成三块，山谷汇集成一的三角点上，按山形布局的古刹群。正中是九九八十一间“大雄宝殿”，主供释迦牟尼，上有“宗乘寺”匾额。左右有陪殿，小山沟西侧是红教派本尊达木仁杨生殿，即“马头金刚”殿。“马头金刚”神为宁玛派最崇拜，所以香火最盛，是慈悲观音的化身。又传，妖魔被莲花生征服后变为他的守护神。东西两沟间有大吉沙（招待所）13处，喇嘛住房千余间，东沟有古岩画群，西沟有文冠果林（木瓜）。高入云端的群峰重峦叠嶂。顺沟的山榆林和坡上的奇花异草形成一片葱绿，十分清静，真是山间小屋石作邻，幽间修行仙留地。

这里隆冬赏雪，阳春观花，仲夏清凉，秋叶换装，四季风光各具特色，尤其是洪羊洞以其盛名招引中外香客游人，成群结队的在这里同结香火姻缘，成了磴口名胜之一。

六、阿贵庙及其宗教事务

阿贵庙的宗教活动自莲花生来此地接受第一个信徒洛本赞达日开始的，即公元775年。从洛本赞达日师傅到最后的活佛阿格旺·西达日布·旦

比尼玛止共25代传承弟子，他们是：

第一代师傅：洛本赞达日。

第二代弟子：依西嘎拉生丹津。

第三代弟子：洛布生丹津。

第四代弟子：洛布生旦比拉。

第五代弟子：朝阳那木达格。

第六代弟子：冈齐格·旦比尼玛。

第七代弟子：依西道布敦。

第八代弟子：苏那木尼玛。

第九代弟子：苏那木扎木苏。

第十代弟子：嘎拉生旦金。

第十一代弟子：道布敦尼玛。

第十二代弟子：阿格旺旦金。

第十三代弟子：洛布生·西达日布。

第十四代弟子：洛布生·冈齐格。

第十五代弟子：玛日布·劳金·白·劳扎布。

第十六代弟子：旦比道尔吉·宝地·沙地。

第十七代弟子：彭斯格·玛仁巴。

第十八代弟子：查汗地扬齐。

从查汗地扬齐公元1649年死后，开始“转世相承”的办法，他的第一代转世活佛于1654年接来5岁小孩，阿贵庙从此开始活佛转世制度。查汗地扬齐的第一代转世活佛也就是洛布赞达日师

傳的第19代弟子。

第一代转世活佛：依西道布敦·老来扎木苏。

第二代转世活佛：洛布生·却古·扎拉生。

第三代转世活佛：阿格旺·彭斯格。

第四代转世活佛：旦比扎拉生。

第五代转世活佛：韩钦·班地达。

第六代转世活佛：阿格旺·冈齐格·扎拉生。

第七代转世活佛：阿格旺·西达日布·旦比尼玛。

阿贵庙在寺院管理上同其它寺庙一样，有一定的僧职人员及管理权限。

葛根：转世大活佛，是寺庙的最高首脑。经金瓶掣签，上呈照准后举行座床大典，才能称葛根活佛喇嘛。阿贵庙没有葛根。

沙布仁喇嘛，仅次于葛根的转世活佛，同样经过上述手续。中小寺庙的首脑：

（一）大喇嘛（一般由活佛兼任）掌管寺庙佛事以外的一切政务，需经旗级以上寺庙任命，或王爷府任命。是终身职。

（二）德木齐（俗称二喇嘛）管理全庙行政事务，有处罚权，一般任期3年。

（三）格斯贵（俗称三喇嘛），掌堂师，管

理殿堂内僧众的纪律，手持方形空心铁棒或木棒，维持秩序，违寺规者不论何人他都有权处罚。任期三年。

以上三人称为国之三喇嘛，是处理一切事务时有权威的三个喇嘛。

(四)地博：全庙殿堂内诸佛事的总管。

(五)苏格钦、温则德：念什么经文等的管理者。

(六)吉沙德木齐：某一吉沙(招待所)内日常事务的管家。

(七)苏格钦、格斯贵：管理佛事活动中秩序者。

(八)苏格钦、格亦格：格斯贵助手、执法者，格亦格下有两个查巴瑞，具体办事员。

以上8个主要人物外再聘请德高望重的12人共为20人的苏贡队(即寺庙管理委员会)总揽一切重大事务，大事要事召开全体会议裁决。对本庙喇嘛行使罚吊打等各种封建刑法权。

丹生达：会计长，下有毕齐格齐2人，即会计2人，总揽收支等与帐目有关的诸事。

高尼尔：某一殿堂内佛事活动及殿堂管理者。

拉僧喇嘛1人。

拉僧格斯贵1人。

拉僧温则达1人。

以上3人为陪殿，拉僧是殿内念经时管理诸佛事活动人员。

温则德：领经者。

皂道尼尔：管钱的。

竹木扎：念经值日的。

尼日巴：保管员。

色翁：活佛侍卫者，俗称管家。

格伦布：管灯油的。

宁沙钦：共6人，其中两个大号手，两个喇叭手，两个吹法螺手，给神奏乐晚安，早起的吹号手。

夹木：做饭的，炊事员。

寺庙里有数百人一起做饭的大锅，能盛几百斤粮、肉、油、糖等，一次放进锅内，将几块大锅盖对好盖紧封起来，锅底放好早准备的足够的一炉烧柴，点燃后封炉口、锁门，第二天用饭时经管理人员检验封条后开门开锅，这时已成一锅特别风味的硬粥，向施主们和喇嘛们散食。吃后洗锅时用大扫帚几个人同时刷锅才能洗净。

受戒仪式：

阿贵庙除活佛更替时举行隆重的坐床仪式外，每年招收沙比（徒弟）时还要举行剃度灌顶受戒仪式。剃去头发接受戒教的一种仪式。剃度后的徒弟叫班地。佛教宣称剃发出家是度越生死

之因，灌顶是佛教密宗的仪式，初入佛门必须经师傅用水灌顶，并接受师傅授与的藏密戒律。有五戒、八戒等，一般受给20岁以下者，这叫格斯宁戒，即勤策男，也叫沙弥。

格斯勒戒：受于20岁以上者，即比丘戒，阿贵庙受以八戒：

1、不杀生。2、不偷盗。3、不邪淫。4、不妄语。5、不饮酒。6、不眠坐高广华丽床座。7、不涂饰香鬘及歌舞观听。8、不食非时食等斋戒条律。

格隆戒：受大戒、具足戒、戒品具足，品类很高的托体僧，必须遵守253条戒律，佛教认为这样的戒条是完全充足的，故名：“具足”戒，阿贵庙同样受此戒，但为数不多。

解放后，党和政府根据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制定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并对喇嘛教徒进行了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遵守法纪的教育，从而团结了绝大多数喇嘛及信教群众；民族经济文化、科学技术都有了极大的发展，历来靠施舍过日子的寄生生活状况得到了很大改变。绝大多数青壮年已经摆脱宗教的种种束缚，有的还俗成了家，信教不信教都有了真正的自由。

据磴口县政协文史资料第3辑《阿贵庙和在磴口地区的喇嘛教》节选

乌中旗蒙古族生活习俗

陈、阿拉坦巴根

乌拉特中旗蒙古族由于历史、自然地理、气候和生产方面等原因与其他地区蒙古族群众在生活风俗习惯上还不尽相同，另有特色。

一、服饰

男女皆喜穿长袍、靴子。为骑乘方便，男女服装多为宽衣长袖，男女服装都不开衩，衣边除下边外多用红、黄、绿或兰黑绸，镶一或三道细边。衣着对领、右肩前、右腋下等五处有纽扣，一处有一或二三并扣，多以与镶边色调相同的绸或银铜制做。妇女还在长袍外套穿坎肩或“乌吉”（与袍同长的坎肩），多用红、绿等色绸，并镶宽边，绣云纹，袍色分两类，喇嘛身着黄或紫红色；一般人，绿、兰、紫等诸色。以成幅绸缎系腰，不垂穗。男子到成人年龄还要在腰带前左方带刺绣花的宽长褡裢，内装鼻烟壶等用品；左胯部还挂装有生烟和烟管的烟具袋；腰带前右方带刺绣的绸制碗袋，内装银碗或木碗，与褡裢相称；右胯还

配带刀鞘，内装蒙古刀、筷子。刀把、刀鞘和筷子上镶有银饰，一般刀较宽长，又与烟具对称。刀鞘链长粗，多以银制，链另一端有火镰，挂在后腰带正中。一般妇女只带绣花美观的小荷包，蒙语称“哈布特克”，内装小鼻烟壶，系在肩前纽扣，放入上襟内，不配带其它装饰。

乌拉特中旗蒙古族男子，冬季戴狐皮里子，红、兰、紫色布绸面，圆锥筒形顶的蒙古帽；夏季多用兰、红、紫色布绸头巾，并将头巾一端垂下为美观。还爱戴礼帽，现盛行前进帽。妇女戴圆锥筒形顶帽，礼帽；夏季也系诸色布绸头巾。

乌拉特蒙古靴子有布做的叫“麻海”，有香牛皮制的。其形状，靴身宽大，靴尖稍向上翘，靴筒较高，后上端开岔，冬季内套红边毡袜，现多穿新式马靴。解放后，衣着服饰均有很大变化。

妇女戴头饰。有两种，未出嫁女子梳一根长辫，头饰很简单，十五岁以下少女的称“陶尔”十五岁以上的称“库克勒”；婚嫁妇女头饰较复杂，头蓄两条发辫，将辫子折叠于脑后，用两个镶有珠宝的银制的长方形发夹定向，头顶部戴镶有金银、珍珠、珊瑚的头圈。头网，下垂珠宝串的数十穗到眉上，脸呈桃形，两鬓有“随克”，

各分垂两侧，到胸前以银制圆形环相连，称“黑烈古都苏”，再从圆环各分垂胸两侧，下端各有五个穗的垂链，称“好勒宝”到腹上部。上述均以全银制做，并上面镶满了珠宝，诸色闪烁，美观夺目。还有，耳悬金银环，手戴钏镯。全套头饰重约十斤左右，一般生产劳动时暂不戴，其它时候必须戴，现在的头饰已日趋简单。

二、居住

乌拉特中旗蒙古族，现居住于城镇、农区的已都住房屋。但在牧区，为适应游牧搬迁方便，仍有住蒙古包的习惯。蒙古包，蒙古语称“蒙古勒格尔”，古籍中称“穹庐”或“毡帐”。普通的蒙古包系圆形，包顶高约十三、四尺，围壁高约四、五尺。包壁支柱一般由四、六、八或十栅交叉连接的细柳条制成，蒙古语称“哈那”。包顶部是搭以伞形骨架，由八、九尺长的数十根细椽，蒙古语称“乌尼”，和直径约五、六尺木制圆形顶圈，上有与椽数相等的小眼，蒙古语称“陶那”组成。本旗陶那有两种：一种是陶那和乌尼不固定连接，只将乌尼插入陶那孔眼，叫“哈土古尔陶那”，另一种是制做时就将乌尼用生驼皮筋固定在陶那圈上，叫“黑里黑也陶那”，一般以后者为多。将顶部的乌尼下头与哈

那上端依次相连，便成蒙古包总骨架。固定后，用十二块，宽四尺余、长九尺余的蒙古毛毡覆盖一、二或三层，包顶中央留有圆形天窗，可通空气透光，也做烟筒方口处，其余都用毡盖严。蒙古包门高三尺多，宽二尺五寸，大都南向或东南向，挂有毡门帘。

蒙古包内铺以毛毡、地毯为炕，内陈设华丽的小型柜橱，左边放置饮具，右边待客，地中间是火炉。现牧民大部分已定居，房舍渐多。

还有“麦汗”，是用布制做的帐蓬，白色帐顶上绣有兰或红色的云纹；兰色帐顶绣有白或红色云纹，多用于小型暂时移迁或在庙会、那达慕大会上做为待客所用。

三、礼节

乌拉特蒙古族热情好客，来客，家中人依次向客人问安。男子曲右膝，右手下垂至膝，女子两手相握，曲两膝，上下伸动。现一般人们多为握手问好。见面问候语是“赛音努”（好吗？）早些时期也问“阿木尔（安）”，答以“赛音”（好）。客人亦向主人一一问好。客人进蒙古包，要掀门帘左边，不能踩门槛。进包后坐在右边，（即西边），上首即北面，多为尊长者所坐。就坐后，双方取出鼻烟壶，鞠躬互换，各举到鼻端

一嗅即可送还，并彼此问候“身体好？牲畜好？”等。按季节可问“气候冷？雪大？雨水草场好？”等，主家一一回答，彼此表示敬意。如拜见父母尊长以及喜庆场合，均以哈达相献，表示敬重。现仍保留这些传统礼节。

主人用双手献奶茶，客人用双手接，给客人的茶碗不倒满，然后将茶壶、茶食品都放在客前，客人自己随便倒茶吃食品，对主人盛好的茶饭不能不吃不喝。主人给客人敬酒时客人要用双手接，喝完后，还要给主人用双手回敬酒。席间常以赞美之歌、友谊之曲来劝酒助兴。

乌拉特中旗蒙古族，对外人称呼：对长辈者称“那苏台阿爸”，“那苏台额吉”或在其名子后加上“怪”（先志），有时还要对老妇称“那戈”，对年龄比自己大些人，称男为“阿哈”（兄），女为“额格其”（姐）或“阿戈”，对长兄辈用第二人称称为“他”（您）。

四、禁忌

乌拉特蒙古族有上百种禁忌习俗，现还保留着不少。忌讳带马鞭、马龙头、嚼子、马绊、绳子（尤其麻绳）、木棍进包；不许用指头等戳指人的头；不许踩踏锅灶；有客人时不许扫地；骑马时不许从马的外手（右手）上下；不许将套马杆

靠放在蒙古包上；进蒙古包时不许掀门帘右边，不许用左手接递东西；不许在羊圈和羊盘随意大小便；宰杀羊不许割脖子；除夕大年不许说不吉利之话；骑上马不许从羊群中间过；骑上马不许在靠近蒙古包前后跑；给别人递交刀锥剪等有尖刃的器具时，不许将尖部向着对方。

五、饮食

乌拉特蒙古族的饮食品大致为三类：即粮食、乳食、肉食。乳食又称“白食”，指的是奶食品；肉食又称“红食”，指的是肉食品。

（一）白食品，蒙古语为“查干伊德”，白色食品的意思，表示纯洁，崇高的食品。在招待尊贵的客人时，蒙古族人民，通常先敬献白食“德吉”（完整食品先尝先吃为德吉），在逢年过节，喜庆宴席上，主人必须先端出一盘洁白的奶豆腐和奶皮子，让客人品尝；家中亲人出门远行，经常用白食祝福一路平安；儿孙晚辈生日周年、结婚典礼，长辈老人则赠以鲜奶和黄油，表示良好的祝愿。

白食分为食品和饮料两种。奶制饮料有：鲜奶、酸牛马羊奶、马牛羊奶酒、生熟酵酸奶、混合回锅酒，奶酒回一次为“阿尔扎”，回二次为“胡尔扎”。奶制食品有：奶豆腐、酸奶豆腐、

奶酪（阿如勒）、奶酥、干湿奶皮子、黄油、白油、油渣子（觉黑）、奶渣子等。

奶食品的原料以牛奶和山羊奶为主，辅之以驼乳和绵羊奶。马奶只做酵酸奶汁和酿制奶酒。

白食制成时，有时还要加一些红白糖，所以味美可口，营养价值很高。酵酸马奶（车格）对肠胃病和肺病，风湿性腰腿痛都有一定的疗效。

（二）蒙古族人民把肉食品叫做“乌兰伊德”，即红色的食品。

蒙古族招待客人的茶点，就是奶食品佐以奶；而招待客人的饭菜，则是肉食加奶酒，现多以粮酒待客。

乌拉特中旗蒙古族的肉食原料，主要是牛和绵羊肉，其次山羊肉，现在有少数人也吃骆驼肉，目前吃马肉的人少了。其吃法一般爱吃手把肉，也吃烤羊肉、肉干、炖羊肉、火锅，宴席则摆整羊。

手把肉，就是将羊带骨肉，以骨节分成块，放入生清水中，加少许盐，煮之基本熟或一滚就起锅取出。吃时用蒙古刀割或手把着吃，故亦称“手把肉”。

蒙古族吃肉是不剔骨的。夏天多吃羊肉，所以习惯吃本年头一次鲜羊肉，在阴历五月份羊上膘，宰绵羊。这时的绵羊肉尤其鲜美，肉汤味浓，蒙古语称“旭勒”。除集会和必需外，一般不宰

杀大牲畜。入冬后在大小雪之间集中宰杀一部分牲畜，加以冷冻储存或晾干，一直吃到来年夏初。

好客的乌拉特蒙古族，在以手把肉或整羊席招待客人的时候，都有一定的规矩。把一支带四条肋骨的前腿或一个羊背带一支前腿或以一只脊椎骨肉配半节肋骨及一段肥肠劝进；姑娘出嫁前或回娘家，须煮羊胸脯肉吃，以示送别或欢迎。

整羊席，蒙古语叫“秀斯”或“乌察”。可分三种：供品的秀斯；礼物的秀斯；宴席的秀斯，都表示尊重和隆重。其煮法和手把肉一样。

还有血灌肠，将羊血中和些面、调味品，灌入洗净的羊肠里，煮熟吃，色泽味佳。

（三）粮食品，主要是面、大米、糜米。炒米是蒙古族特别喜爱吃的一种习俗食品，它是用糜子蒸（或煮）、炒，碾等工序加工而成。解放前多是自己加工，解放后多是粮库加工供应。炒米的吃法有好几种：用黄油、奶皮、白糖拌着吃；用奶茶泡着吃；也可再加些黄油等奶食品，吃起方便，味美可口，耐饥耐渴。

随着时代的发展，乌拉特中旗蒙古族的食物结构也在发生着变化，米面逐渐成为主食，吃法上也开始注意烹调技艺和品种的多样化了。

转自《乌拉特中旗史料》第一辑

乌拉特蒙古族婚俗礼节简述

孟和巴图 刘斌

民族风俗就是一个民族或部落的生活风尚、礼节习惯等，它是一个民族或部落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中形成的，它具有一定的社会性。由于生产和生活方式及地域等因素的不同，每个不同的民族或部落都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风俗习惯。本文仅就乌拉特蒙古族的一些较之别部蒙古族不尽相同或略有特色传统风俗作一简述。

一、乌拉特婚礼

蒙古族群众的婚礼是多种多样的。例如，鄂尔多斯的欢乐明快，科尔沁婚礼歌美意浓，而乌拉特婚礼则以它粗犷纯朴的独特风格，区别于其它部的婚礼。乌拉特婚礼的全过程可分为：求婚、订婚、娶亲、回门等几个环节。

1、求婚：

旧时乌拉特蒙古族的求婚一般是由父母及媒人包办的，当欲求谁家的女子时，父母要找个“照齐”（即媒人），尔后由“照齐”再找一至

二人，携带4个圆形饼、白酒、哈达等礼品到女方家。到家后先将圆饼入盘摆在桌上，接着给老人敬酒，献哈达，同时提出此行是为××家的孩子求婚的，如果女方的老人很愉快的接受了哈达，就意味着同意了这门婚事，求婚的目的就基本上达到了。

2、订亲

订亲和汉族的订婚是一个意思，这要比求婚复杂的多。乌拉特蒙古族在订亲时，男方要准备和携带整羊一只，白酒若干瓶及圆饼、哈达等礼物。到女方家后，先要将礼物敬献给亲家，接着要献哈达和敬酒。待一切见面礼行完后，女方家便请亲朋贵客入席。彩礼的商谈是在宴席中慢慢进行的。宴席开始后，要放“乌察”（即羊背子）由一位能说会道的人唱祝颂词，这时女方家要敬酒，并且还要由女方家请来的两名歌手站立在蒙古包的东南角唱歌，唱三支唱，大家喝三次酒，然后席间宾朋回敬一支歌，敬歌手一杯酒，接下来就是“红火”热闹，大家一起喝一齐乐，彩礼就在此过程中商定而成。

3、娶亲

乌拉特婚礼最高潮的阶段是娶亲。娶亲的日期通常是在订婚时由男女双方老人商定，到喜日子时，男方的娶亲队伍一般要在前一天就来到女

方家，因为按照乌拉特蒙古族习惯，在男方待客的前一天，女方家也要宴亲宾朋。这天上午，男方的娶亲队伍在媒人的带领下（一般约6—7人）骑上骏马，兴冲冲地奔向女家，当娶亲队伍到来时，女方家在家门口放上小方桌，铺上毛毡，摆上奶食品及酒，由一名念礼颂词的人带领几名敬酒人（女方亲属），欢迎娶亲队伍。这时双方行礼请安，互祝言祥，之后由女方祝颂提问，男方祝颂人回答问题，如果对答如流女家就打开门把新郎和娶亲队伍让进蒙古包里。接着便由新郎敬献哈达、整羊、美酒等礼品，完毕之后，娶亲一行人入坐，由主婚人唱颂祝词，女家敬酒，男方歌手唱“三福歌”（乌拉特婚礼中心唱歌曲，由《造福》、《先辈的祝福》、《永恒之福》组成）。歌罢，姑娘小伙子们开始先耍新郎，通常耍新郎时，女方的姑娘小伙子们要端上一个煮熟的羊脖子让新郎从中间掰断，据说这是为考验新郎的智慧和力气。女方的宴席和坐唱从中午开始，一直要持续到第二天早晨待到新娘出嫁时。

第二天天还未亮，新娘便在众姑娘的簇拥和帮助下，穿上鲜艳的服装，在送亲的歌声中，与家人依依惜别，与娶亲送亲队伍一起出门上马，众人在马背上接受三次敬酒，便告辞登程。

娶亲上路之后，一场双方互相追逐戏逗的游

戏便开始了。女方的送亲者要打或追赶新郎，新郎则飞马扬鞭，不让对方赶上，娶亲的其它人员的责任是好好地保护新郎，不让对方人靠近新郎，特别是不让送亲者把新郎的帽子抢了去，据说，这是女方家在考验新郎的坐骑和新郎的骑马本领，如果帽子被抢了去，大伙就会取笑他是个无能的人，那样新郎及娶亲的一行人很不体面。因此双方在娶亲途中，相互争斗，嬉笑打逗，非常有趣。

娶亲到家时，男方的同辈人出门迎接，新娘下马时必须有人搀扶，脚不得着土，按照习惯要先品尝鲜奶，然后脚踏地毯或毛毡步入新房，由嫂子等人为新娘打扮一番，接着要拜火和拜见长辈，给长辈磕头时，长辈们都要赠送礼品，礼品大至牛马驼羊，小至衣料银圆。赠送牲畜必须送母畜，这是一种兴旺发达的美好祝愿。拜见完毕后，新娘要退出，这个时候守候在门外的青年们便要将门推住，不让新娘出门，新娘要在这个时候，把先准备好的手帕、荷包、糖果送给青年们，他们才放新娘出门，这是一个小小地耍新娘插曲。

酒宴开始后，新娘、新郎在嫂子的陪同下，给来宾们一一敬酒，所有的人几名特邀歌手的带领下，一起尽情欢唱，那古老悠扬的乌拉特民歌此起彼伏，歌声，欢笑声伴着美酒佳肴使婚礼达到高潮。按照习惯，欢乐的婚宴要持续到第二

天，富贵人家甚至更长一些。

当送亲的人回去时，男方要在蒙古包前铺上毛毡，放上桌子，由男女双方主婚人手捧银碗，斟酒祭天三杯，祭地三杯，互敬三杯，握手告别，至此，婚礼告成。

4、回门：

乌拉特婚礼中的回门，是由婆婆领上儿子和儿媳，带上整羊、圆饼、酒等礼品去女方家的，回门的时间没有固定，一般是婚后的适当时候，不管那天都可以。回门时，娘家要举行酒宴，款待女婿和亲家。

如今，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传统的习惯也在发生着变化，那些婚礼中的繁杂之礼日渐消失，但那些快乐的、富有民族特色的和民族气息的礼仪和娱乐活动却仍保留着，并且不断增添着新的内容。

二、节日及祭祀

1、过年

乌拉特蒙古族的节日主要是过年。过年有过“小年”和“大年”之分，农历腊月二十三是小年，正月初一是大年。

小年这一天，要祭灶，在“灶神”龕前烧香，供献牛羊肉和奶食品等。这一天很讲究全家

团聚，晚上送灶神时，把事先准备好的草和牛粪用火燃着，取出一些供品，扔进火堆里，全家老少要对着火焰，虔诚地叩头、念经、向灶神祷告。

大年，蒙语叫查干萨仁，意即白玉无瑕的月份。过完小年之后，要清扫蒙古包内外，准备过大年的东西。年三十晚，全家老小要围坐在蒙古包内的小桌旁“守岁”，这时儿女们要给父母长辈敬酒。晚饭要多多准备，大伙儿要多吃多喝，乌拉特蒙古族有个习惯，年三十的酒肉剩的越多越好，它象征着新的一年酒肉不尽，吃穿不愁。三十晚全家人还要每人吃一口圆饼，意思是全家人永不分离，永久团聚。

初一到初五这段时间，一般不到朋友家串门拜年，从初五到初十，人们纷纷跨上骏马，带上哈达、美酒等礼物高高兴兴地到亲友家串门拜年。主人通常用美酒招待拜年人，拜年离去时，主人要包一小包茶让客人带走，意即“带喜回家”，过大年的时间一般持续到正月十五庙会以后就基本结束了。

2、祭敖包

每年的阴历五月十三是乌拉特蒙古族祭敖包的节日。

敖包，传说是山神或龙神的化身。

祭敖包，就是草原牧民以祭典的方式祈求山神或龙神保佑，多多降雨，以使草原水草丰茂牛羊肥壮。每年到五月十三日时，各地牧民聚集在一个较负盛名的大敖包旁，在敖包上插上五颜六色的布条和纸旗，上面写有经文，供上牛羊肉、酒等供品，请喇嘛点火焚香、念诵经典，然后牧民们围着敖包，从左向右走三圈，叩头礼拜。

当礼仪结束后，要举行传统的赛马、射箭、摔跤、唱歌跳舞等活动，参加祭敖包的人少不了要开怀畅饮，尽情欢唱，男女青年们更是借此机会，相约登高游玩，互相追逐，倾述衷情。

二、礼节

1、问候礼节

在众多乌拉特蒙古族礼节中，问候的礼节是比较特殊和严格的。

问候礼节首先是人与人会面时，相互一定要请安问好，否则，就会被认为是没有礼貌和小看他人。向来客请安问好，必须迎出门外，如果是骑马而来，必须要等客人下马问好，在野外会面时，如果一方是老者或长辈，青年人要下马向老人请安问好。

家庭成员必须问候的有以下几种：一是过年时，在大年初一放完旺火后，要用哈达、鼻烟壶

相互交换、请安问候，父子之间、夫妻之间、弟兄姐妹之间都要进行。二是出门回来时，必须请安问候，如果是长辈出门回来，小辈必须出门向他请安问好。家里如果殁了父母老人和兄长、丈夫时，在送葬期七天之内，不向别人问好，别人问好不给予回答也不为失礼。

敬献哈达、交换鼻烟壶的礼节，一般是在重大活动，节日或是欢迎尊贵客人时进行。这种时候，请安问候不能直立在那里，必须是伸出两手，手心朝上，腰腿略弯曲，献哈达时，要把哈达高举过头，慢慢弯下来献给对方。交换鼻烟壶时，要拿在右手上递过去，用左手接过对方的鼻烟壶，闻一闻后再交换，在此进行中间主客人要相互问候。

2、敬酒的礼节

敬酒是乌拉特蒙古族又一有特色的礼俗。

蒙古民族是一个习惯用酒的民族，每当过年过节、办喜事、招待客人以及有比较重要的活动时，都要用酒，并且主客人之间相互要敬酒。

在重大活动、节日或迎接尊贵客人时，一般是用哈达和银碗敬酒，这是比较高的礼节。平常性的酒宴一般不用银碗，同时给客人敬酒时用的是马奶子酒，这种酒是用马奶子发酵而制成的酒，度数不大，所以一般人都能喝几银碗，现多

用白酒敬献。乌拉特蒙古族有“三杯美酒敬亲人”之礼俗，但不一定要必须把三杯酒都喝掉。头两杯可以尝一尝，习惯上是最好把第三杯酒全喝掉。给客人敬酒，必须一视同仁，给客人敬酒必须使酒盅满满的，被敬之人，要站着双手接过敬酒人的每一次敬酒，来客接受了酒后，必须要回敬，通常回敬一次就行了，小辈向长辈敬酒时，有磕头的习惯，长辈接酒后，由于礼节重，所以一般是将酒全部喝掉。

蒙古民族用酒，但不是酗酒，相反，它恰恰能反映出蒙古族豪爽、质朴的美好品德，随着时代的进步，这些古老的礼俗正在不断注入新的内容。

乌拉特蒙古族风俗，内容是丰富多彩的，但因时间仓促，还有许多未尽之处，文中也可能会出现许多错误之处，望广大有识之士和读者朋友能给以谅解并提出批评。

转自《乌拉特中旗史料》第四辑

乌拉特人的殡葬习俗

达瓦桑布

自古以来，每个民族和地区，由于风俗习惯，地区特点，宗教信仰等不同，因此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殡葬习俗。这些习俗源远流长，有的甚至留传至今。笔者在此仅据自己的记忆，就乌拉特地区蒙古民族各阶层人士去世后的殡葬仪式、规模，习俗以及所遵循的戒律，作一些追述和介绍。

解放前，乌拉特三公旗，每逢扎萨克诺颜、王公贵族包括其福晋、陪房以及主要官吏，去世举丧时，首先要向全旗臣民百姓发出讣告，举旗上下不分男女老幼，都要参加和遵循七七四十九天的哀悼活动。通常称为四十九天的忌日，并且有以下一些具体戒律：

一是忌日期间，任何人见面，不准互相问好，不准互敬互换鼻烟壶；

二是不准穿着礼服、佩戴首饰，其男性更不能穿着朝服和顶戴、翎羽，不许腰挎火器、佩刀；女人不得修面和佩戴首饰；也不能穿着色彩鲜艳的长袍短褂；

三是不准任何人梳头、理发；

四是不准唱歌跳舞、拉琴吹笛，搞娱乐活动，特别是忌日开始起百日内，任何人不得娶亲嫁女，办理喜事；

五是不准打猎，不准有宰杀牲畜等作虐生灵的事情；

六是忌日内恰逢过年过节时，不得相互拜年问好。

除上述六条戒律外，全旗大小官吏和贵族台吉，凡有顶戴翎羽者要分等级，阶层用深兰色或纯兰色布匹缠绕顶戴，以示哀悼。

建国前不久，即1948年前后，老王爷巴布多尔吉夫妇先后去世时，就是按照以上习俗，分别对老王爷巴布多尔吉举行了四十九天忌日哀悼，对其福晋额日和睦苏举行了三十五天忌日哀悼活动。

乌拉特一般牧民百姓，逢长辈老者，特别是父母亲去世后，要根据各自家庭生活条件，尽其所能准备各种祭品，子女晚辈要披麻带孝。举家进行四十九天忌日哀悼活动，并按上述六条戒律办理后事，以表孝顺之心，寄托对亲人的哀思。

逝者如果是一般长者或同辈，通常则只搞三七二十一天的哀悼活动。

大小庙宇的葛根(活佛、主寺者)圆寂(即逝

世)后,由本寺庙大小僧侣、喇嘛以及沙毕(班迪)等全体参加哀悼和丧葬活动,并且将庙宇主殿最高处所设置的“甘迪尔”用黄白两色布匹缠绕起来以示丧事。其它殡葬礼节和忌戒,同地方上的做法大体相同。

乌拉特地区除有独特的殡葬风俗习惯以及忌戒以外,还有其传统入殓送葬的形式。具体来说,一般家庭的父老长辈去世后,首先要给逝者穿着全套新衣裳,然后为其整容修面,将尸体置放于半开顶的蒙古包内,其头部近处摆设各种饮食祭品,并且要烧香点灯,遗体置放祭奠二至三天。逝世当天和入殓出葬之日要在自家住房的近处高地上堆柴点燃火焰以示举丧哀悼。出葬时,其亲属要向灵柩献哈达表示招魂留恋,忌日届满时还要举行同样仪式以示悼念。出葬前还要请喇嘛活佛问卜指明出葬方位,尽量要在其祖坟的同一地方殡葬。

乌拉特人入葬形式有土葬和野葬两种。土葬是使用立式棺材,将死者盘坐于棺中,尸体周围塞满各种祭品和艾柏松枝,然后入土安葬。野葬则是在选定出葬吉祥地之后,把死者所穿的衣服全部脱掉将裸露的尸体抬放在出葬地。死者如果是男性,野葬时必须将其面部朝西,侧身放置;死者如果是女性则将其尸体面部朝东,侧身放置。

这种野葬在民间还有一定的讲究和说法，如果野葬的尸体很快被猛禽野兽分食或风化，认为越是吉利；如果野葬后被分食或风化的天数过长，则认为死者阴魂未散，于事不利。

按照民间习俗，入殓移棺和出葬时，须请与死者年龄、属相都相抵的人来办理。凡是被邀请主办入殓和出葬的人，都要将帽沿反带，将衣袖朝里反卷，然后才动手入殓。入殓完毕移棺出屋时，有两种出法，可任选其一。一是将棺材从蒙古包的哈那底下移出；二是事先在放置死者的蒙古包门口两侧插上几捆芨芨草或树枝后才能从门口移出。

出葬时按当地习俗，尽可能不使用马匹和骆驼驮运，而是由死者的晚辈后生们轮换抬棺送到墓地。还有的是由死者子女亲自背尸送送出葬地点。每逢殡葬事宜，近邻浩特亲朋好友皆来相助帮办。如果入葬点路途遥远，须要用骆驼、马匹等驮棺出葬时，还有以下几种讲究和礼仪：首先要将出葬时役用的骆驼或马匹备好鞍具，拴在停尸体的蒙古包门口两侧，还有的干脆拴在蒙古包右边的哈那上，以示家中有丧事。乌拉特牧民平时出门到别人家时，不能把自己的坐骑拴在主家蒙古包的哈那上，也不能拴在正对主家门口的任何东西上，这种忌讳和习俗就是由此而来的。其次，驮运尸体出葬时，要将役用的骆驼或马匹朝西

方向卧倒或牵住，然后把出葬的棺木抬放上去，而且死者头部也必须朝西方向放置，驼马驮稳后方能起程出葬。再者，出葬往返路途上要尽量避免与生人相遇；驮运或出葬使用的车辆不能直接拉回家去，要在离浩特有一定距离的地方停放二至三天后，才能拉回原来的住处。出葬时使用过的骆驼、马匹，不能宰杀、出售、也不能再使役，要全部放生，任其自由奔驰。参加出葬人员返回时，家人事先在浩特附近朝出葬方向点燃两堆篝火，参加出殓的人们走近火堆时，先用黑色阿尔山（实际上是用盐碱、松柏、肥皂等搅拌而成的水，亦叫圣水）洗手擦脸，然后跳越火堆。穿过火堆后再用白色阿尔山（清水）洗手洗脸。同时在房屋内点香祛邪，至此才让人们入室献茶，上饭招待。

以上所述仅是平民百姓出葬习俗。至于王公贵族及其福晋、陪房和上层喇嘛活佛去世后一般实行火葬。佛教教义认为，人虽死去其灵魂常存。所以这些上层人物去世后不仅尸体要火化，以期转世再生，还要不惜花费大量钱财，邀请众多喇嘛僧人念经颂佛，为逝者祝愿，指点转世再生之路，其殓葬仪式更为繁琐多样。

上层人士的殓葬仪式，大体有以下一些程序。首先须请喇嘛活佛问卜指定下葬的风水之

地,然后举行祭奠“土地爷”的仪式。祭奠土地爷时,要请问卜的喇嘛亲自到选好的入葬地点,先划定能容纳死者一人尸体的圆圈,在圆圈地上铺好白布,摆上各种祭品,由喇嘛本人念一番意为“向土地、龙王爷求得一片葬身之地”的经语,随后将尸体或骨灰就地埋葬。在点燃白布和祭品时,喇嘛又一次念诵为死者建造一所住宅的经语。最后,由死者遗属向主持这一仪式的喇嘛送马匹或骆驼,以表谢意。整个入葬仪式完毕后,还要另选时日邀请众多深谙佛道、德高望重的喇嘛,专门为死者举行一次灵魂转世的诵经拜佛仪式。这一仪式结束后,由家人又一次以死者名义,向请来的喇嘛,每人赠送一匹鞍具俱全的好马和一套好衣服。至此,丧事才算告一段落。

乌拉山祭祀习俗

朋斯克巴扎尔 那顺瓦其尔

巍峨挺拔的乌拉山，象一条巨龙，横卧于乌拉特草原东部。她东起包头昆都伦河西岸，西至西山咀卧羊台。全长约110公里，南北宽15至20公里，面积约1398平方公里，平均海拔2000多米。最高峰叫“桦北峰”，海拔高达2322米，神奇的乌拉山，悬崖峭壁奇峰异石处处可见，山上松柏常青，山涧清水长流，每到春夏树木葱郁，鸟语花香，珍禽异兽，出没其间，真可谓一处“世外桃源”。若天晴日朗，登桦北高峰，远眺黄河，恰如一条巨练向东流去，雄伟壮丽的包钢，烟雾弥漫，一派兴旺景象；转身向北，一片草原风光，那里牛、羊成群，绿色草地上撒满珍珠玛瑙；放眼西望，八百里河套麦浪滚滚，是全国闻名的塞上粮仓；远眺西北方，乌梁素海淡水湖微波荡漾，茂密的芦苇掀起绿色的波浪……

神奇壮丽的乌拉山，令人留连忘返，也引出人们的无限遐想，很早以前民间对乌拉山就有着

许多美丽的传说，有的说这座山的名字就是人们敬仰的佛主的名字；有的说她的名称是用一位盖世英雄的名字命名的；还有的说这座山是用一位勤劳勇敢的山地人的名字命名的……后人把乌拉山看作是神仙、活佛居住的地方，尊称她为“木尼”乌拉。每年定期祭祀，祈祷她能够拯救万物，造福人类。因此，很早以来就形成了乌拉特人定期祭祀“木尼”乌拉的习俗。

人们从何时起命名这座大山为“木尼”乌拉，现在已无据可查。但是人们却用丰富的想象力刻画着“木尼”的形象。旧社会乌拉特西公旗大小寺庙和牧民群众曾经供奉过各式各样的“木尼”画像，这些画像已经流失，从最近所得一幅“木尼”画像上看，木尼是一位身穿盔甲、英勇威武的将军，他右手挥戈左手托一圣盘，乘坐一棕色骏马，正从熊熊火焰上飞驰而过。从这幅画像看，“木尼”既不象英雄圣人、更不象山间野人，很象是传说中的被大大神化了的一位将军武士。人们为祭奠这位将军，把这座大山尊称为“木尼乌拉”、“毛尼乌拉”、“木尼罕”、“蒙汗”等。并且以各种形式世代相传，定期祭祀，赞颂不止。

“木尼”乌拉南北坡既有原始森林，亦有松柏、白桦、杜松、侧柏等。山岭中还有山杨和黄

刺玫、酸果、山枣、黄花、绒线菊、金菊、白芍、黄芪、山丹等百十种药材，还有白蘑、紫菜等真菌食用山珍。过去在悬崖绝壁、深山老林中还常常出没虎豹、羚羊、团羊、旱獭、水獭等珍贵野兽。乌拉山还蕴藏着金、银、锌、石英石、稀土、铅和大理石等丰富的矿产资源。“木尼”乌拉以她独特的风采和宽阔的胸怀，哺育了乌拉特人，成为乌拉特蒙古民族自古以来休养生息的摇篮。当地群众中流传着一首赞美“木尼”乌拉的歌谣，其大意是：

青山绿水望不尽，她真正是人间“世外桃源”。

巍峨高山拔地起，她浑身都是稀世珍宝。

虎踞龙盘的“木尼”山，是生养乌拉特蒙古民族的故乡。

滋润沃土有黄河，四面八方有水源。

阳光雨露更充分，养育百姓四季长春。

花的原野真美丽，珍禽异兽游山中。

松柏常青随风摆，潺潺流水绕山涧。

神仙降福乌拉山，美丽富饶是故乡。

据《蒙古源流》中记载，成吉思汗西征唐古特，经过乌拉山曾赞扬说：“此地乃危难时期可隐居，太平时节可永居，牛羊野兽可养生，年迈老者可休养之地也。”历史悠久的乌拉山给人们带来了幸福和恩泽，祖祖辈辈在此地居住的人

们，年年祭祀乌拉山，祈祷这座圣山庇佑他们，五谷丰登，六畜兴旺，避邪驱恶，吉祥如意。这样经过多少朝代和岁月，自然形成了每年五月初，乌拉特三公旗上下共同祭祀“木尼”圣山的统一活动。据传祭祀“木尼”山的习俗早已有之。这一习俗从乌拉特部族迁来此地起，一直延续到了解放初期。

每到旧历五月初，乌拉特三个旗分别由扎萨克诺颜为首，带领旗府大小官吏、贵族台吉、喇嘛、僧侣和平民百姓，跋山涉水，爬上大桦北高峰，举行祭祀仪式。当时三公旗的祭奠活动虽然都在旧历五月，但祭奠日子和祭祀地点却有所区别。其中西公旗（现在的乌前旗）把“木尼”山大桦北主峰作为自己的祭祀台，每年五月五日举行祭祀；中公旗（现在的乌中旗）将“木尼”山大桦北主峰东北侧峰顶上的塔式岩作为自己的祭祀台，每逢五月初三举行祭祀活动；东公旗（现在的乌拉特后旗）也把大桦北主峰东北边塔式岩旁的阿布达尔朝鲁当作自己的祭台，每逢旧历五月初七举行祭祀活动。当时除了旗里统一组织的祭祀活动外，三公旗的平民百姓也以苏木为单位或以家族为一体，选择“木尼”山各处奇石怪岩定期祭祀。其中有大坝峰、巴音温都尔峰、查干海林峰等一百多处祭祀台。

西公旗祭祀“木尼”山时，还有一些独特的习俗和规矩。比如，扎萨克诺颜、大小协理和管旗章京（即旗总管），不必每年都去祭祀圣山。而左右领章京（即扎楞）三人，每年必须轮流率领四个苏木章京带上羊背子等各种祭品前去祭山。此中还有一些具体规定，如果是最高中领章京率领前去祭祀，那就必须由大苏木、中苏木、塔布图苏木和都统苏木章京陪同前往；如果轮到中四苏木右领章京带领前去祭祀，那就由大阿拉塔沁苏木、中心苏木、小阿拉塔沁苏木、额吉格钦苏木章京陪同前往；如果左领章京领头祭祀就要由乌拉尼都苏木、哈日尼都苏木、戈日尼图苏木、召领苏木章京等陪同前往祭祀。除此以外，莫日根戈根庙的活佛不仅每年都要去祭祀，还要在祭祀典礼上念经颂佛，以示重视。

每年阴历五月五日，西公旗大小官吏、贵族台吉及喇嘛僧人和普通民众，都要带上祭品，自动到木尼山大桦北顶峰集结，参加祭祀活动。祭祀活动开始前，大家一起动手将“木尼”山最高峰处悬崖绝壁上的苍松老柏，用各种绫罗绸缎和哈达翎羽等装饰一新。同时在祭祀台中央恭恭敬敬地摆上《木尼》的彩像，两侧插上刀、枪、剑、戟等各类武器，台前点燃香火，供奉上各种祭品。祭祀典礼开始时，松柏香味四溢，两排坐

位上的喇嘛按着宗教职位排好坐次，念经颂佛。据传说，他们所念“赞颂经”的部分章节，是由第三世莫日根戈根（活佛）劳布生丹毕扎拉曾亲自用蒙文编著，由阿鲁希热庙（即西公旗二十四庙宇之一）一世活佛呼力庆贵亲自用藏文翻译的。

《木尼》大桦北峰祭祀“赞颂经”的大意是：“噢玛尼、朝格图瓦其尔，帝王之位归属蒙古大帝之时，曾以木尼圣山作为金殿玉座，以吉祥如意的木尼山脉作为她的依托。杰出明智的劳布生拉布哈教主，也在此曾与珠卡斯瑞信徒们誓师，为了所向披靡征服顽敌，祈祷天灵相助，获取胜利。开元大帝您虽然来去无踪，托您洪福大智，略表我等诚心谢意。以您的神力佛法普照生灵。请各方神仙携手莅临，吾等平民，诚心恭候在此祈求您们，用各自的神功，拯救我等万物生灵”等语，以恳请“木尼”将军下凡光照人间。

第二步再由众喇嘛念诵净洁圣山的《前大木尼经》、《木尼赞》和《祝福经》等。这些净山赞词大意是：“噢玛尼！仿照古时教主巴达玛桑布祭祀玉皇众神习俗，吾等珠卡斯瑞尊师信徒们，以诚挚的祭祀，净洁我们威武雄壮的木尼山岳。在此吾等用永不熄灭的火堆祭祀香火，祭祀净洁大地母亲和上天各路众神……”（以上均引

自原著《木尼罕赞经》一书)。

除上述念经赞颂仪式以外，正式祭奠一开始，先是王公贵族，后是平民百姓，按等级阶层分别烧香磕头，把酒祈祷，各自祈求山神降福人民，祛邪避难，平安无事，吉祥如意。

此外，还有一条戒律，人人必须遵循。参加祭祀的人们，由于自己路程的远近，可以先来后到。但必须骑马或徒步行来，而不许骑驴骡上山。

那时“木尼”乌拉山，松柏常青，森林茂密。西公旗衙门挑选一批精明强悍的壮士，分前后左右四坡专门看守山林。对守护森林的人要求特别严格。忠于职守，踏实肯干的长期留用；对付差事、玩忽职守的一经发现立即解雇。守护森林的人员，定期巡视所属责任区，发现擅自伐树盗木者，不仅要没收所盗木材，并拘捕惩罚。山中居住牧户，如果确需木材，可经森林守护人员批准，伐木使用。但决不允许任何人超越所需，乱砍乱伐，乃至倒卖。即使大小官吏和贵族台吉，需要木材，也必须经旗衙门批准，下达文书证件，方可伐木取材。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鬼子占领西公旗后，派人上山大肆伐木毁林，外地一些人也趁机乱砍乱伐，偷盗转卖现象十分严重。守林人员也无力查

禁。因此，旗衙门曾派出众多武装兵丁，保护圣山老林，砍伐之风才稍有收敛。

巍峨挺拔的乌拉山，美丽富饶的“木尼乌拉”您用甘甜的乳汁哺育了乌拉特人，您的恩惠万古常存，以您为摇篮的乌拉特蒙古民族世代相传，赞美您歌颂您，为您的尊严和万古长青，永远祝福您。

记拉僧庙会的“跳鬼”盛况

苏希贤

蒙古族喇嘛庙庙会的“跳鬼”，最能表现喇嘛教的宗教性，是喇嘛庙的一项很隆重的佛事仪式，深为蒙古族群众信仰和喜爱。笔者在1942年至1948年期间，曾有幸参观过五原地区的千里庙、拉僧庙、宝圪岱庙和临河班禅召的庙会。这些庙会除有喇嘛的“跳鬼”佛事外，还有赛马、摔跤等表演，多彩多姿，盛况空前。在那史无前例的“文革”时期，这些具有很高文物价值的召庙，遭到“红卫兵”的彻底破坏，寺庙设施荡然无存，因此也就未能再举办过去那种庙会。喇嘛庙“跳鬼”的内容和场面形式已鲜为人知了。笔者愿就记忆所及的见闻情况，并采访健在的老年人的回忆介绍，以拉僧庙为重点，综合整理，写成这篇拙文供参考，若能起到留传文化遗产的微小作用，笔者的心愿足也。此文讹误之处，请读者鉴定指点，补充修正。

每年农历的正月15、5月25日、6月13、12月19日，是蒙古族喇嘛庙举办庙会“跳鬼”的良

辰吉日。这是因为按佛教故事传说：正月15是弥勒佛“出行”的日子；5月25是祭雨和开庙门的日子；12月19是佛祖什迦牟尼的诞辰。1945年12月19日，拉僧庙举办过传统的庙会。寺庙所在地的晏江县县长张亨信，和定乡乡长苏希贤（即笔者）应邀参观过这次庙会。参观庙会的还有达拉特旗奇大太太诺月朋以及她的女儿，乌拉特西公旗扎萨克诺颜奇俊峰。又由于是抗战胜利后的首届庙会，蒙汉人民充满了快乐心情，所以这次庙会盛况多彩，十分隆重。

虽然已是冬令季节，但这一天晴空万里，风和日暖。一清早就有崇奉喇嘛教的男女蒙古同胞，穿着新衣裳，骑乘高头大马，从四乡兴致勃勃地来赶庙会“朝圣”。那派怡然自得的心情和神彩飘逸的风姿，特别引人注目。其中蒙古妇女的美丽装束，丰彩多姿，给庙会增添了不少光彩。她们身穿兰色或紫红色的长袍，足蹬皮靴，腰系刺绣横带，头带花艳的银玉首饰，外套一件绣花背心，显得俊俏美丽，光彩夺目。尤以少女梳一条长长的发辫垂于背后，情态大方，洒脱活泼；成年妇女梳两条粗粗的大辫托于胸前，辫子用辫套包裹，上边插着鲜艳的装饰品，并在头顶上分出一小撮头发挽成发髻，插挂珠翠，非常健美俊秀，风度优雅。她们彼此相遇，热情有礼，一见

面两人同时各屈双膝，把胸前挂的“鼻烟壶”（在一个小布袋装着）对换一下，然后站起来才有说有笑地说“赛白脑”（蒙语）问寒问暖。长辈们碰到晚辈不屈膝，只对换“鼻烟壶”。男人们彼此见面也是如此礼节，不过不像妇女们那么礼道十足就是了。

拉僧庙院前是大雄宝殿，大殿广阔宽大，面积约有八十余间，内竖盘龙巨柱数根，支撑梁架，柱上采绘飞龙，腾云驾雾，正面塑立神佛五尊，正中释迦牟尼佛祖神态端庄，威严肃穆。大殿建筑技艺精湛，雄伟壮观。两侧还有东西配殿，左供天王，右供万佛。后边还有十余间大的两座后殿，再后又有七座五六间大的殿堂，供奉着菩萨诸佛。这一天，所有佛堂佛灯齐明，香烟缭绕。全庙近二百名喇嘛都在各个佛堂拜佛念经，祷告佛祖庇佑众生。伴随着念经声，还吹奏悠扬悦耳的胡笳号角，经声与号声交织一起，幽雅动听，给人以愉快的感受。来赶庙会的蒙古族群众，以一片虔诚的心灵，熙熙攘攘地分进各个佛堂，双手合十，向佛爷情真意笃地叩拜不停，祷告消灾免祸合家太平。

庙会的第一天活动是赛马、摔跤，第二天才是“跳鬼”。快到中午的时候，赛马开始。正殿前吹奏号角报名，然后从报名者与参加比赛的骏

马中选出六匹好马，分配给准备比赛的六名英俊的少年骑手。这六名精神活跃的健壮少年，接过马缰，不备一鞍，不悬一蹬，一跃上马，先绕庙宇缓行一圈，然后迎西北方向并辔行驶。约走二十几里路程，到达了预定的起跑点。随即开始向出发点急驶，往回奔驰。以召庙为终点，先到者优胜，受领奖品。赶庙会的人们，从六匹骏马出发以后，始终沉浸在紧张的气氛之中，每个与会者扣人心弦地布满了期待心情。人人都挤站到高处，眼巴巴地引颈瞭望，直到第一匹赛马跑回为止。最先所能望及的仅是一个小黑点，眼看着这个黑点越来越大，六匹骏马飞驰急驶。第一匹骏马到达终点，似旋风一样掠地而过。接着，其余五匹赛马接踵而至，人们的焦急心情方才平静下来。随着第一匹赛马奔驰而到，人流一齐蜂涌到领奖台前，争看先到夺魁的那个少年，人们都是双手合十，向少年示意一笑，祝贺胜利。参加赛马的少年受领奖品之后，复骑马环绕寺庙缓行一阵后赛马结束，其后即进行摔跤。第二天的“跳鬼”从清晨进行到太阳落山。

这一天拉僧庙人流如水，非常热闹。“跳鬼”的地方在大殿外边的空场，空场方砖铺地，东西南北四角各插着一面大黄旗，上边画着四大天王彩像：有的挥动乾坤宝伞，有的弹拨勾魂琵琶

琶，有的手持地水风火宝剑，有的舞弄着青蛇、黄龙，一个个神态威武，凶猛可怕。

几个身披黄法衣的喇嘛抬着一丈多长四根大铜号入场，旁边还有四个喇嘛拿着小号相随；又有十二个喇嘛捧着笙、管、笛、箫陆续进场；还有几个喇嘛手拿鼓、钗、铙钹以及许多叫不出名字的乐器，接踵进入广场。“呜——”一声，四根大铜号吹响了。一位大喇嘛升座，随后有许多喇嘛一个挨一个依次列坐。这时，从法座旁走出一位喇嘛，身披法衣，神情肃穆。他右手端着一碗净水，慢步走到围观的人墙之前。众人争先恐后地将手掌向喇嘛伸去。那喇嘛手蘸净水给人点洒。净水滴在人的掌心，觉得凉冰冰的，人们认为可以消灾去病，说这是菩萨佛水。

广场正北放着一张大供桌，上边摆着许多用奶油拌白面做成各种形态的兽，知道的人说这是“鬼食”。供桌左右站着两位身穿盔甲的人，嘴上都箍着白布，人们说那是守卫“鬼食”的人，因为怕人气沾到“鬼食”上鬼不吃，所以把两个人的嘴给箍了起来。

人们正看着，猛然响起了“冬冬——”的铜鼓声。随着这有节奏的鼓点，有三头猛兽——牛、老虎、狮子，相继跳跃而出。每头兽都是由两个人装扮的，前边的人站立着，带着野兽面

具，后边的人伏着身子。有一张特制的大兽皮将两人蒙住，脚下都穿着兽蹄鞋。这三头猛兽张牙舞爪地向围观的人群扑来，吓得人们直往后倒退，这样一来场子就扩大了，人们说这是“开道”。

随之出场的是九个仙童，一对一对地跳跃而出。头一对童儿手提银香炉，二对吹着喇叭，三对吹笙管，四对吹笛箫，最后一位童儿引出一位大肚弥勒佛。这位佛爷秃头秃脑，咧着嘴笑，敞胸露肚，赤着一双脚，腆着大肚子。那大肚子是用棉花撑起来的。他跳跃一番，靠北而坐，甚是风趣。

在又一阵铜鼓声中，一对小鬼跳跃而出。这一对小鬼带着骷髅头面具，身穿的是肉色紧身衣，上面画着肋骨条，手里拿着小棍，在场上对舞，做出奇怪的姿态。接着。又出来一个装扮成夜叉模样的鬼，瞪着眼睛盯着这一对小鬼。知道情由的人按佛教故事传说：“这两个小鬼是祸害人的坏东西，马王爷要抓他，它逃到海里。马王爷念起咒语，海水沸腾了。滚烫的海水将这两个小鬼身上的肉煮没了，只剩下骷髅。这两个小鬼无奈，跪在地上求马王爷皈依了佛门，以后就不干坏事了。”忽然间，只听扮夜叉的那个鬼大吼一声，跳跃的那对小鬼惊吓地迅速钻入围观的人群之中，从身上抓出大把面粉往人们脸上扬，把大

家的眼睛都给迷住了。

接着，又有带着骷髅面具的四个小鬼跳跃上场。每个头上顶着几个花帽。按佛教故事说：“这四个鬼是以前皈依佛门的鬼卒。”又接着，两个印度佛上场。他们头上都盘着发髻，耳朵带着大耳环。不一会儿，金刚佛出场。他身穿黄袍，下面绣着“海水托骄阳”，大宽袖子，衣裳的边缘镶嵌着象牙球。围观的人们议论说：那几个小鬼都是这个金刚佛手下的。这时两旁响起了“钢冻”声，这是一种用牲畜骨头做成的西番（西藏）乐器。“钢冻”乐器声一响，别的乐器也跟着一起鸣奏起来。在许多乐器交响声中，象征着36位天罡、72位地煞、以及28宿、12元臣等上界天神，由众多喇嘛扮相，一对一对地跳舞上场。这时，“跳鬼”节目到了高潮，观众极其兴奋。

众位神道跳完，接着出来一位兰脸韦陀。韦陀左手拿着三棱铁杵，右手拿着人脑骨，威风凛凛地跳出了各种身段的舞姿。它还随着跳跃动作的节拍，口中念念有词，忽而起立，忽而坐下，忽而绕场周行，忽而发出粗犷的呐喊声。在阵阵高亢激烈的呐喊声中，面部表情变化无常：有时狞视，有时愤怒，有时朝着佛殿作投掷铁杵状，有时朝另一方向投掷人脑骨，显出手上很有功夫。人们说这是为了击杀妖魔鬼祟。这位韦陀每

动作一次，还向四周围观的人群抛撒“五谷”（糜豆黍麦谷），以示打鬼驱邪。随即又喝几口烧酒，怒目环视，如是反复做作。未几，念动咒语，人们随即拥来向他敬拜。正在念动咒语之际，忽然手舞铁杵向着围观的人群戳来，吓的观众直躲，以避其锋。人们说：凡被韦陀舞动的铁杵碰着的人，在未来一年中可以驱邪避祸，逢凶化吉。这一幕举动很有意思，吸引着人们全神贯注的观其动作。

这位韦陀跳完，又有十几位带面具的喇嘛身穿锦衣，装扮成“地藏王菩萨”和十殿阎君的模样，他们手中分别拿着钢叉、铁棍、骷髅棒、脑骨碗、彩缕等物体，双双舞蹈出场。阴司诸神跳毕，又出来21位菩萨。领头的是南海紫竹林的观音大士。这些菩萨都不带面具。在菩萨周围，有许多喇嘛手拿鼓钹铙钃，按照跳舞的节奏，冬冬嚓嚓地敲打开了。此刻又走出一对喇嘛手捧香炉点燃着的香火，在菩萨周围环绕而走。不大功夫，一位大喇嘛升坐于高桌之上，两边的喇嘛念起了藏经。这时，铜鼓声、“钢冻”声、铜号声、随着经声交织一起，敲击声大作。人们说：“高桌上坐的那是一位活佛，下边跳的杂鬼均由他来主持。”这位活佛据说在此“跳鬼”之前，要斋戒7日，闭户不出，以净身心。念完藏经又继续一阵

“跳鬼”，所有扮演者全都出场。结束时，把供桌上的“鬼食”搬运于南郊，在喇嘛的念经声和乐器声中抛撒于地，说这是送“鬼食”。就此，从清晨一直跳到太阳落山才结束。

喇嘛庙的“跳鬼”，好多动作与内容，笔者至今不解其意。只是听人们传说：“这个鬼是祸害人间的坏东西，阳年，它显男身，阴年，它显女身。狂风、暴雨、冰雹、蝗旱、瘟疫……等等灾害都是它带来的。“跳鬼”的作用与目的，就是用“鬼食”把这个恶鬼引诱出来，请诸神将它除掉，去邪祟以求享太平”。还有一种民间说法，

“跳鬼”是为了祭祀宋朝杨家将领的灵魂不要作祟，庇佑人间安宁。“跳鬼”是喇嘛教中一项很重要的佛事活动，蒙古人民很信仰。各个召庙“跳鬼”的仪式、场面、内容，大体都是一样，只不过有繁有简而已。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巴彦淖尔文史资料·第十二辑

作者 =

页数 = 3 0 6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